中国读本



中国古代军事

军事是人类活动的特殊领域，以战争史为主体的中国军事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炎黄二帝中原逐鹿，春秋五霸更迭混战，战国七雄的争相兼并……绵延不断的战争影响着国家的荣辱盛衰。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军事 / 孙建民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10
（中国读本）
ISBN 978-7-5078-3203-7

Ⅰ. ①中… Ⅱ. ①孙… Ⅲ. ①军事史—中国—古代 Ⅳ. ①E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8598号

中国古代军事

著　　者	孙建民
责任编辑	刘川民　陈　莎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
开　　本	640×940　1/16
字　　数	130千字
印　　张	17.25
版　　次	2010年10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0年10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203-7/E·4
定　　价	28.00元

目　录

引　言

军事是人类活动的特殊领域。作为人类自身历史的重要内容，交织着文明与野蛮的军事史，偏偏又散发着诱人的魅力。

恩格斯曾说："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①] 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人类向阶级社会的门槛跨越，同时也带来了战争这一"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从此，战争贯穿了人类文明史的各个阶段，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超过了人类其他一切社会活动。正如美国著名军事史家小戴维·佐克和罗宾·海厄姆指出的："冲突从来不是历史进程的一种罕见现象，而是它的常见现象。战争既创造文明，又受文明发展的影响。战争从未在人类生活中长时间地停顿过。"[②]

中国古人曾感叹：刀兵常事而太平难得。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充满了血与火的较量。炎黄二帝中原逐鹿，吹响了文明历史的号角；春秋五霸更迭混战，敲击着奴隶制的丧钟；战国七雄的争相兼并，则共同奠基了封建帝国的大厦。此后，从秦始皇武力统一华夏，到清军入关建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代皆以武力建立政权。可以说，战争带来的胜利的荣耀和失败的耻辱，影响到国家的盛衰。同时，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② 小戴维·佐克、罗宾·海厄姆：《简明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战争也凝聚了交战各方的智慧，寄托着参战者的梦想，充斥着凶险与残忍。从商汤讨伐夏桀声色俱厉的《汤誓》，到诸葛亮催人泪下的《出师表》；从三国鏖战到宋、辽、金角逐，几乎无一例外。战争性质的不同，使参战双方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而各个时代矛盾侧重点的不同，又使各种战争交错，对象与种类差异悬殊，故有民族战争、对外战争、农民战争等。

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争形态的演进，战争的规模、样式与手段不断发生变化。而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历代在国防、军队组织、训练、管理和作战方式上也各有特点，战略战术的研究和应用更是各尽其妙。

以战争史为主体的中国军事史作为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中国军事文化中，对战争与和平、军事与政治、战争与经济、富国与强兵等问题高屋建瓴的关照与体认，虽然在近代与西方强势军事文化的碰撞中一度处于劣势，但其中凝聚的深邃智慧、博大精深的思想，从20世纪中期以来就不断为西方所折服，激发了一代又一代西方战略家、军事理论家的灵感，并在21世纪的信息化战争时代仍然散发出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此外，数千年的中国军事文化遗产，无论对于我们认识和提炼军事发展的规律、战争指导的原则，还是对于我们遏制战争、准备战争和打赢战争，都有许多经验教训值

得总结，并非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毫不相干。

一方面，军事科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就是其鲜明的实践性，军事理论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接受战争实践的检验，但人们不可能为了验证一套军事理论的正确与否而干脆发动一场战争。于是，人们理所当然地求助于对军事历史的研究和学习。在这个意义上，军事历史堪称军事理论的“实验室”。“军事历史之所以对军事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是因为军事科学不像大多数其他科学那样，可在实验室里验证它们的理论和假说。军事试验的种种形式，如野战演习、对抗演习和实兵检验等，都永远不会再现战争的基本成分：致命环境下对死亡的恐惧感。”[①] 难怪拿破仑告诫人们：“研究，反复研究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古斯塔夫、蒂雷纳、尤金和腓特烈等人的战争实践。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榜样，这是成为卓越的军事将领和提示军事学术之秘的唯一途径。这样可以启迪你的智慧，从而摒弃所有与这些伟大军事家所坚持的准则相悖的教条。”

另一方面，军事历史又是创新军事理论的基础。虽然战争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重复性，以往的战争不可能被复制到未来战争中去，但战史研究尤其是战例分析仍是军事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是认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

---

① 特雷弗·N·迪普伊：《把握战争——军事历史与作战理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导规律的重要途径。纵观人类军事史，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军事理论原则正是前人或今人从军事史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而且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家没有一个不重视军事历史的研究，或者说他们既是军事理论家，又是军事史家，或对军事史、战史有深入的研究。比如，19 世纪的军事理论家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者，均重视军事历史尤其是战例的研究。若米尼通过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写出了《战争艺术概论》；克劳塞维茨更认为：只有以研究战争史为基础所得出的理论，才是战争艺术中唯一的理论。他特别强调："一部有正确评价的军事史，确实是一所真正的战争大学校。一个高级军官，只有通过对历史战争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战争艺术。"正是通过对历史上 130 多个著名战例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拿破仑战争的审查与总结，克氏著成了《战争论》这一西方军事理论的经典。现代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之所以能著成《装甲战》、《战争指导》等不朽著作，开创性地提出装甲战理论和战争指导的一般原则，首先得益于他是一位军事史大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发展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过程中，也特别重视军事史的研究。他们对德国农民战争、1848 年欧洲革命战争、巴黎公社起义、美国内战等进行的专题研究，对西班牙革命、英国殖民战争、普法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印度民族起义等重大事件撰写的评论等文献，"既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也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研

究军事历史的典范。”[1]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对古今中外军事史研究的重视，更是尽人皆知。

鉴于此，对中国军事史的演进轨迹进行系统、清晰的勾勒，进而展现中国军事文明惊心动魄的绚丽风姿，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

① 郑文翰、糜振玉主编：《军事科学概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第一章

原始战争与中华军事文明的萌生

一　原始战争与中华军事文明的萌生

军事是随着战争的出现而出现，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并随战争的消亡而退出人类社会生活的。也就是说，先有战争，后有军事。而战争作为人类社会在特定社会阶段特有的活动，作为“民族和民族、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只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追寻中华军事文明的开端，必须考察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的起源问题，探究史前时代的“战争”。

关于中国历史上战争究竟源起于何时，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战争出现在阶级社会，在原始公社制度下虽存在过与战争相似的行为，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二是认为既然马克思、恩格斯都讲了原始公社制度下的“战争”，那么战争的起源应该在原始社会；三是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有一个过程，战争的形成当然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不应当把阶级出现之后的战争同之前的战争截然分开。因此，原始社会后期部落之间的武力冲突就是阶级社会战争的雏形。剥削阶级出现后，战争才同私有制和阶级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战争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从人类最初的血亲复仇，发展至部落争雄，进而发展

到部落联盟和酋邦制下最初的战争形态的孕育。最后，生产力的进步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出现，从而完成了战争萌生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进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血亲复仇：人类自相残杀的最初方式

人类社会不是一开始就有战争。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数百万年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国家的原始社会。在史前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低下的生产水平，恶劣的自然条件，彼此的相互隔绝状态，都使得我们这个星球上“万物之灵”的人类只能将与自然的斗争作为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和生活内容。先民们衣不蔽体，终日劳碌，使用最简陋的工具，如石块、木棒，用以猎获野兽和采集植物的果实和根茎，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资料，只够维持自己和亲属的生活，没有任何剩余物品可作其他用途，更缺乏大规模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所以，相互协作成为先民们主要的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偶尔发生于人群间的械斗和厮杀，并未构成对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和谐相处的原始共产制的破坏，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军事战争行为并未出现。先民们就是在这种原始低下的、田园牧歌的和平状态中，渡过了数十万年的漫长时光。

距今7000年左右，我国中原地区的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全盛时期，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于是，当时各个氏族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抢占生存空间，接触、

摩擦乃至诉诸武力就在所难免。陕西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周围发现的防卫沟，从考古学上佐证了这类武力冲突的存在，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氏族生活是处于经常的、有组织的集体戒备之中。

在这类冲突中，“血亲复仇”是一条重要的法则。按照这一法则，氏族内部的某一成员遭受侵害，即被看作是对氏族整体的侵害，个别冲突也就迅即演变为集体的武力冲突。这种必然会发生的集体行为，目的很单纯，方式也非常原始，参加者都是氏族部落的集体成员，并没有出现职业的军队和军队组织，也没有专门制式的武器装备。所以严格来说，这种冲突在目的、性质、意义上与阶级社会的战争是不同的，而只能算作萌芽状态的战争或原始战争。不过，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部落内部逐渐团结凝聚，若干联姻集团开始结合成部落，进而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又日益团结成部落联盟，以应付冲突求得生存。另一方面，在氏族制度下，每一个人的生存都与氏族的荣辱兴衰息息相关，部落和部落联盟对外的排他性日增，这就使得部落或部落联盟对血亲之外的氏族、部落进行动物般的、野蛮残酷的仇杀和掠夺。阶级社会一切类型的战争，从此开始萌芽。

（二）部落争雄：“原始战争”的高度发展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距今5000年前后，即古史传说中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中国历

史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这正是传说中“原始战争”最多最激烈的时期。当时，血缘相近的氏族逐渐结成相当规模的部族集团，而集团内部也开始出现争长称雄的斗争。部族之间为了生存和征伐的需要，往往结成部落联盟，这种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已超出原来血缘关系的界限，而按地域结合。从山东大汶口文化及早期龙山文化来看，生产工具明显改进，生产力有所提高，出现了私有财产。这便激发了部族领袖攫取更大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望，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史记·五帝本纪》对当时情况有如下描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争斗成为当时生活的主流，来自不同氏族的首领们，为了争夺部族集团中的领导权，遂发生相当激烈乃至残酷的武力冲突。胜利一方的首领登上本部族集团尊长的宝座，失败的一方则成为部族集团中的依附性氏族团体，从而加速了部族集团内部的整合进程。伴随着部族联盟的不断扩大，联盟首领的权利与日俱增，逐渐成为军事领袖。历史进入英雄时代，即军事民主制时代。

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在现今的中国版图内已形成并立的几大部族，即：生活在黄河中游地带的河洛族，以姬、姜诸姓为主；江、汉地区的苗蛮部落，主体是洞庭周围的三苗；黄河下游泰山附近和滨海地带的夷族。三大集团因为原始生产的发展，人口增殖，不断向周边拓展，互相接

触和碰撞，于是战争在所难免。部落战争实际上是对生存环境的争夺，而“中国的天然环境，自古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平原最为优良，所以古时诸族的战争，常以这一带地方为对象。”[①] 正是在中原及其附近，东夷、苗蛮和炎黄三大集团依次登场，爆发了传说时代的几场著名大战。其中最著名者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以黄帝为首的北方部落联盟和以蚩尤为首的南方部落联盟的“涿鹿之战”，以及禹伐三苗之战。

1. 阪泉之战

发生于神农时代末期的阪泉之战，被认为“是华夏集团内部两个同源共祖的远缘亲属部落间的一场争雄的战争”[②]。相传神农氏之后，中原出现两大部落联盟，首领分别是黄帝和炎帝。黄帝姓公孙，名轩辕，传说是有熊氏部落的代表，发祥于古漆水（发源于今陕西麟游西北的杜林），此后向东发展，生活于以今河南嵩山为中心的地区，所谓“居轩辕之丘”，故称轩辕氏。炎帝姓姜，发祥于姜水（今渭水上游一带），后来不断向东发展，建立了跨有黄河上中游的庞大部落联盟。炎、黄两个部族向东发展后，活动地区相近，都要扩大自己的势力，终于发生了战争。史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双方经过三天的

---

①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2页。

② 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激烈战斗，最后黄帝部落获得了胜利，黄帝也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这样，炎、黄二部首先联合起来，组成了规模空前的华夏部族集团，为日后与东夷、苗蛮角逐中原奠定了基础。

2. 涿鹿之战

阪泉之战后，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内已经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部族集团。以黄、炎为核心的华夏集团沿着黄河两岸向华北大平原西部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称九黎），也在其著名首领蚩尤的率领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发展，进入华北大平原。九夷部落以牛为图腾，勇猛彪悍，骁勇善战。传说其首领蚩尤“善作兵”，是兵器的发明者，他的九个儿子，也皆有万夫不当之勇。依靠雄厚的军事力量，蚩尤征服了周围各部，势力颇为强大。黄帝融合炎、黄二族后，与蚩尤部的冲突在所难免。双方在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一带）遭遇，开始了华夏与东夷两大集团的决战。传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败，一度躲进深山，后来得玄女传授神符，遂联合众多小部落在涿鹿一带再次与蚩尤展开激战。为战胜蚩尤部落，轩辕还发明了指南车，使部众虽在浓雾中



蚩尤像

也能辨识路径，并得到女神旱魃助阵，最后大败蚩尤。战后，黄帝率部乘胜追击，直抵泰山，在那里举行了“封泰山”仪式后凯旋西归，并另立首领统率九黎部落。



黄帝战蚩尤

涿鹿之战使有熊部落所向无敌，名震中原，成为结合夷、夏诸部规模更大的部落联盟。轩辕的威信和权威也如日中天，被各部落共同尊为天子，号称黄帝，而黄帝也真正担负起了联盟军事领袖的职责。

3. 禹伐三苗之战

涿鹿之战后，中原的华夏集团和东方的夷族集团加速了融合，中国历史进入了所谓的尧舜禹时代，也即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最后一个阶段——军事民主制时代，其主要劲敌则是南方的苗蛮集团。当时，以三苗为主体的南方民族正向北拓展。传说尧帝曾与苗民战于丹水之浦（今河南南阳地区），舜帝则一方面巩固联盟内部的团结。一方面大习武事，加紧攻势，将战场又逐次扩大到洞庭湖、鄱阳湖之间，而舜本人也于南征途中“道死苍梧”。禹继位后，与三苗进

行了真正的决战。历史上称之为“禹伐三苗”。

禹帝选择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三苗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心惶惶。禹帝借口苗民不尊敬神灵，刑罚苛重，宣称自己正是奉了上天之命，要斩尽杀绝苗民中的为非作歹者。出征之前，禹帝又主持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并举行了誓师大会，宣布了三苗的罪状，号召“济济有众”（庞大的军队）努力作战。关于战场情况，《墨子·非攻》曾说禹有人面鸟身的神人保佑，三苗首领被箭射中，苗师大乱，苗民被掳者不计其数。其中一部分沦为奴隶，一部分则融合到华夏族中。

这场连绵多年的战争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这就是异常残酷血腥：战败者的宗庙被夷为平地，祭祀重器被彻底焚毁，战俘及其子孙世代沦为奴隶，所谓“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国语·周语下》）。完全不再是血亲复仇或生存空间的争夺，而是对异族赤裸裸的征服。战争的目的转变为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这意味着原始战争的终结，新的阶级社会的战争已是呼之欲出了。尤其是，征服三苗后，禹帝的权威达到顶峰，他召集各部落首领到涂山（今陕西潼关，一说今安徽蚌埠市西怀远县）开会，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于万方”，正式为各部落尊为领袖。在会稽召开第二次大会时，防风部酋长仅因为迟到，就被他杀掉。而且他还划分天下为九州，以便行政管理，定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从而以军事权力确立了自己的王权，被尊为“夏后氏”。

旷日持久的尧、舜、禹攻伐三苗之战，直接促进了阶级的分化和社会的进步。至此，史前时代的田园牧歌终于成为昔日黄花。原始的军事组织让位于专职的国家机器——军队，战争开始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行为，成为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重要手段，战争的经济、政治性质进一步凸显，真正意义的战争出现了。进而，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国家应运而生，中国社会跨向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二　原始的作战方式与战争指导

战争方式也与人类一样经历过一个原始野蛮的早期阶段。在被称作“人类童年”的原始社会里，战争方式十分简单，氏族或部落间所谓的“战争”，实质上还只是一种血亲复仇的简单的群殴、械斗，当时还没有军队这一专职的国家机器，更不存在今天所说的战略、战术问题，所谓“棍棒比知识更重要”。作战时，部落首领及其全部族成员都是战士，“战争”的进行过程一般只是抛射兵器和近身格斗两个阶段。当双方人群相遇，开始接近时，不论人数多少，首先是进行远距离的抛射打击。作战双方的人们纷纷使用投石器将石块、石球抛向敌方，或拉开强弓射出石箭、木箭、竹箭，或者投出标枪或长矛，然后是短兵相接，展开你死我活的残酷格斗和厮杀，直到对方的战士都基本被杀死，战争才会停止。所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双

方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各自的体力、勇敢和经验。

至于战争指导方面，随着武力冲突经验的积累，到了涿鹿之战和尧、舜、禹攻伐三苗阶段，已初步形成了原始的战争指导和战术运用。如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为了夺取战事胜利，除了积极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之外，还十分重视发展生产，争取民心，修德抚众。在此基础上，黄帝族才以弱胜强。同时，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善于争取同盟者，并能注意选择和准备战场。如涿鹿之战、禹伐三苗之战，都注重通过争取同盟来壮大自己，形成对敌优势。此外，重视运用各种手段给对方造成恐怖心理，并给己方壮胆。比如，在涿鹿之战、禹伐三苗之战进行之前，黄帝、大禹均举行祭祀仪式，祈求神灵或祖先的保佑，同时宣示对手的各种罪行，标榜讨伐行动的合理性、正义性。在具体战术上，参战者往往进行文身或佩戴艳丽的头饰和其他装饰（用红、黑色等颜料涂在身上或脸上，绘成各种花纹或用针刺出部落图腾标记、野兽形象以及斑纹等纹饰），以鼓舞士气，震慑敌手；有时主动进攻的一方会采用偷袭的方式，给对方以突然打击，造成对方心理上的巨大震惊和恐怖，使敌人由于毫无准备而陷入混乱。

三　“玉石为兵”：原始的武器装备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曾根据生产工具和武器的制作

材料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阶段。从军事史上说，古代人类的武器装备自然也经历了由石兵器、木兵器、玉兵器到铜兵器和由铜兵器到铁兵器两次重大转变。

虽然说出现了武力争斗就产生了用于作战的兵器，但人类社会的早期并没有专门的战斗武器，最早的兵器无疑就是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石块和木棒等），这种杀人工具与生产工具不分的状况，在史前阶段曾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即使在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生产工具也仍然没有完全退出战争舞台。比如，棍棒是先民们最为便利的原始的劈刺式兵器；石块成为先民们最早的和最常用的投掷式兵器。而这些“兵器”的制作材料，都是自然物或对自然物的稍作加工而成。当然，原始人群手持这些工具进行人与人的格斗，一旦这些工具沾染上同类的鲜血，原始生产工具向兵器的转化也就开始了。

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日益激烈，仅用生产工具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这就促使人们开始设计和制造专门用于杀伤和防护的特殊用具，于是兵器逐渐与一般生产工具分离开来，大约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即原始社会晚期，由于部落集团间争斗的加剧，人们不断对原始的生产工具的体形和刃形加以改进，以提高其杀伤力。比如，传说中的战神蚩尤就被描绘成兵器的发明者，汉画像石上，他的头上有角，手中身旁佩持着各种各样的兵器。其他如“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

兵”（《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等等记载，史不绝书，都暗示了这一重要转化完成的历史年代。于是，专业杀人工具逐渐从生产工具中分化出来，成为兵器，出现了石刀、石矛、石戈、木剑、弓、箭等专业兵器。

与武器装备的专门化同时，原始的军事防御设施也出现了，考古发现的一些设防村寨和城堡，如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下游城子崖古城、黄河中游平粮台城址，长江中游湖北天门石家河的古城、内蒙古长城地带发现的时代在距今4800至4300年间的一系列石城聚落遗址群，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军事防御体系的主要代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数目日益增多，遍布于中华大地，这反映了原始人群军事防御观念日益增加，军事筑城能力不断得到了提高。

第二章

三代更替：奴隶制军事的产生、发展与鼎盛

公元前21世纪夏启建立夏朝，标志着中国历史正式进入阶级、国家时代。继起的商朝和西周王朝则将奴隶制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在一千多年漫长时间里，战争业已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并直接导致了王朝的更替。

一　夏、商、西周的王朝更替战争

（一）中国战争史的真正开端：甘之战

夏禹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因征伐三苗战争的胜利和治理洪水的成功而赢得了崇高的个人威望，同时也赢得了极大的权力。他的儿子启凭借父亲的威望和既得权力，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此一行为，于中国历史和军事史意义重大，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禹之后有启，盖至是而始进于君位世袭时代，则已俨然有国家之规模矣"，因为"启以后因君位世袭之制既定，遂有夏朝之建立。"[①] 中国历史从此由原始社会迈入了阶级社会。

夏朝建立伊始，具有相当实力的有扈氏部落对夏启公

①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第3版，第12～13页。

然违背原始“禅让制”的做法极为不满，带头起兵反抗夏启的统治，挑战夏启的领袖地位。夏启为维护自己的权威，亲自率军讨伐，双方在甘泽遭遇，战事很可能旷日持久。不过史籍上对战争的具体过程缺乏详细记载，只在《尚书》中保留有一份夏启在战前誓师大会上的誓词，这就是著名的《尚书·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这段誓词，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段是宣示兴师讨伐有扈氏的缘由，第二段是对军队作战提出的具体要求。它虽然文不足百，但反映的问题极其深刻：其一，确证了启之历史地位，即他是创建奴隶制国家的划时代的人物；其二，甘之战是文献上确凿记载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的战争。

战争的结果是，夏启取得了甘之战的彻底胜利，灭亡了有扈氏，巩固了新兴的夏政权。战后，夏启在钧台（河南阳翟）召开大会，得到诸侯的拥护。夏启之所以在甘之战中赢得胜利，除了因为他所代表的是新兴阶级势力的利益，战争的目的和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之外，主要是因为进行了扎实、必要的战前动员，申明了军纪、军法，调动了众多参战人员的战斗积极性；同时，正确部署兵力，实

施比较高明的车兵作战战术指挥也是重要原因。

甘之战是中国战争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从此，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在整个社会活动中占据了显著地位，中国军事史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甘之战后，夏朝又进行了多次内外战争。比如到第二代国王太康时，夏朝内部为争权夺利不断纷争，夷人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乘机攻占夏都，夺其王位，史称“太康失国”。后来，后羿的权臣寒浞又杀羿自代。为打败寒浞及其两位悍将浇、殪，太康的侄孙少康联合同姓，作了长期战争准备。如他派亲信女艾去刺探浇的情报，然后出兵灭亡了寒浞，其子季杼也消灭了殪，从而恢复了夏朝的政权，史称“少康复国”。

（二）商汤灭夏建立商朝的战略指导

夏朝建立大约400年之后，夏桀登上了君主的宝座。传说夏桀曾做了一个梦：“两日相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这一奇怪的梦，实际上反映了夏桀对夏朝国运的忧虑和恐惧。原来，夏朝末年，夏桀任用嬖臣，骄侈淫逸，同时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引起夏民的极大怨恨。他们说“时日何丧，予及汝皆亡！”表示要与夏桀同归于尽。而在东方，夏朝又面临着来自商民族的严峻挑战。

正当夏朝江河日下时，黄河下游的商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羽翼丰满，迅速崛起，并不断向西发展，与夏的矛盾日益尖锐，双方决一雌雄势不可免。尤其是到了商

族著名的首领商汤时期，商已由夏的属国发展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雄才大略的商汤遂顺应时势，及时将部族统治中心迁到亳地（今河南商丘北），积极进行推翻夏朝的政治、军事准备。

在政治战略上，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争取民心和同盟的政策，展开揭露夏桀腐败统治暴政等罪行，发动政治攻势。

在军事战略上，商汤在贤臣伊尹、仲虺等人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积蓄力量，伺机破敌。如选用贤人伊尹为相，并创造性地用计，大胆派伊尹多次打入夏朝内部，了解到夏朝“上下相离，民心积怨”，坚定了灭夏的决心，并与伊尹共同商定了先剪除夏之羽翼，然后推翻夏后氏的灭夏大计；先弱后强，由远及近，逐一消灭夏朝的羽翼和同盟，次第消灭了夏的属国葛国（今河南宁陵北）等，完成对夏朝的战略包围，为最后在鸣条决战灭夏扫清了道路。此外，注意实行仁义之政，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在天下诸侯面前树立正义之师的形象，各地老百姓像“大旱之望甘霖”一样盼着商汤大军的到来。

在作战指导上，及时捕捉决战时机，实施突然进攻。夏朝毕竟是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国，仍有相当实力。因此，在进攻的准备未完全就绪之前，商汤暂停了对夏的军事行动，使夏桀错误地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是东南方的“九夷之师”，而对于商族可以高枕无忧。

大约公元前 1726 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完全成熟，立即部署对夏朝的进攻。战前誓师仪式结束后，商汤利用

夏桀“西方日胜”的迷信心理，亲率作战性能良好的兵车70乘，能征惯战的敢死队6 000人，会同各同盟国的参战部队，采取大迂回战略，从东方（商的都城亳）出发，绕道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由西向东发动突然袭击，直接攻击夏桀的老巢。两军在鸣条之野（在今山西安邑一带，一说在今河南洛阳附近）相遇，商汤大军勇猛冲杀，消灭了夏的主力，赢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鸣条决战的胜利。夏桀兵败，逃往属国三朡（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则率军展开战略追击，对溃逃的夏桀残部实施打击。穷途末路的夏桀，仓皇奔逃南巢（今安徽寿县南），不久便病死在那里，夏王朝彻底覆灭。然后，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有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

鸣条之战，是一场典型的新旧王朝更替战争。商汤一举推翻垂死挣扎的夏王朝，这在当时是合乎民众愿望的，客观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和赞扬，被称为“革命”性的壮举。儒家学派更将其作为“吊民伐罪、顺天应人”的典范。同时，商汤在此战中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指导和指挥艺术，对后世战争的实践和兵学理论的构筑，也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三）开创西周基业的“牧野之战”

商朝末年，商王纣（帝辛）残暴无道，纵情享乐，过

着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的生活，内部离心离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王朝军队的主力则陷入对东夷旷日持久的战争，致使西线空虚。与此同时，商的西方属国周族，经过数代经营，日益强盛，并伺机向东发展，成为挑战商朝统治的一大势力。

周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贤人吕尚（即姜尚），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大业。吕尚被誉为谋略之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事战略家。在吕尚的辅佐下，周文王有步骤地进行灭商的战略准备：一是改变东进势头，“内修文德”，利用商纣无暇西顾之机，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整顿、壮大实力上；二是韬光养晦，恭顺事商，麻痹商纣；三是打击商朝的周边属国，剪商羽翼。

公元前1027年正月，文王之子周武王趁商纣王将军队主力派往东南之机，统率兵车300乘，敢死队“虎贲”3 000人，甲士4.5万人，向商王朝统治的腹心进军。同月下旬，进军孟津，在此与反商的数十个方国会合，并进行了战前动员（见《尚书·泰誓》）。之后渡过黄河，北上至百泉，然后折而向东，兵锋直指朝歌，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这是一次典型的战略突袭，商廷上下一片惊恐，纣王一方面下令调回征伐东夷的商军主力，一方面临时征集大批奴隶，拼凑了17万杂牌军仓促赶赴牧野迎战。在联军的攻击下，商军纷纷“倒兵以战”，阵形大乱。武王见状，马上投入主力冲击，以“大卒（主力部队）冲驰帝纣师”，甲士则配合进攻。一时间，纣王17万之众土崩瓦解。

纣王见大势尽去，遂弃军逃窜回朝歌，于穷途末路之际躲进鹿台纵火自焚。

牧野之战使商王朝寿终正寝，确立了西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开创了我国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促进了古代兵学文化的发展。

（四）巩固国家统一的“周公东征”

周王朝的疆域较之商朝更加广阔，加上商朝统治东方达600年之久，有着深厚的统治基础，所以巩固新王朝对广大地区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成为头等大事。为此，牧野之战后，周武王曾审时度势，对原来商朝统治的腹心地带——王畿地区实行间接统治。他把商畿分为三个部分：邶（北部）、鄘（东部）、殷（西部），封纣王子武庚于邶，令管叔鲜治鄘，蔡叔度治殷，并委任管叔、蔡叔、霍叔三人为武庚的傅相，监视武庚，号称“三监”。

周武王死后，继位的周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代行王事。王室内部对此议论纷纷，认为周公有野心。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尤为不满，他们四处散布谣言，声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纣王的后代武庚见有机可乘，便联合东方的一些诸侯国（徐、奄及熊盈氏17国，在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安徽、江苏北部一带），公开扯起了叛乱的大旗，刚刚建立的周王朝又面临殷商复辟的危险。

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周公旦毅然肩负起保卫与巩固周王朝政权的重任，他一方面安抚内部，另一方面力排众

议，断然决定兴师东征，进行平叛战争。

东征军组建后，周公亲自担任统帅，率军首先进攻殷商故地的武庚，以叛乱的商朝旧贵族武庚为主要打击目标。周军所到之处，武庚的叛乱武装便分崩离析，全线溃败，武庚本人也被杀死。回师途中，周公又分兵一路直取管叔驻地鄘，击破管叔的武装，占领其城邑，杀死管叔，俘虏了蔡叔。这样就取得了东征的初步胜利，实现了消灭武庚、管蔡叛乱势力，“救乱、克殷”的战略目标。接着，周公挥师讨伐在“三监之乱”中支持叛乱的商盖和淮夷，然后挥师北方，讨平东方最后一个叛乱据点——奄（又名商奄，地处今山东曲阜一带），将周王朝的势力一下子扩大到了渤海、黄海之滨。

历时三年多的周公东征战争，是武王伐纣战争的继续，对于周王朝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的胜利，彻底摧毁殷商反抗势力，并将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纳入版图，建立起对东方的有效统治。

二　兵器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青铜兵器的出现与大量使用

夏商时期大量的兵器以远射程的弓矢和戈矛等类长兵器为主，就材质论，虽然仍以木、石、骨制的为主，但较

之前代，兵器的形制多了，制作精良了，适用性大大提高，更加具有专业化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尤其是手工业的发展，从夏代开始，武器装备的发展就有了质的飞跃，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其主要标志就是各类青铜兵器的出现和使用。

多年考古发现证实，早在夏代，人们不仅能铸造青铜容器，而且已具备相当大的生产规模和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如夏都偃师二里头和山西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就有戈、戚、钺、镞等武器。其中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三陵尖型铜镞，代表了铜镞的早期形态，甚至还出土有新型的带双翼的铜镞，它的形态是有突起的镞背，向前聚成锐利的尖锋，向两侧伸出扁平的双翼，双翼末端作出倒刺，镞尾作出圆铤。这种铜镞有较骨、石、蚌镞更锐利的尖锋，更容易刺入人体，双翼扩大了受创面积，末端的倒刺，使射入的镞不易被拔出（罗琨、张永山所著《夏商西周军事史》对此有详细叙述）。

到了商代，青铜冶铸技术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当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创造了高度的青铜文明。在军事领域，青铜兵器的大量使用更是武器装备方面一个最值得注意的亮点。目前，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兵器数量相当大，足可证实商代的兵器大量使用青铜铸造，且青铜兵器在整个武器家族中占优势地位。至于其种类，主要有戈、矛、镞、刀、戚、钺等。同时，商代的青铜兵器往往是成套装备部队的，步兵多用戈或矛，或戈、镞，矛、镞相配

成套。车兵多用戈或弓矢，有的还配备刀以作防身之用。可以断定，青铜兵器已装备于主要战斗人员，成为当时战场搏杀的主要工具。

西周时期，随着青铜冶炼业的发展，兵器种类更超过商代，而且出现了戟、剑等新式兵器，更加适应实战需要。戟是将戈与矛两种兵器的形制加以结合而制成的一种兵器，既利于格斗，又具备矛的刺杀功能，更加适应车战的需要；而剑则是一种双刃刺杀兵器，适于近身搏斗。

三　奴隶制军事制度的不断成熟

与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建立相伴而来的是专职武装力量的建立，以及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军队组织形式和运用方法。

（一）“寓兵于农”的兵役制

在兵役制度方面，夏商时期遵循的是“寓兵于农”的指导原则，采取兵农合一的方式征集军队。夏、商包括后来的西周王朝，建立政权之前都是部落联盟性质的政治实体，建立政权之后，氏族社会残余相当浓厚，氏族部落组织仍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只能实行兵农合一的政策。其具体做法是，凡本族的成年男子，平时从事农业或游猎，一旦有战事，国王可以随时征集其参加作战。征调的办法，一是以族为单位征调；二是按地域临时征调；三是在战争

频繁、本族民众不敷征战之需时，征调奴隶，即“众”。战争结束，参战者绝大部分解散，兵甲装备收归国库。这是一种举族为兵、全民皆兵、临时征集的兵役制度。

西周时期一方面因袭了夏商时期兵农合一的方式征集军队，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与分封制相适应的等级兵役制，天子、诸侯的军队称“虎贲”，构成亲卫兵，负责警卫，士兵主要从王室公族中挑选：车兵则称“甲士”，主要来源于周民族的国人和平民，徒卒则出身庶人和农奴。服役的年限一般为20岁至60岁。

（二）逐步呈现出集权化趋势的军事领导体制

夏朝时期，处于奴隶制初期阶段，夏后氏与各方国的关系也未形成上下一贯的统属关系，因为政权的军事部落联盟色彩相当浓厚，所以夏朝的军事领导体制具有既突出夏王的权力，又充分显示诸部族武装的基本独立性的特点。在这一体制中，夏王的权力最为突出，远远超出了部落联盟时期领袖的地位，夏王除对本族直接发号施令外，还有权力直接召集本族之外与夏朝有“服事”关系的诸部族武装参加战争，所以他既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也是最高军事首长，既是整个夏族的总司令，在率各部武装出征时，又是联盟军的总司令。

继夏而起的商朝和西周王朝在军事领导体制上进一步强化了最高统治者的军事权力。比如，商朝的最高统治者称“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建军权、任命将帅之

权、决定征伐之权，以及亲自率军指挥作战之权和对军队的赏罚权。而到了西周，周天子总揽全国的军权，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周天子有权调动和指挥各诸侯国的军队，有权亲自任命将帅，甚至亲自率军征讨，亲临前线，不服从者则要受到惩罚，这样就保证了周天子统一指挥下的统一行动。周天子之下，则由受天子任命的大司马管理军赋、兵员征集和军事训练。

（三）以本民族军队为主体的多元武装力量

在武装力量构成方面，夏、商、西周三代颇有相似之处：都以本部族力量为主体，同时尽量通过征调与王朝有臣服隶属关系的各部族，充实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不过，王室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呈不断扩充之势。

夏朝时，军事组织编制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氏族部落制的特点。夏后氏所能控制的武装力量，主要是以夏民族为主体的部族武装，部族的成员，平时为民，战时出征。此外，其他各部族也都有自己独立的武装。这样，夏后氏还可调动与夏朝有臣属关系的各部族的武装来协助征讨等军事行动。

商朝的军队有三部分：一是由商王直接掌握的常备军即“王室军”，该军以商民族贵族子弟为核心，平时担负王宫、都城的卫戍，征战时作为主力投入战场，是商王赖以对内镇压，对外进行战争的主要武装力量。到了商朝后期，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战争的频繁，商朝在“三师”

之外又组建了3个师的军队，这样，“王室军”一共达到6个师的建制。二是诸侯方国军。与商朝有臣服关系的诸侯方国，都有出兵协助配合商王作战的义务。三是族军，即由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亲族组成的，以族为基本单位的军事力量，受商王统一调用和指挥。

西周则进一步将全国武装力量分为周天子直辖的军队、诸侯国军队等数个部分，并严格规定各类武装力量的限额。天子直辖的军队有西六师、殷八师、东八师等。西六师也称宗周六师，兵员以周族人员为主，为王室的主力部队，由周王亲自掌握，驻守都城镐京，保护王畿。殷八师是周公东征之后，以殷人为主组建的野战军，主要驻屯于殷商故地朝歌和其他战略要地，用以震慑殷商顽民并征讨东方各夷族。东八师即成周八师，主要驻防成周洛邑，保卫成周并控制东方、南方。师是当时军队编制的最高单位，若按《周礼》规定的每师2 500人计算，则西周自初年起就有至少5.5万人的正规军。

四 “分封诸侯、拱卫王室”的国防方略

武王灭商和周公东征后，西周拥有三代以来最广大的国土，如何保证国防安全并维护统治，是当时的头等大事。所以西周王朝按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总原则，实行“分封诸侯、拱卫王室”的国防方略，并在夏、商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奴隶制国家的军事制度，以服从阶级统治的需要。

（一）重视国防力量的整体布局

战略部署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对军事力量进行合理的配置与安排，将兵力集中于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作战方向和地区。西周按照宗法血缘原则，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西周初期，大小诸侯国约有一千多个，其中由周王新封的近四百个，大国约 71 个。这些和周王亲疏不等的大小诸侯按其等级区分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被分封的各级诸侯，代表周王室镇守四方，并捍卫王室，对周王要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等义务，从而构成国防屏障。如西周以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以东的昆明池北岸）作为国都，体现了直面来自西北游牧民族威胁的战略意图。同时，通过营建东都洛阳，以控制关东大平原进入关中的战略通道。秦朝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在军事部署上仍然一直沿袭着这一中外相维、居重驭轻、内重外轻、强干弱枝的思想，首重统治中心的稳定和安全。

（二）建立防御要塞体系

在这方面，西周王朝的主要举措有三：一是继承商代以来的封疆警卫制度，并遵循分封制的精神，在重要的战略地点派驻部队，设置官属机构，实施警卫屯守。灭商和平定“三监之乱”后，又分封诸侯，经营成周，组建成周

八师，设立驻屯基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军事防御据点。这就构成了较为严密的军事系统，在西部以丰镐为中心，在东部以成周为中心，两者又在周王的统一指挥下，结合成一个整体，构成了保卫王朝安全的军事防御体系；二是在枢纽关键之处修筑城池，提升守御的实力与功能。灭商后，周王朝在分封诸侯的过程中，曾掀起过一个全国性的筑城高潮。其最主要的标志是成周（今河南洛阳）的修建，并在此处驻扎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成周八师；三是加强道路建设。至少从周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就重视在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之后加强道路体系建设。如，周朝为保持两京（镐京与成周）之间的交通畅通，修筑了宽阔平坦的大道，史称“周道”。此后，为密切与诸侯国的联系，确保王都与各诸侯国交通通畅，便于部队机动和军情传递，周王朝还以王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构筑了以军用为主的国家一级道路，仍称之为“周道”，建立情报传递系统——烽燧。这一道路体系西南至巴蜀（今四川），北至



函谷关

秦、晋（今陕西、山西），东北到燕、齐（今河北、山东），东南达淮夷（今安徽、江苏），南至申、荆（今湖北）。据史载，当时的“周道”路面平直，路幅宽阔（《诗经·小雅·大东》就有“周道如砥，真直如矢”的记述），可供四马战车通行无阻；道路两侧又遍植树木以加强养护。

五　夏、商、西周的兵种与作战方式

恩格斯说过：“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奴隶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青铜冶炼业的出现，改变了石器时代生产工具和作战兵器合二为一的状况，并由此导致了战车大量应用于战场，步兵和车兵成为主要的战斗兵种，进而促进了奴隶制社会作战方式的发展与革新。

（一）夏商时代的兵种与作战方式

夏、商时期已产生了步兵、车兵、马队和弓箭兵等主要兵种，几乎囊括了冷兵器时代中国军事史上除水军之外几乎所有的兵种。不过，由于不同民族或部族的经济形态主要取决于其生产工具的类型和水平，而生产工具又对该部落的兵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事狩猎和农业的部落，

在夏代诸部落中占较大比例，因而徒步作战就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战争方式。

从甲骨卜辞看，步兵也是商代兵员最多、使用最广泛、战斗力最强的兵种。甲骨卜辞中如“王其步伐夷”、“余步从侯喜伐夷方”、“步伐舌方”等，多用“步伐”一词。按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的解释，所谓“步伐”，就是不驾车，不骑马，用步卒作战。这说明在商代，尤其商代前期，步兵常常实施独立作战的任务，是作战的主体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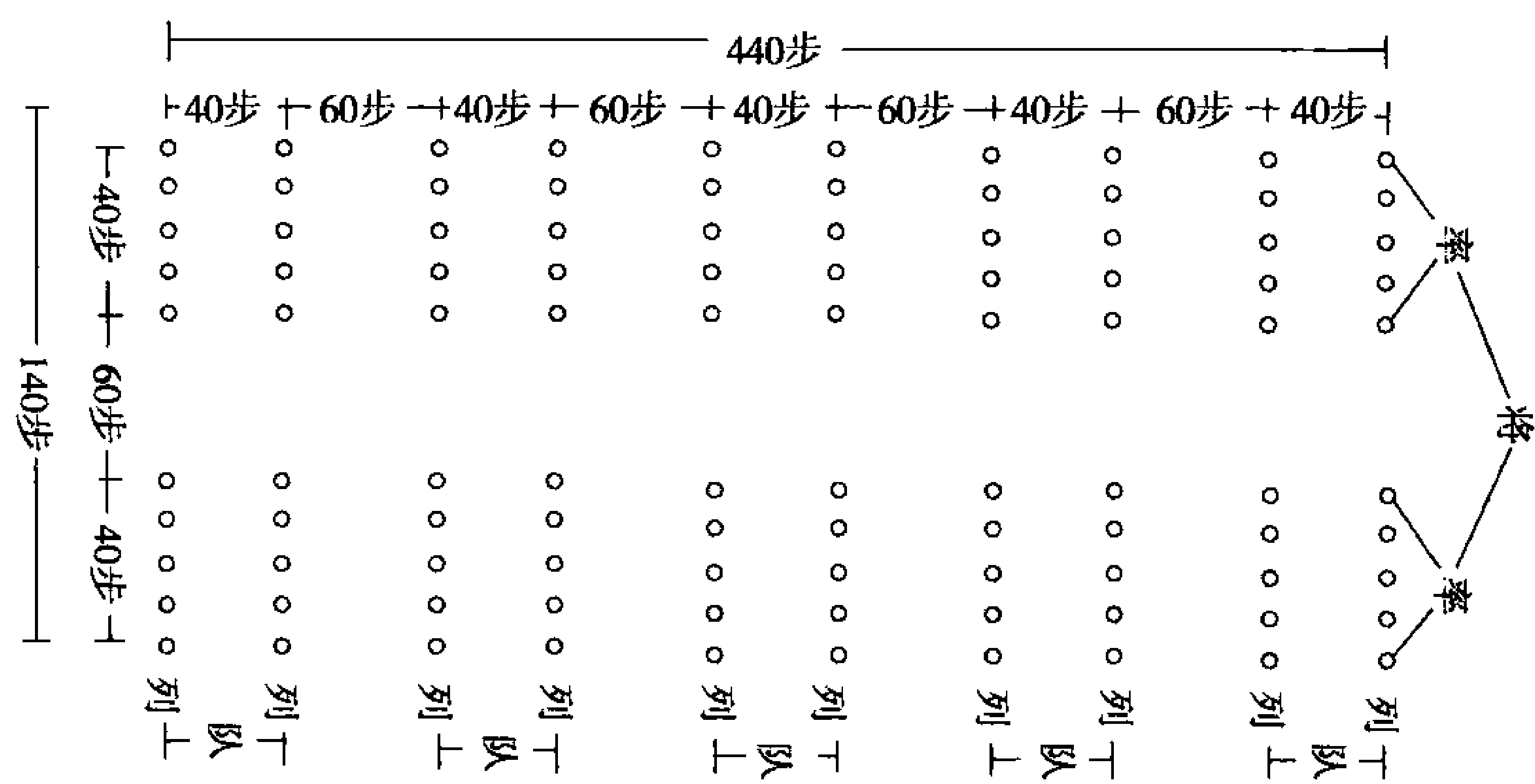
车的发明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初期，由于畜力驾挽的成功首先用于狩猎，又随着狩猎技术的成熟逐渐用于战争。文献记载有“奚仲作车”，又说奚仲“为夏车正”，所谓“车正”，就是管理造车、用车技艺的官员。所以，可以认为夏朝已有为数不多的车兵。但车战真正成为一种作战方式还是在商代。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战车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发现，当然，战车及青铜盔甲，只有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武士才装备得起。商代战车的战术编组也已经初步定型，战车部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成为驰骋战场、冲锋陷阵的重要兵种，而车兵的存在与战车编组的初步定型化，则意味着早期车战时代的来临。此外，步兵、车兵协同作战也在战争中广泛运用，并达到了相当水平。

至于骑兵，也可上溯到夏朝。夏朝的众部族中就有一些是从事畜牧为主的部落，游牧部族惯于骑马，夏朝可能有一定数量的骑兵。同时从商代已有骑乘之习看，夏朝的

人也具备骑乘的条件。但由于尚未发明马镫和马鞍，骑马作战需要极高的个人技巧，所以，零星出现的骑兵在战争中尚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二）西周时期的车战鼎盛

车战的鼎盛，以及战车会战成为最主要的作战方式，是在西周时期至春秋前期。当时车兵已完全代替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战车数量激增。为了便于作战和管理，战车与步兵一般实行合同编组，以战车和甲士为主体，每车配备一定数量的步兵，组成军队最基本的战术单位“乘”。乘包括战车甲士、车属徒兵、辎重车和后勤徒役，它也是计算军事实力的基本单位。当时每乘实行 30 人制，即战车 1 辆，官兵 30 人，挽马 4 匹，辎重车 1 辆。作战时，则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对战车进行临时编组，称作“偏”。所以当时计算国家军力时均以“乘”为单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秋后期。至于车战的具体方式，一般情况是，在



车战方阵

决战之前，敌对双方的战车均要排好阵势，击鼓为号，各以鼓点的节奏控制推进速度，向对方接近，发起攻击，即所谓“成列而鼓”、“不鼓不成列”，以保持车队队形。当快接近时，战士们先以弓箭射击对方，然后快速向敌阵冲击。在双方交错的一刹那，“车错毂兮短兵接”，车上的甲士以戈、矛、剑等武器进行格斗。最后车毁马毙，甲士们则弃车肉搏。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车战战术相当程式化，十分呆板，但是在广阔的平原战场上，战车横队的攻击力量较之战术同样呆板的步兵阵形仍然要大得多，因此，战车作为冲锋陷阵的利器，几乎主宰了战场，车战也取代步战而成了最主要的作战方式。

车兵部队的编成

单位 项目	军	师	率	卒	两	伍
指挥官爵位	卿	中大夫	下大夫	上士	中士	下士
指挥官	将	帅	帅	卒长	两司马	伍长
编制人数	1.25 万	2 500	500	100	25	5
战车乘数	125	25	5	1	0	0
所辖单位	5 师	5 旅	5 卒	4 辆	5 伍	5 人

（附：西周以前，并没有军的编制，都是以师为单位的。春秋以后才出现了军的编制。到春秋末期，各国兵力已大大超过此数，而且车兵都是以“乘”来计算，很少见使用“军、师、旅”为单位的。本编成只作为西周和春秋早期的一例。）

战车和车战的历史证明了武器装备与作战方式交互作用这一普遍规律。车战中最为重要的兵器是弓箭和长柄的格斗兵器。因为乘车作战，双方尚未短兵相接时，弓箭最

具杀伤力，一旦双方的战车接近、交错，长柄武器则是车战甲士必不可少的基本装备。所以，因马车的出现而产生了车战，而车战又促进了武器装备长度的增加，并进一步增进了弓箭的重要地位。不过威风凛凛的战车也有它的缺陷，即只有在平坦开阔的地形上才能发挥作用，不能用于沼泽、丘陵、山地作战，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使用范围。到了春秋后期，随着兵器杀伤能力的不断发展，以及作战地域扩展到丘陵、山地，战车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显赫地位，被密集的步兵方阵所取代。

第三章

中国军事史的大变局：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一 “尊王攘夷”与争霸战争

(一)“尊王”与“攘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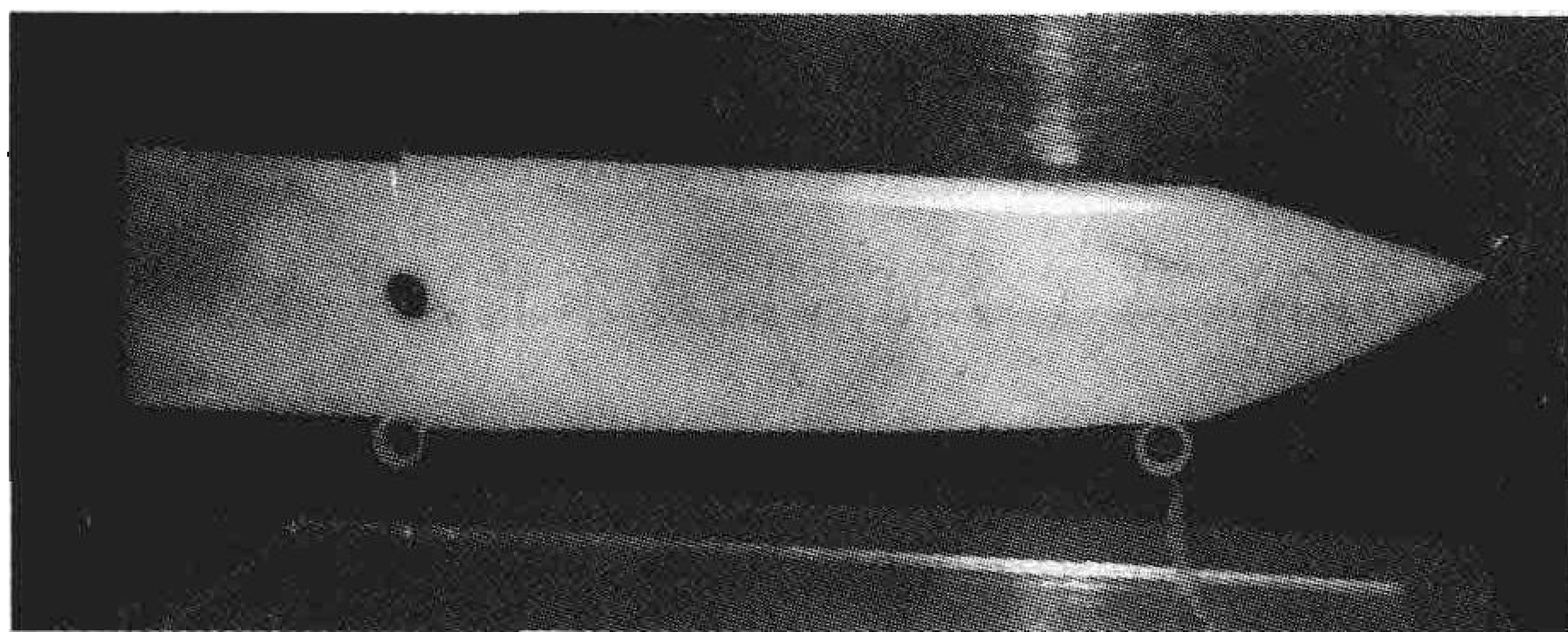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之后，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威权逐渐丧失，无力担当抵御戎夷入侵的大任，周边部族伺机向中原进逼，疆土日益萎缩。如此，大国为了争霸，小国为求生存，不断打破周朝的定制，加强实力扩军备战，奴隶制的军事体制走向崩溃。在竞争中首先强大起来的诸侯，开始打着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族入侵的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从事争霸战争，从而形成了“春秋无义战”的混乱局面。

各诸侯国都根据战争需要扩充军队，扩大部队编制。如晋国，按周制只能拥有1军，实际上扩充到3军3行，即有6个军。与此相对应，在兵员征集上，各国也打破了兵役等级制的限制，其基本趋势是，逐渐废除西周以来“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制，扩大征兵的范围。尤其是到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为大幅度扩充军队，实行普遍兵役制，取消服兵役的身份限制，放宽服役年龄。这样，各国兵力猛增，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得以建立，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争霸战争之中。而且，战事的复杂和频繁，原来只适合于平原旷野作战的车兵难施展，从而使步兵作为独立

兵种得到发展。春秋后期，吴国之所以能长驱数千里攻下楚都郢，靠的就是步兵的优势。

武器装备在这一时期也有新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就是战车大量增多，其数量成为衡量军事实力的标志。春秋前期，即使大国，每次参战也不过战车数百辆，而到中期，一个诸侯国拥有数千辆兵车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传统的刺杀武器如戈、矛、戟，制作工艺水平已大大提高，更加灵巧和锋利，新式兵器——剑，因轻便和便于格斗，在步兵中普遍装备，从而提高了步兵的战斗力。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抛射兵器——弩，远距离杀伤力超过其他任何兵器，反映了武器机械化的趋势。

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武器的更新促使作战方式的改进。各诸侯国在战争中普遍注重战斗队形的排列，训练、行军和作战注意布阵的千变万化，以发挥整体优势，增强战斗力。正是在如此背景下，才演绎出了形形色色的“尊王”和“攘夷”的争霸战争。所谓“尊王”，就是代替已经衰微的周天子行使权力；所谓“攘夷”，就是团结中原诸侯共同抵御周边夷狄进逼中原。



春秋玉戈

（二）第一个登上霸主之位的郑庄公

最早揭开春秋时期争霸战争序幕的，是处于中原腹心地带的郑国。

郑国的第三代君主郑庄公，姬姓，名寤生，他在位 40 余年，对内平定共叔段的叛乱，稳定政局，发展农业，扶植工商，繁荣经济，富国强兵。对外，巧妙利用自己身为王室卿士的地位，挟天子而令诸侯，制定了远交近攻、联合与国、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争雄天下。

郑庄公还顺应战争形势的变化，革新作战方式，灵活运用战术，为保证战略方针的顺利实施创造必要的条件。在公元前 718 年进攻卫国的“制北之战”中，郑庄公一方面派大夫祭仲、原繁、泄驾率三军北上迎敌，另一方面命公子忽、公子突暗中率领一军迂回到卫国的援军燕军的背后。结果，当燕军按传统战法全力对付正面的郑军时，太子忽等率所部署制北驻军向燕军侧后发起突然袭击，出奇制胜，此役是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战争史上最早的实施迂回夹击的成功战例。

公元前 707 年，周桓王率周室联军进攻郑国，郑庄公起兵抵御，双方在繻葛（今河南长葛东北）兵戎相见。是役，郑庄公采纳公子元建议，制定了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方针，即先击破联军中薄弱的左右两翼，尔后再集中兵力攻击周桓王亲自指挥的联军主力中军。在布阵上，

则采纳高渠弥的建议，布列“鱼丽阵”，即在三军的部署上，两翼靠前，中军稍后，呈倒“品”字形，像张网捕鱼似的打击敌人，并且把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的两侧及后方，从而形成步车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结果，郑军大破周室联军，射伤周桓王。

繻葛之战后，华夏诸侯几乎都云集在郑庄公（已自称郑伯）的旗帜下，郑庄公俨然成了重振华夏的带头人。

（三）齐桓公“九合诸侯”

在春秋争霸的近300年中，齐桓公是最具影响的人物。他第一个登上霸主的地位并“九合诸侯”，率领中原各诸侯国北御戎狄，南扼荆楚，一生都在进行“尊王”与“攘夷”的伟大事业。

齐国是周初分封姜尚之后建立的诸侯国，地位本来就高，兼疆土广大，物产丰富，很快就发展为东方的泱泱大国。公元前686年齐桓公上台后，又任用名臣管仲为相，整顿内政，打破奴隶制下国与野的界限，同时“作内政而寄军令”，改组和建立新型的社会组织，把国都周围和广大农村的士、农、工、商按新的行政方式加以管理，从而使社会组织体系与军事组织体系相一致，即五人为伍，五家为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这种以军事组织加之于社会组织的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了齐国经济、军事的大发展，使齐国一跃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国。

就在齐国奠定霸业基础的同时，华夏各诸侯国正面临北方狄族和南方强楚的两面夹击，齐桓公及时地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并取得了周王的支持，以诸侯之长的身份号召保卫和光大华夏文明，此外，他多次主持诸侯间的盟会，如北杏之盟中，齐桓公即与中原诸侯约定：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敌不让戎夷入侵中原等。此后，齐桓公团结、统率中原诸侯，北抗戎狄，救助燕国，迁徙邢国，保存卫国。当时只有南方的楚国不服，屡向中原进逼，所以齐桓公和管仲又决定南伐荆楚，率齐、宋、鲁、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向楚国兴师问罪，逼楚国与中原诸侯签订召陵之盟，从而阻遏了南方强楚咄咄逼人的北进势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又在葵丘（河南兰考）两次举行会盟，以盟主的身份向各国宣布同盟条约：第一，要团结友好，不要互相攻伐；第二，要共同修水利预防水患，不许以邻为壑；第三，邻国发生灾荒要予以救济，不准拒绝或禁止邻国来买粮即“拒粜”。举办葵丘大会，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走向了极盛。所以历史上称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四）晋楚争霸战争与晋文公“退避三舍”

齐国在齐桓公死后发生了内乱，霸业一蹶不振。中原各国群龙无首，重新陷入相互攻伐的无序状态，而北狄和南方的楚国则乘机夹攻中原。称霸心切的宋襄公虽然想效法齐桓公建立霸业，无奈国家弱小，又拘泥礼法食古不化，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军大败，他本人也成为楚国的俘虏。直

到晋文公重耳回晋国掌权，中原诸侯才有了新的霸主。

公元前636年，在外流亡逃难达19年之久的公子重耳回到晋国，当上了国君。重耳多年在外，备尝艰辛，也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执政后大力调整内政，结束了内乱，同时发展经济，恢复生产。军事上则将原来的1军扩充到3军以至6军，并加强训练，晋国一跃而为最强大的中原诸侯。而此时，实力雄厚的楚国正步步向中原渗透，成为晋国的劲敌。

在双方争霸过程中，有三次大的战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们是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楚军并胁从陈、蔡、许诸国军队，围攻宋国国都（商丘），宋国向晋国求救，晋文公认为这是打击楚国、奠定霸业的绝好机会，于是决定出兵救宋。次年，晋文公即率军攻卫国破曹国。晋文公的企图是通过攻击楚国的盟国曹、卫，诱使楚军北上作战，从而解宋国之围。同时，也避免援宋时遭曹、卫的夹攻。

此时，楚军长期围攻宋国，顿兵坚城之下，加之远离本土作战，已经师劳士困。同时，秦、齐两国已同意援助晋国，大有晋、齐、秦联合攻楚之势，所以，楚成王决定收缩战线，撤宋国之围。但骄傲自负的楚军大将子玉极力请求要与晋军决战，率军直逼晋军的驻地陶丘（今山东定陶）。

晋文公见子玉率楚军气势汹汹而来，立即下令晋军主动向卫国境内退避三舍（古时一舍为三十里，三舍即九十

里），以避开楚军的锋芒。同时，先让一步，也便于赢得诸侯的同情，激励全军的斗志和士气。此外，城濮离晋国本土较近，军队补给供应方便，便于齐、秦、宋各盟国军队就近前来会合。而各诸侯大军会合后，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在于己有利的城濮战场，将孤军深入、师老沮丧、后援难继的楚军一举击败。于是，晋军如期退至城濮（今河南范县南）的预设战场。战斗开始后，晋军分三路首先发起进攻，一举击溃了由陈、蔡两国军队组成的楚军右翼。然后，狐毛、狐偃则在上军中虚设晋军中军的旗帜，且战且退，楚右军子西部紧追不舍，却突然被原轸率领的晋中军拦腰截断，狐毛、狐偃立刻率部回头夹击，歼楚左翼。子玉见左右翼皆溃，仅靠中军难以与晋军作战，仓皇南逃。晋文公大胜之后向周王献俘，被封为诸侯之长，并大会诸侯于践土，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它结束了齐桓公死后十余年间中原“诸侯无伯”的混乱状态，晋文公“取威定霸”，确立了以晋为“伯”的相对和平稳定局面，同时也扼住了楚国北上的势头。因此，城濮之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重大战役的本身，因而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会战之一。

当然，城濮之战中受到重创的只是子玉所率领的楚军，并未彻底打败楚国。战后，中原诸侯在晋国的领导下，继续与楚国抗衡长达100年左右，春秋历史进入了晋、楚长期

争霸中原、互有攻守、相持不下的阶段。晋、楚这两个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又进行了多次战争，尤其经过著名的邲之战和鄢陵之战两次著名会战，终于形成战略均势。

（五）争霸战争的尾声：吴越战争

春秋后期，晋、楚、齐、秦四大强国趋于衰弱，被迫放慢对外扩张争霸兼并活动的步伐。与此同时，偏居于东南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加入了大国争霸的行列。

首先是吴国作为一个新兴强国的迅速崛起，与其西边的强国楚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而晋国出于自己同楚国争霸中原的需要，主动与吴国缔结同盟，让吴国在侧后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国势力的北上。此后，吴、楚两国先后爆发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战争，结果，楚国日遭削弱，国势颓落；吴国兵锋咄咄逼人，渐占上风。到吴王阖闾时，终于爆发了双方决定性的战争——柏举之战。

发生于公元前506年的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是役，吴军在阖闾、伍子胥、孙武、夫概等人的指挥下，先以“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方式疲楚误楚，同时剪楚羽翼，伐谋伐交，创造了十分有利的进攻态势。待一切就绪后，即果断进击，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等战法，长驱直入，五战入郢，从而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越国是古代越族人所建立的国家，政治中心在今浙江绍兴市一带。在允常和勾践统治时期，越国的实力有相当大的增长，成为南方地区仅次于楚、吴的大国。然而吴越国相邻的地缘环境，势必导致两国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同时，因为晋国的联吴方略，置楚国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而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则利用越与吴的矛盾，积极争取和扶植越国在侧后威胁吴国，以减轻吴对楚的压力。

吴越争战持续了多年，处于弱势的越国在越王勾践的领导下经过20余年的卓绝努力，“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终于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后发制人，大创聚歼，彻底灭亡了世仇吴国，成为春秋后期的最后一位霸主。

不过，无论是吴楚战争，还是吴越角逐，其规模与影响已远不及当年晋、楚争霸的势头了，这预示着春秋时代的结束，战国军事新的气象已呼之欲出。

二　春秋中期至战国军事领域的革命

春秋中期至整个战国时代，中国历史经历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剧变。此前，尽管争霸战争不断，但周王作为名义上的统治者，仍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尊重，尚未形成社会的全面动荡。而春秋中后期以后，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一

切原有的社会秩序不复存在，求生存、求富强、求战胜成为时代主题。于是军事领域出现了全面革命：各国争先恐后地改革军事制度，肆无忌惮地全面动员，整军备战，重视步兵、骑兵等野战兵种的建设。战争成为各国生存的最重要手段，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群雄之间展开了全面的大厮杀，进行旷日持久的大战和真正你死我活的较量角逐，兼并战争的结果是由秦国“定于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全国统一。

（一）军事技术的突破和社会组织的军事化

春秋时期，铁器虽已出现，但并未得到普遍使用，到了战国，则迎来了冶铁生产的第一次大发展。钢铁兵器大量出现和使用，不仅孕育着青铜兵器盛极而衰的契机，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作战方式、编制体制的改革，并为大规模的步、车、骑战提供了物质条件。尤其是到了战国晚期，钢铁兵器以更快的速度登上战争的舞台，北方的秦人最早用钢制武器取代青铜武器，用骑兵取代战车兵，南方的楚国和中原的三晋也都开始用钢铁兵器装备部分部队。锋利铁兵器与“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的远射强弓劲弩的配合，使得当时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明显的提高。

在社会领域，春秋争霸接近尾声之时，也正是社会大动荡之秋。与礼乐崩坏相伴而来的，是奴隶制全面崩溃，当日的战事已突破了礼的束缚，一个新的时代——封建制

时代已经到来。社会体制正在革故鼎新，而频繁激烈的战争，已成为波及全民，关系政权存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于是，各国为适应兼并战争的需要，奋起变法，改革了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确立新型的政治制度，加速社会组织的军事化，在国防上实行战时体制，全力参与兼并战争，以争夺土地和人口。

魏国的魏文侯抓住时机，最早在魏国实行比较彻底的封建改革，他励精图治，广揽人才，重用法家的开山大师李悝为相，实行变法，废除世袭禄位的旧制度，以法治国，大力推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政策，采取“尽地力之教”的措施，发展农业经济，巩固新政权的经济基础。同时推行“平籴法”，兼顾士农工商的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并将社会组织改组为郡县制。在军事方面，吴起对魏国的军事制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建立了“武卒制”，对士兵进行严格的挑选和合理的训练，同时提高士兵的待遇，使军队战斗力大为增强。结果，魏国第一个称霸中原。继之而后，韩国任用法家的另一代表性人物申不害为相，实行社会改革，并按照“循名责实”的原则，建立了一套适应封建统治的行政系统。接着，楚悼王任用大政治家、军事家吴起在楚国实施变法，打破宗法血缘贵族的统治，调整社会关系，富国强兵，“砥砺甲兵，时争利天下”。此外，齐国的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厉行法制，改革吏制，强化中央集权，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北方的燕国也礼贤下士，重用乐毅、邹衍、苏秦等

人“修法令”，推行富国强兵的改革。而在各大国中，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的则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改革的重点则是“令民为什伍”、“奖励耕战”，用军事原则加之于全民。风起云涌的变法运动，其主线是“富国强兵”，核心是将社会组织军事化，确立适应大规模兼并战争需要的战时体制，准备作长期的大厮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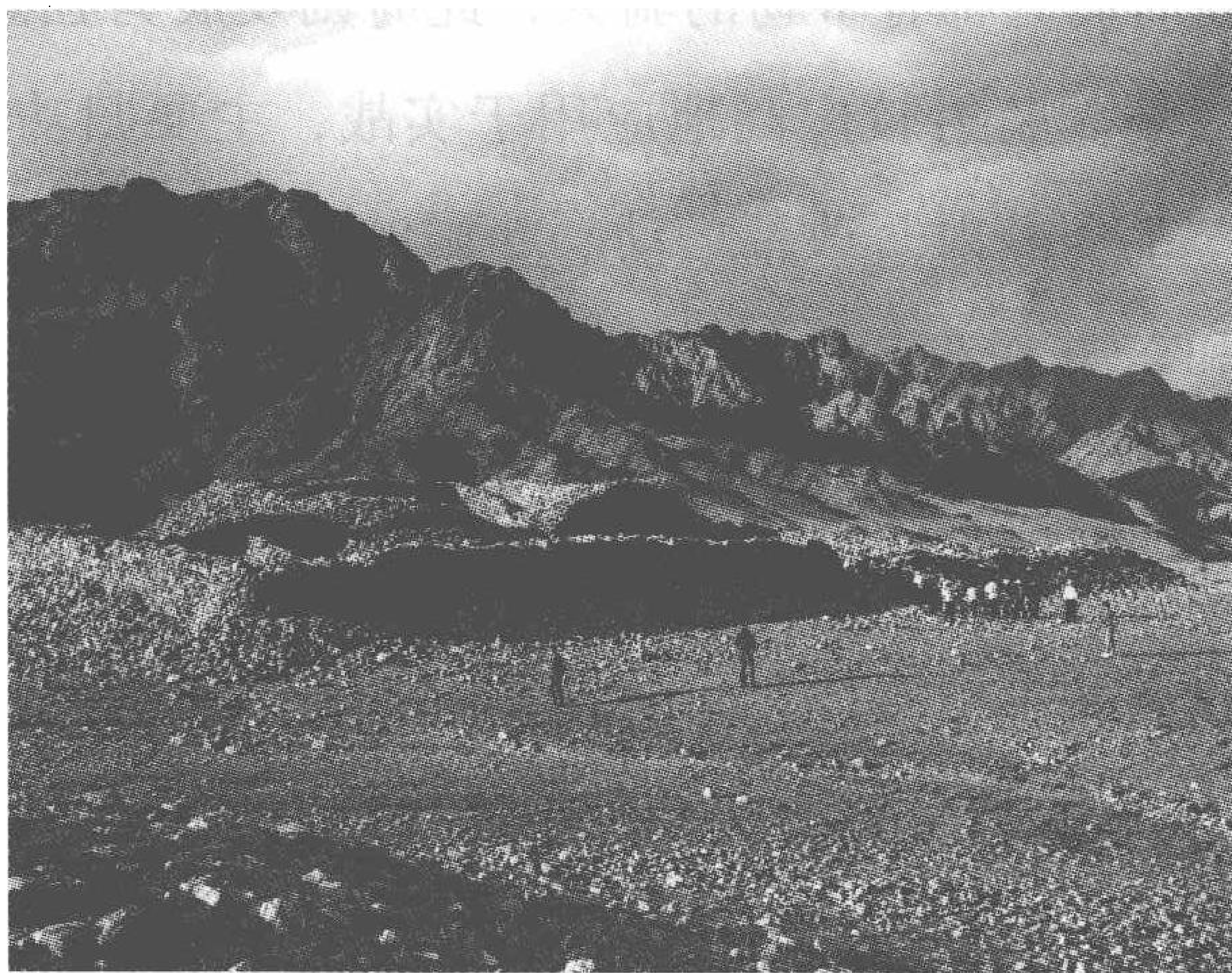
通过变法，各国相继确立了以郡县制的社会组织为基础的兵员征集制度，按照郡、县、乡、里等地方行政体系征发“编户齐民”入伍作战。只要是国家“编户齐民”中的男丁，从15岁至60岁，均有义务为国家服兵役。郡县普遍征兵制的推行，奠定了中国古代征兵制的基本方式，满足了步战成为主要作战样式、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要求。

（二）胡服骑射

春秋时尚为稀有事物的骑兵，此时则发展为独立兵种，并投入战场。骑射较广泛地应用于实战，主要归功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运动。赵国的安全环境比较恶劣。其东北和东方是东胡、燕、中山和齐国，北边和西边则是林胡、楼烦和匈奴。赵国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即位后，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以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核心，推行改革。其措施就是学习少数族的长处：“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他亲自身穿胡服，并改原阳（今山西大同）为“骑邑”，用来专门训练骑兵，在战国时代率先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成为赵国军队新的最重要的兵种。骑

兵的机动灵活和强大的战斗力，使中原各国的车兵和步兵军队相形见绌。此后赵国靠着这支骑兵，打败了北边的林胡、楼烦，扩地上千里，建立云中郡、雁门郡，又两次攻中山国并最后吞并了中山国，国家实力大大增强，外扼强秦，东抑齐国。一直到战国末期，赵国仍然民富国强，是唯一能与强秦相抗衡的大国，成为秦国兼并六国的主要对手。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标志着骑兵开始发展成为独立兵种。激烈的兼并战争以它几乎强制性的法则，使各诸侯国也随之效尤，重视骑兵建设，骑兵遂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兵种。至于匈奴等少数族，更是精于骑射，拥有强悍善战的骑兵队伍。当然，因为地域限制，战国时期最为重视骑兵建设和使用的还是北方各国，而南方因缺少马匹，加上战场的地理条件限制，对骑兵的使用并不多。



赵国修筑的高阙塞

（三）春秋中期以后战争方式的革命

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在战争指导上，有着浓厚的“军礼”传统，战争双方往往共同遵守“正大不诈”的礼义、道义原则，使本来你死我活的战争显得彬彬有礼。其具体表现是：

战争目的上的“征伐以讨不义”，即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杀其君”等违犯周礼的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在军事行动时机上，有“不加丧，不因凶”的限制。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则必须在行动中贯彻“礼”、“仁”的原则，“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比如，作战双方必须先约定好时间、地点，列好阵，然后大张旗鼓地出师，绝不搞突然袭击，这才叫“堂堂之阵”；约束战争手段的使用，即使两国交战也相对温和，投入兵力有限，战争时间短暂。军事威慑多于会战，从而追求以战迫和的境界，致力于“不战而屈人之兵”；战胜后“服而舍之”的宽容态度，只要对方屈服，承认周天子权威，便偃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的机会。战争指导上的这种浓厚的尊崇旧“军礼”的风气，使得当时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的残酷一面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宗旨的温和一面。

春秋中期以后战争实践的发展，则改变着人们的战争观念，并直接引起作战方式的革命性变化。

就战争的宗旨而言，争夺和控制土地、人口、财富与

资源，成为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而争夺霸主地位“号令诸侯”、维护礼乐秩序的争霸战争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战争旷日持久。最终，兼并战争中的佼佼者结束群雄并立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就战争规模而言，持续时间长，过程十分残酷。随着各国相继实行封建改革，富国强兵，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数众多，装备精良、颇具战斗力的新型军队。战时体制的建立以及军事力量的增长，一次战争直接参战者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战争的激烈程度和规模之大是以前任何时期都不可比拟的。尤其是决定战国历史走向的大会战，如齐魏马陵之战魏军损失 10 万之众，秦韩伊阙之战韩军被斩 34 万，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卒 45 万，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些战事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也称得上是规模宏大，空前激烈、残酷的大会战。此外，战场地域广阔。当时战场几乎已不受任何地形条件的限制，只要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战场既可以是平原旷野，也可以是山地丘陵，江河湖泽则有舟师往来穿梭，甚至城邑和要塞攻防战也屡见不鲜。在战争观念上，“军礼”传统被彻底摒弃，出现了作战指导上的重大革命，诡诈用兵、“兵以诈立”的观念在战争实践中得到最广泛的认可。

同时，战时体制的确立，新兵种、铁兵器的投入战场，对兼并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进战争向纵深发展，而战争方式、战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激烈的野战取代了车战，多兵种协同作战渐趋普遍；注重灵活地使用

兵力并根据具体情况变换战术，迂回、包围、截击、追击、伏击、奇袭、奔袭等战法被广泛采用，出现了远距离奇袭战、奔袭战、城市攻防战（如战国前期的晋阳城攻守战）、阵地战、伏击战、迂回包围战，讲究进攻方式的突然性、运动性。

三　从兼并到统一

占据战国历史舞台中心并主宰着当时国际战略格局的，无疑是“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在整个战国时期的200余年间，七大国角逐称雄，不断上演纵横捭阖、干戈不休、争霸兼并、你死我活的战争场景。

（一）魏国初霸中原及魏齐争霸

1. 揭开战国兼并战争序幕的晋阳之战

公元前455年（周定王十四年），战国时代兼并战争的序幕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当时，控制着中原霸主晋国的，是该国的四大家族：智伯、韩氏、魏氏、赵襄子。他们根本就不把毫无实权的晋哀公放在眼里。四大家族中势力最大的智伯为了独占晋国，联合并挟持韩、魏，对拒绝他勒索的赵襄子大开杀戒，将赵襄子死死围困于晋阳城中。赵国军民坚守晋阳城，但赵襄子毕竟军力弱小，财尽粮绝。关键时刻，赵襄子的谋士张孟谈临

危受命，利用韩、魏两家与智伯的矛盾，说服韩、魏掉转矛头，共同反对智伯。公元前453年，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赵军深夜偷偷掘开智伯所筑的用来水灌晋阳城的晋水大堤，滔天的洪水反而涌向智伯的军营。这时，原来与智伯一起围困晋阳城的韩、魏之军，也趁着智伯军队大乱之机，突然从侧翼发动进攻，与正面进攻的赵军一起夹击智伯的军队，活捉并诛杀了智伯及其家族，瓜分其土地，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面。

战后，韩、赵、魏事实上成为三个独立的封建国家。这一石破天惊的事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战国时代的来临，兼并战争从此全面上演。

三家分晋后，魏国捷足先登，占据了春秋时代霸主晋国的精华地区：它地处天下枢纽的中央地带——中原，据有河东（今山西省南部）、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河内（今河南东部黄河以北地区）。晋国开国之君魏文侯实行比较彻底的封建改革，他在位50年，励精图治，广揽人才，知人善用，如重用法家的开山大师李悝为相，实行变法；用乐羊为将，攻取中山国。其后，魏武侯又起用大政治家、战略家吴起担当西向攻秦的重任，从秦国手中夺占“河西之地”，保持对秦国压迫性的攻势，使“秦国不敢东向”。在军事上，吴起还对魏国的军事制度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建立了“武卒制”，对士兵进行严格的挑选和合理的训练，同时提高士兵的待遇，使军队战斗力大为增强。结果，魏国一跃而成为当时的第一强国，从而彻底改变了自春秋

以来晋、楚、齐、秦四强争霸的战略格局。

2. 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魏惠王在取得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后，贸然决定将战略重点放在东方，起兵伐赵、伐韩，并致力于与齐国的角逐。这一不谙战略形势的鲁莽之举，不但分散了力量，消耗了实力，而且也四面树敌，陷于众矢之的的尴尬境地。齐、秦两大国自东、西崛起，奋力抗魏。其中尤以齐、魏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齐国自西周以来一直是雄踞东方的大国。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后，面对魏国向东扩张的严重威胁，一方面发愤图强，招揽贤能之士，改革吏制，强化中央集权，发展经济，加强国防建设；另一方面，制定和执行比较正确的争霸方略，伺机同魏国一决雌雄，夺取中原霸权。在这样的背景下，终于爆发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公元前354年，魏国借口保护卫国，出兵攻赵，包围了邯郸。赵王于危急之中，派使者前往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并接受了大臣段干朋主张的使魏、赵互相削弱，从而“承魏之弊”的战略。当邯郸形势危在旦夕，且赵、魏两国均已非常疲惫之时，齐威王认为出兵与魏军决战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任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率齐军主力救援赵国。孙膑根据魏、赵两国相攻长达一年之久，魏军的精锐部队全在赵国，留在国内的多是老弱残兵的情况，提出齐军应该迅速向魏国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进军，切断魏国的交通要道，攻击其防备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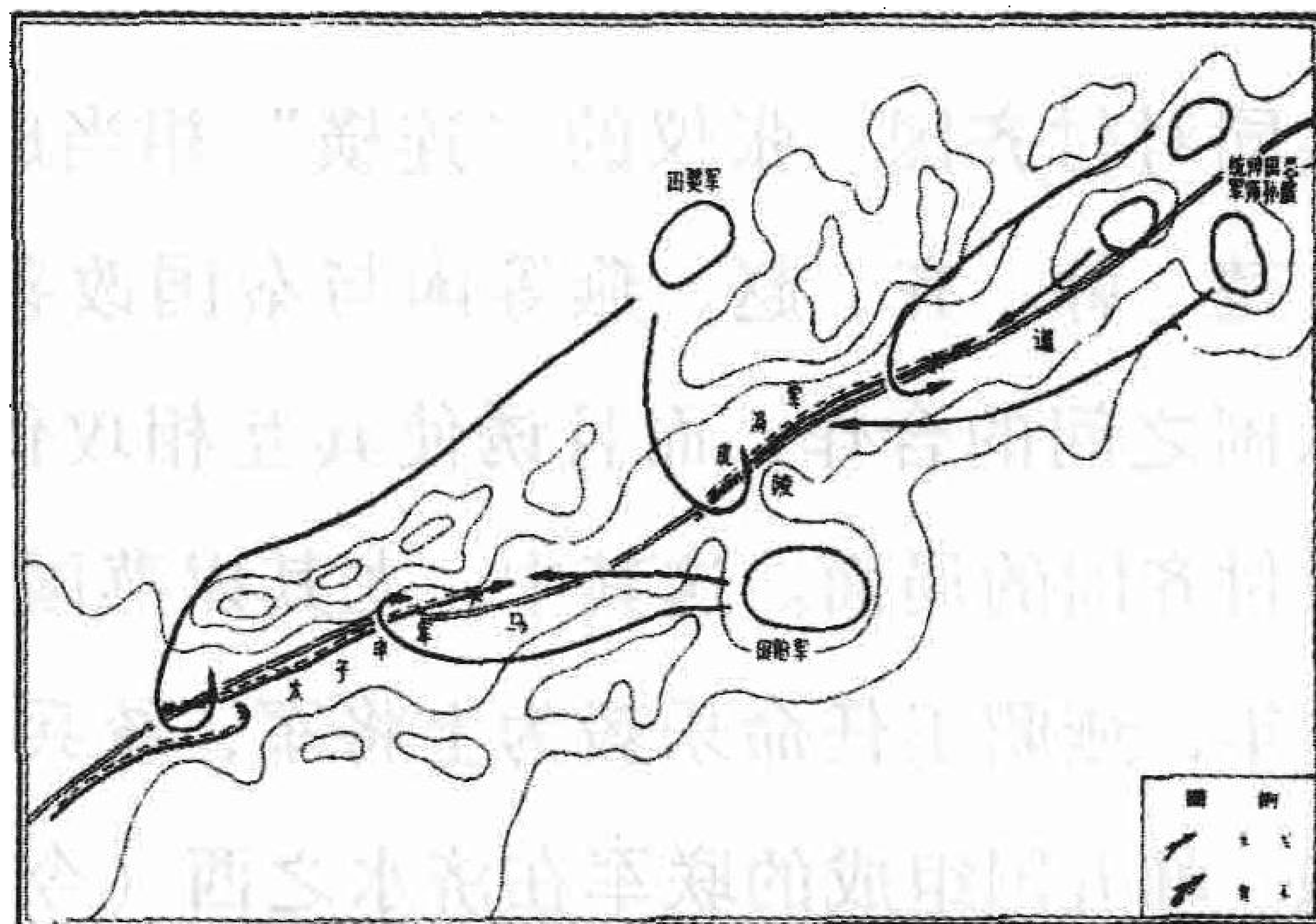
虚的地方。这样一来，魏军必然被迫撤回攻打赵国的军队，回师自救。如此，齐军可以解赵国之围，又能使魏军疲惫，找到击败魏军的战机。主将田忌采纳了孙膑“批亢捣虚”、“疾走大梁”的计策，统率齐军主力迅速向魏都大梁挺进，并切断了魏军的退路，逼迫魏军回救。庞涓得到齐军乘机袭击国都的消息，不得不以少数兵力控制刚刚攻下的邯郸，率主力回救大梁。而齐军主力则从鄄城秘密开进，在魏军回师开封的必经之路上，以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一带，一说今河南长垣县西）为伏击战场，大败魏军。庞涓仓皇而逃，险些丢了性命，最后勉强收拾残部，退回大梁。

经此一役，魏国实力受到削弱，齐、魏在东方形成战略均势，平分了东方霸权。而桂陵之战，也被作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而载入史册。自孙膑创造性地使用“围魏救赵”战法以来，这一战法一直为历代军事家所推崇，成为他们用兵作战的重要指导原则和克敌制胜的重要谋略。

公元前342年，魏国又联合赵国共同攻打比它弱小的韩国，韩国危在旦夕，只好派使者向齐国求救。孙膑向齐威王提出了“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即根据魏强齐弱的战略态势，先答应韩国的请求，以坚定韩国抗魏的信心，当韩国无力支撑时，再发兵前往救援，从而既让韩国感激涕零，又趁机谋取战略利益，推翻魏国的东方霸主地位。按照这一战略，齐国援军没有去韩国与魏军直接交战，而是直趋魏国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见齐

军出动，便由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统率雄师10万之众，气势汹汹地向齐军直扑过去，企图和齐军一决胜负。孙膑针对魏军彪悍善战，素来轻视齐军的实际情况，与主将田忌共同定下了“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作战指导方针和具体的作战方案，诱使庞涓丢下步兵和辎重，只带着一部分轻装精锐骑兵，昼夜兼程追赶齐军。孙膑根据魏军行军速度，经过仔细计算，判断魏军很可能于傍晚时分追至马陵地区，于是，提前将马陵道作为预定的伏击战场。待庞涓带领魏军骑兵进入齐军的伏击圈，埋伏的齐军万弩齐发，魏军不是被杀，就是投降，庞涓智穷力竭，眼见败局已定，只好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又连续大破魏军，前后歼敌10万余人，生擒魏军名义上的主帅太子。

马陵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场示形动敌，以逸待劳，设伏聚歼的典范战例。魏国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而齐国则挟战胜之余威，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战国前期以来魏国独霸中原的战略格局被打破。



马陵之战

（二）合纵连横与秦、齐对峙

马陵之战后，战国进入兼并战争时期。齐、秦两强东西对峙，成为左右天下局势的主导力量，兼并战争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但随着诸侯合纵连横，这种均势不久即被打破，秦国的优势更加明显。

为对付秦国虎狼之师咄咄逼人的攻势行动，关东六国先后发动了六次合纵抗秦的行动，但因为六国各有自己的打算，长平之战前的数次合纵攻秦均无果而终。

面对关东六国合纵攻秦，秦国则以“连横”为手段，离间和分化关东六国。

齐国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则为秦国成功展开“连横”提供了良机。本来，在齐、秦东西对峙的形势下，齐国应该集中全力与秦争天下，但齐国统治者目光短浅，贪图近利，侵燕灭宋，四出攻伐，这反而引起了东方诸国的恐惧，于是各国都将齐国视为主要威胁。秦惠王不失时机地派张仪以秦相身份代表秦国到各国进行游说，策划和组织联合东方各国共同对付齐国。张仪的“连横”相当成功，先后说服了魏、楚、韩、齐、赵、燕等国与秦国改善关系，不仅破坏了六国之间的合作，而且诱使其互相攻伐，形成了各国联合对付齐国的局面。这其中，尤其以燕国最为积极。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统兵伐齐，燕、赵、秦、魏、韩五国组成的联军在济水之西（今山东高唐、聊城一带）一举击溃齐军主力，乐毅指挥的燕军在战略追

击中又攻占齐都临淄及齐国其他70余城，只剩下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两座孤城侥幸未被攻克。虽然最后齐国大将田单利用反间计反败为胜，但是经历了五国合纵伐齐的大浩劫之后，齐国的实力已急剧削弱，一蹶不振。而秦国在合纵连横斗争中，因为策略运用的高明，又一次成为坐收渔人之利的最大赢家。不仅削弱了东方劲敌齐国，而且挑起了东方各国的争斗，从而使主要争霸对手一个个走向衰落。战国历史从此又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远交近攻”与秦始皇“一扫六合”

五国合纵攻齐及齐国的衰落，为秦国实施东进战略，兼并六国，席卷天下，提供了极佳的机会。当时的秦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由秦国担当统一全国、结束割据的历史重任的形势日趋明朗。于是秦国蚕食缓进，重创急攻，破三晋，败强楚，弱东齐，构成了对山东六国的战略进攻态势。

在这一背景下，范雎提出了“远交近攻”战略思想，即对远方之国实行暂时的联合，争取其中立，然后腾出手来对邻近之国实施军事打击，蚕食土地，增强实力。在统一战争的作战指导上，不仅要攻夺六国的土地，扩大疆域，更要注重歼灭六国的有生力量，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的国力。至于达成“远交近攻”战略目标的具体方法、步骤，范雎认为首先要利用外交与军事威慑，迫使地处中央地带

的韩、魏与秦结好，控制这两国，然后威逼楚、赵，使楚、赵屈服，进而威慑远方的齐国。齐国依附后，再放手兼并韩、魏两国领土，而且韩、魏两国相较，应先取韩国，然后次第攻取其他各国。远交近攻策略的制定，照应了军事与外交的综合运用，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统一天下的高明的军事外交战略，为秦国一扫六合，完成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统一事业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规划。

秦昭王对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至为推崇，责成范雎将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并派五大夫绾伐魏，夺取魏国的怀（今河南武陟西）、邢丘（今河南温县东），迫使魏国亲附于己。接着又大举攻韩，先后攻取了陉（今河南济源西北）、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少曲（今河南济源西）等重要战略据点，进而以上党郡为战略跳板，对韩、赵虎视眈眈。

而赵国自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以来，拥有一支精锐强大的骑兵，军事实力迅速增长是当时关东六国中唯一能够与强秦相抗衡的国家。赵孝成王继位后，赵国人才济济，尤其是拥有廉颇、赵奢、李牧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还可以同强秦进行一番周旋。

周赧王五十三年（前262），秦军进攻韩国野王城（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切断了韩国南部国土与上党郡（今山西长治一带）之通道，将狭长的韩国拦腰截为两段。韩王不得已之余，急忙派遣使者入秦，以献上党郡为屈辱条件，向秦国求和。但上党郡守冯亭认为不如将上党献给赵

国，以利诱赵国援助韩国，共同抗秦，挽救韩国灭亡的命运。上党是战略要地，赵国方面自然乐于接受。

秦昭王大怒，决定出兵攻赵。周赧王五十四年（前261），秦昭王命令秦军一部进攻韩国缑氏（今河南偃师西南），直趋荥阳，威慑韩国，使其不敢增援赵国；同时命令左庶长王龁率领雄师扑向赵国，攻打上党。赵国在上党的守军兵力有限，遂从上党退往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同时，由赵国宿将廉颇率领的赵军主力也开往长平迎击秦军。因为秦强赵弱，赵军连战皆败，损失较大。廉颇鉴于初战不利和秦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及时改变战略方针，采取了持重待机、以守为攻的战略。他指挥赵军依托有利地形，筑垒坚守，拒不出战，以疲惫远道而来的秦军，并最终挫败秦军。这一作战方针的改变立即遏制住了秦军的进攻势头。秦、赵两军就这样在长平处于胶着状态。

为了改变被动局面，秦国君臣通过反间计离间赵王与前线主帅廉颇的关系，只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担任主帅。秦王得知离间计成功，立即调整战斗部署：增加攻赵部队，调遣骁勇善战的大将白起为上将军，代替王龁。白起针对赵括鲁莽轻敌的弱点，采取了后退诱敌、围困聚歼的作战方针，并对兵力作了周密部署。他以一部分前线部队引诱赵军脱离防御阵地。同时，利用“长壁”构成袋形阵地，以主力守卫大营，抵挡赵军进攻，并组织一支突击部队，待赵军进入预设的阵地，主动出击，消耗赵军的有生力量，此外，又以奇兵2.5万人埋伏在两边侧翼，一俟

赵军出击，适时投入战斗，奔袭赵军后方，切断其退路，以协同主阵地长壁上的秦军，完成对赵军的包围。赵军数次突围不成，被迫就地构筑营垒，转攻为守，等待援兵。秦昭王听到赵军主力被包围的消息，亲赴河内（今河南沁阳附近），征发当地15岁以上的男子编组成军，全部开往前线，增援长平战场。赵括在率军突围时被乱箭射死。赵军失去主帅，全部投降。投降的赵军中，除幼小的248人外，其余40多万全部被白起坑杀。

秦国在长平之战中尽歼赵军主力，扫除了自己东进吞并六国的最大障碍，从此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接着，秦国继续奉行远交近攻战略，对关东六国实施各个击破。

面对秦国的压力，关东各国无不感到震惊和恐惧。为挽救覆亡的命运，他们重新走上“合纵”抗秦的道路，以求自保。但因各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合纵攻秦不了了之。而秦国方面，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亲政后，确立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战略方针，对东方



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铜马车



威武的秦俑军阵

六国实施各个击破，加快了统一全国的步伐，先后亡韩、破赵、下燕、灭魏、并楚、降齐。公元前221年，在秦国军事、外交的双重压力之下，齐王建投降，齐国灭亡。至此，秦国终于以军事行动与外交相配合，结束了春秋以来500多年的群雄割据纷争混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开创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先河。

四 《孙子兵法》与走向成熟的中国兵学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兵家的出现以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兵学经典的面世，迎来了中国军事思想的繁荣和成熟。

（一）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主要兵学经典

《孙子》全书共13篇，计5 900余字，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重要的一部兵法经典，历来被列为我国兵书之首。它的篇幅虽然不大，但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一个包含了从战争准备到战争实施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完整的兵学体系。它自问世以来，对中国军事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具体来说：在战争观问题上，《孙子》主张慎战，重视备战，致力于追求"安国全军"的目标。在战略追求上，《孙子》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主张在战略谋划上做到胜敌一筹。通过"伐谋"与"伐交"，或作战行动上的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小代价夺取最大胜利。这一以谋制敌的全胜战略思想对中国历代兵学理论的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作战指导方面，《孙子》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避实而击虚"和示形动敌、奇正并用、"知彼知己"等一系列精辟、卓越的见解。在治军上，它提倡"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恩威兼施，文武并用。《孙子兵法》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已趋于全面成熟，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孙武之后，其后世子孙膑，秉承家学，凭着自己天才的智慧，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导演了中国战争史上"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两场享誉千古的经典战

例，改变了战国历史的走向；同时，他潜研兵学，总结和吸收了战国前期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发扬光大先祖孙武的兵学理论，著成兵法经典，建立了系统而又博大精深的军事理论体系，史称《孙膑兵法》。《孙膑兵法》无论是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丰富和发展了孙武等早期兵家的军事思想，揭示了相当广泛的战争规律，提出了许多卓越的军事命题，从而形成了独特新颖而又丰富多彩的思想体系，确立了自己兵家亚圣的地位。

战国时期吴起的《吴子兵法》，是一部几乎与《孙子》齐名的兵学经典。《吴子》不仅在战争观上有新的见解，而且在战争指导方面，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真知灼见。此外，在治军理论方面，《吴子》从法家立场出发，通过对治军实践的总结，提出了“以治为胜”理论。可以说，《吴子》是继《孙子兵法》之后又一部体系完备、思想精辟、价值巨大的兵学论著，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永远不可磨灭的地位。

《尉缭子》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又一部著名兵书，被作为兵形势家的代表之作。最能体现《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的，是其在战争指导方面的精辟见解。《尉缭子》认为，战争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三个“势”：战前的对敌优势，将战之时的作战布势，既战之后的凌敌威势。在作战指导上，《尉缭子》强调要精心运筹，营造最佳的战场布势，求得有利的作战态势。为此，战前必须周密准备，战争中要广施权变，迷惑、欺骗敌人，善于巧妙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正

兵和奇兵，善于审时度势、先发制人，避实击虚，从而出奇制胜。

《司马法》总体上是一部“军法”性质的著作，不同于讨论用兵之法的“兵法”一类兵书。因此，它的主要内容在于记载和追述古代军礼，即古代军队编制、阵法操练、指挥联络方式、阵法等。但因其书长期流传并定型于战国齐威王时期，其部分内容还体现了战国军事思想的时代特征。

假托姜太公所作而实际上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六韬》，则是一部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对儒、道、法、兵等各家思想兼容并蓄的著名兵书，体现了战国晚期军事思想发展的大融合趋势。《六韬》在战争观方面基本上是杂糅了先秦其他兵书的有关认识，而在战略指导方面，则继承了《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的思想，提出了“全胜不斗，大兵无创”（《武韬·发启》）、“上战无与战”等观点。在作战指导方面，《六韬》就步兵、战车、骑兵诸兵种协同作战战法，以及各兵种的作用、特点、优劣，均作了深入阐述。这些论述，很多都具有开创性，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古代的作战指挥理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儒、道、法、墨等先秦诸子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百家争鸣”，儒、道、法、墨等重要思想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战国黄老学派、商鞅、韩非、管仲、墨子等，都高

度重视对军事问题的思考与论述，对军事领域中的重大问题，诸如战争观、战争指导、治军思想、作战原则等，均提出了重要的命题，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有关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

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要就战争观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从道德主义立场提出了“义战”这一重要命题，着重从政治高度认识军事问题，重视政治对军事的规范和决定性作用，强调政治清明、民心向背对于战争成败的意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基于“无为”的立场，提炼出了“柔弱胜刚强”的策略之道、“守柔”的战略追求和后发制人的作战指导原则。至于法家，则几乎完全从功利主义出发，主张富国强兵、严明赏罚、以法治军。而墨家则从“非攻”的原则立场出发，提出了“救守”的作战理论，强调人们有责任、有义务积极救援遭到无理攻伐的弱小国家，与其休戚与共。此外，《墨子》还以大量的篇章系统论述了如何守城的问题，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作战理论方面，提出了重要的见解。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兵家与其他诸子对军事和战争问题多角度、全方位的思考，一起将中国古典兵学推向了高峰，标志着中国军事思想的早熟与成熟，确立了中国兵学的主旋律，规范了中国军事文化的特质。

第四章

秦汉帝国的军事

一　骑兵时代的来临

秦汉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适合骑兵作战的轻便锋利的新式钢刀、铁刀、长剑、环形大刀等各种钢铁兵器普遍装备部队，大大增加了士兵尤其骑兵的格杀能力，为骑兵时代的来临提供了必要条件。

因为国防上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于北方边境上强大的游牧民族军队，且战场多在西北及北部大漠南北，这就使中原封建王朝原有的车兵、步兵根本不适应作战对象与作战方式的变化，在游牧民族的骑兵面前穷于应付。于是，秦汉政府对车、步、骑、水军四个兵种不断进行调整，实行新的编组，并将骑兵作为对抗兵种予以重点建设。

汉初，为了抵御有“控弦之士三十万”的匈奴，汉文帝就开始大规模扩建骑兵。不过骑兵的大发展还是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为了改变汉朝军队与匈奴作战中的劣势处境，适时地做出战略调整，把发展骑兵作为兵种建设的首要任务，以提高军队远距离作战能力，发挥骑兵的机动力和冲击力，实现快速进攻或大规模的运动作战，从而“以骑制骑”、“与虏角逐”。为此，汉武帝在汉初数十年养马和原有骑兵的基础上，大规模地组建强大的骑兵集团，在京师军与地方军中扩建骑兵，增设了北军八校尉，其中屯骑、越骑、长水和胡骑四校尉，是掌管经过专门训练的精锐骑

兵作战兵团，兼具守卫京畿和战略机动的职能。另外，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良家子弟壮勇而善骑者充任的期门与羽林二军，除负责皇帝侍卫，也担负起培养骑兵将领的责任。除中央直辖的骑兵集团外，各边郡太守也拥有相当数量的骑兵。为发挥骑兵的战斗力，汉武帝还注重拔擢善于指挥大集团骑兵作战的优秀将领，加大力度训练骑射技能。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建立了庞大的骑兵集团，彻底改变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在兵种结构和组织方面的优劣态势。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时反击匈奴的历次重大战役，车兵已不复发挥重要作用，多用于后勤运输或作为御敌的障碍物，而步兵也多用于后勤运输，骑兵则完成了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军队中的第一主力兵种。从此，骑兵一直作为主要的突击力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二　秦汉时期的统一战争和巩固统一的战争

秦、西汉、东汉三个朝代，前后相继，缔造了国家的统一，并且为了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进行了多次平定叛乱、消灭割据的战争。

（一）楚汉战争与西汉王朝的大一统

史家称秦以“力”取天下，汉以“权谋”取天下。所

谓权谋，以《汉书·艺文志》的定义，即“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计巧者也。”从楚汉战争的过程来看，刘邦战胜项羽得天下正体现了“权谋”的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局中人和后继者。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秦朝的残暴统治之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其中又以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两大集团实力最强，他们为争夺全国统治权，实现天下统一，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揭开了长达4年的楚汉战争的帷幕。

早在楚汉战争前，刘邦集团和项羽集团围绕全国统治权的问题就进行过斗争。鸿门宴之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大肆分封诸侯。为了防止刘邦在关中坐大，项羽将其分封于远离关中和中原的巴、蜀为汉王。同时，又将关中一分为三，分封秦朝的三个降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史称“三秦”，以监视、遏制刘邦的势力。刘邦只好忍气吞声离开关中，前往巴、蜀。

1. 刘邦“还定三秦”的战略及其实施

项羽分封刘邦为汉中王，主要是想以三个秦朝的降将把持关中，阻断刘邦东进之路，但分封政策既瓦解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又因为分封的不公而造成了与其他诸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项羽刚刚东归，各诸侯就因分封不公，纷纷反叛。项羽为维护松散的统一，东征西讨，疲于奔命。这就为刘邦发展自己的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刘邦得以在巴蜀保存实力，养精蓄

锐，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正当田荣、陈余、彭越等人的大肆反楚，项羽后院起火，自顾不暇之时，韩信适时地向刘邦进献了千古名对——《汉中对》。在这一千古战略名对中，韩信首先对楚、汉双方的战略条件进行了综合比较，在此基础上正确预测了楚汉战争的前景，建议刘邦应以夺取关中、还定三秦为战略主攻方向，从而居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夺取战略主动权，为日后伺机东进、并吞天下创造积极的态势。

刘邦欣然采纳了韩信的献策，采取迂回手段，在陈仓（今陕西宝鸡）附近暗渡渭水，进而袭取雍城（今陕西凤翔），然后扫荡关中，势如破竹，次第攻占三秦，全部收复关中，夺取关中形胜之地，为“争权天下”取得了战略前进基地，并为最终战胜项羽，完成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彭城之战与成皋相持

一举平定关中后，刘邦又趁项羽陷于北上伐齐之机，完成了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楚汉二年（前205）四月，刘邦统率诸侯兵号称56万人讨伐项羽，正式揭开了楚汉战争战略决战的帷幕。汉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举攻克楚都彭城。然而在袭占彭城之后，刘邦满足于表面的胜利，置酒作乐，疏于戒备。平叛在外的项羽立即亲率3万精锐的骑兵回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速战速决，歼灭汉军达20余万之众。刘邦溃不成军，只带了数十名随从侥幸逃脱，诸侯也纷纷叛汉附楚。战局的发展开始急转直下。

彭城会战后，刘邦退守荥阳，与楚军相持于京邑（今河南荥阳东南）和索亭（今河南荥阳县境）之间。面对楚强汉弱的形势，刘邦根据杰出的战略家张良提出的正面坚持、敌后扰敌和南北两翼牵制的总战略，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和部署：

在正面战场，利用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的优越地形，分布把守险要，依托豫西丘陵山地，布置防御，拒项羽于汜水以东的黄河平原上，阻止楚军西进。同时，立即组建骑兵部队，任命灌婴为统率，作为生力军与项羽抗衡。此外，修筑甬道以连接敖仓（在今河南郑州市西北邙山上）、荥阳与黄河，取敖仓的粮食储备作为军粮，并屯重兵于成皋、巩县、洛阳一带，形成多层次的防御体系，以迎击楚军的正面进攻；

瓦解项羽集团。派策士随何去策反项羽最重要的盟友英布背楚归汉，进攻楚军的侧背，牵制项羽，从而切断了项羽的“左臂”；

在敌后，鼓动和支持彭越，使其在项羽的后方大肆骚扰；

加强关中根据地的建设。派萧何镇守关中，整顿内政，发展生产，为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和兵员；

拜韩信为左丞相，令其率兵北上，开辟北方战场，减轻成皋前线的压力，并集中力量逐次歼灭黄河以北的魏、代、赵、燕、楚和东面的齐等割据势力，向楚军侧后发展，威胁楚军侧背，切断楚军的粮道；

最后，任用陈平全面负责情报工作，对楚军进行大肆分化和瓦解。

以上部署，体现了“依托关中，正面相持，南翼牵制，北翼进攻，敌后扰敌，与间谋攻心战相结合”的对楚作战的全面方针。从而在西起荥阳东到彭城，南起九江北至燕、代的广大的空间里，展开我国战争史上空前壮观的战争。

在北方战场，名将韩信指挥汉军大举出击，先后灭魏、破赵、降燕，并在潍水之战中大破齐楚联军，全部平定齐地。在南方战场，九江王英布也在随何的劝说下起兵攻楚，迫使项羽不得不暂缓对荥阳的正面进攻，抽出生力军南征，他的两员大将项声、龙且率军与英布大战数月之久。英布失败后，干脆率军投降了刘邦，转战于成皋和南阳一带。在敌后战场，彭越在下坯、梁地对项羽的袭扰活动也愈演越烈，使项羽处于前后夹击之中。在正面战场，刘邦亲自率领一部分汉军利用荥阳一带的丘陵地形和敖仓丰足的粮食储备，与项羽打持久战，将项羽的主力牵制在荥阳一带。这样，在整个楚汉战争的相持阶段，项羽发动的多次正面进攻和围困几乎一无所获。而刘邦则开辟了多个战场，使项羽陷入战略包围中。待韩信破齐之后，直逼项羽的大本营彭城，项羽进退不得，只好与刘邦议和，双方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至此，战略主动权完全转移到刘邦之手。

3. 垓下决战

公元前202年10月，刘邦听从张良建议，乘项羽引兵

东归之机，指挥汉军对楚军实施战略追击，穷追猛打，开始了对项羽的致命一击。

11 月，刘邦的 10 余万大军首先与韩信的大军在颐乡（今河南鹿邑）会师。不久，彭越、英布等也先后到达，汉军方面总兵力已达 30 万人之众。刘邦遂令韩信统一指挥，韩信率军继续追击楚军至垓下（今安徽灵璧南），与楚军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会战。

会战开始前，韩信根据汉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对兵力进行了合理部署，史称“五军阵”：韩信率主力在中央，并指挥全军，其左翼由孔熙指挥，右翼由费将军指挥；其他兵力由刘邦指挥，部署于韩信之后，处于第二线；其后是绛侯（周勃）和柴将军的部队，处于第三线。此外，还有灌婴率骑兵往来机动，并随时准备着追击项羽并切断其退路。这一部署，纵深大，正面兵力密集，两翼灵活策应，有利于有效遏制项羽的正面突破。会战开始后，韩信从中央位置首先向项羽进攻，项羽挥军反击，韩信军失利后撤，汉方阵线上呈现凹陷，楚军紧随其后追击。这时，孔将军和费将军从两翼同时向已突入之楚军的后方实施包围，而韩信又率军回击，于是楚军前不能进，后不可退，被汉军及诸侯军重重围困。到了夜间，项羽突然听到“四面皆楚歌”，以为汉军已全部占领楚地，无心再战，遂丢下楚军残部，仅率 800 骑乘黑夜突围而逃。汉军方面则由灌婴率 5 000骑兵尾随追击至乌江（今安徽和县），项羽自刎乌江。至此，垓下会战以汉胜楚败而告终。经此一役，汉方

聚歼楚军主力，结束了长达5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次年二月，刘邦在洛阳正式称帝，建立汉朝，重新建立了一统的帝国。

（二）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

平定“七国之乱”是汉初消灭地方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

汉高祖刘邦错误地总结历史教训，在全国实行郡国并行制。他除了分封异姓功臣为诸侯王以外，还分封刘氏宗室子弟为同姓诸侯王，各予封国。虽然刘邦和吕后处心积虑地铲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但事与愿违的是刘邦一死，旋即祸起萧墙，各诸侯王的违法乱政，对抗中央，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并未因分封和血缘上的同宗而稍减，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与以诸侯王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为了汉朝的长治久安，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着手解决同姓诸侯王问题。

汉景帝的“削藩”政策，立即激起了各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和恐惧，吴王刘濞纠合了胶西王刘卬及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齐王、楚王等诸侯，又约请闽越、东越等出兵相助，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叛乱。叛军30万人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出发，北渡淮河，向西汉统治中心进发，计划渡淮河后，与楚军会师，夺取梁地，解除西进后顾之忧，西向攻取荥阳。然后与北路的赵国叛军和南路的南越叛军一起会师于洛阳，合力西取长安。面

对严峻的局势，汉景帝任命太尉周勃为汉军总指挥，统领36将军及汉军主力东攻吴楚。另派郦寄击赵，栾布攻齐，并以窦婴屯驻于荥阳，居中策应，决心以武力粉碎这场来势汹汹的武装叛乱。

临危受命的周亚夫认真制定了平叛战争的总战略：一是在战略指导上尽量避敌锐气，击其惰归。周亚夫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战略态势，认为对付来势凶猛、急于与汉军决一死战的叛军，必须避其锋芒，相机破敌；二是在战略主攻方向上以吴王刘濞所率吴、楚联军为打击的重点；三是在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上广纳众议，从而避短用长，抢占战略要地。周亚夫首先接受了谋士赵涉的建议，改变行军路线，平叛大军避开潼关、崤渑和函谷关的险道，而是改行长安东南，出蓝田、武关，迂回至洛阳，顺利抢占洛阳的武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荥阳要地，从而拒敌于无险可守的黄淮平原。在吴楚叛军急攻梁地的情况下，周亚夫又按照预先设计的战略，不急于率兵奔赴东南去救援正被吴、楚联军进攻的梁国，而是听从了邓都尉的建议，避吴军之锐气，进据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与梁国睢阳的守军形成犄角之势。这样，既可威胁吴楚联军的侧背，又可防止吴军绕过梁地西进荥阳。进据昌邑后，又深沟高垒，避而不战，待吴军久攻梁地不下，力疲志殆，陷于无法脱身的地步后，周亚夫则派弓高侯等率轻骑兵径出淮泗口，迂回到叛军的后方，切断叛军粮道，使叛军陷于粮尽兵疲的境地。等到叛军粮食断绝，又久攻梁地不下，急于寻找

汉军主力决战时，周亚夫在下邑（今安徽砀山）仍坚壁不出，进一步疲敌。最后，当吴军被迫撤退时，周亚夫立即率精兵追击，从而以逸待劳，变被动为主动，一举消灭了吴、楚疲惫之师。

（三）刘秀“柔道”取天下

刘秀出身于南阳豪强地主集团，既有政治资本雄厚，又具备敏锐的政治才能和丰富的军事韬略。绿林起义爆发后，他与族兄刘縯一起打出“复高祖之业”的旗号，组织地主武装，号称“舂陵兵”，与绿林军联合，汇入农民起义的洪流之中。更始政权建立后，他率军四处征战，屡立战功。尤其是在昆阳之战中，以杰出的指挥，以弱胜强，击破新莽军主力，为推翻王莽统治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起义军内部因争权夺利而发生内讧，刘縯被更始皇帝杀害。在这危急关头，刘秀以其成熟的政治智慧，忍辱负重，与杀兄仇人巧妙周旋，终于重新取得更始皇帝刘玄等人的信任，谋到了“破虏将军”的职务，受命前往河北。此后，刘秀抓住这一来之不易的机遇，走上了逐鹿中原、统一天下之路。

这场战争历时多年，先后经历了占据河北，平定关东，攻占关中，并陇灭蜀等几个主要阶段，堪称我国古代封建统一战争的一个典范。

首先是采纳邓禹的战略献策，前往河北这一新兴的战略地区，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广泛招揽人才，积极争取

民心，致力于河北这一根据地的经营，不断壮大实力。羽翼丰满后，公开与更始皇帝决裂，于更始三年（25）六月在鄗南（今河北柏乡）即皇帝之位，号令天下。接着，在攻取洛阳，站稳脚跟后，采纳来歙提出的《平陇蜀策》，制定了“联陇制蜀”，先关东，后陇、蜀，先东后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案，逐次消灭了刘永、田戎、秦丰等割据势力。既解除了对京师洛阳的重大军事威胁，又为日后西进赢得了重要的战略基地。然后，占据关中，进取陇、蜀。平定关东后，刘秀立即展开了对关中地区的军事行动，委派邓禹、冯异、耿弇、侯进等将领率兵经营关中，与取代更始政权占据长安等地的赤眉起义军争夺这一战略要地。经过崤底之役和宜阳之役，战胜赤眉军，牢牢控制了以长安为中心的大部分关中地区，为实现全国的统一又迈出了战略上的重要一步。

在占据关中，收降赤眉军，削平关东群雄之后，刘秀又根据由近及远，由弱及强的原则，制定了“先陇后蜀”的战略。经过历时 4 年的艰苦征战，终于彻底平定陇西地区。陇西既平定，公孙述割据的巴蜀便成刘秀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个障碍。刘秀再接再厉，他针对公孙述东依三峡、北靠巴山、据险自守的军事部署，制定了水陆并进、南北夹击、钳攻成都的作战方略。建武十二年（36）十一月，由吴汉所率的汉军主力在成都近郊与公孙述军队进行最后决战，大破蜀军，公孙述负重伤身亡。至此，刘秀取得了统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东汉王朝。

三　反击匈奴

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大规模的民族战争随之登场。

公元前218年，即统一中国后刚刚三年，秦始皇就派蒙恬率30万大军出征河套，于公元前215年收复了河南地，使匈奴失去了南下中原的跳板。为了巩固北部边疆，秦始皇又组织大批人力物力修缮长城，在原来战国时秦、赵、燕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举世闻名的国防工程——万里长城，以及关中通往北部边疆地区的战略道路——驰道和直道。同时，秦始皇还在新收复的河南地区设置郡县，组织移民到新收复地区垦田生产，从而很快将这一地区开发为富庶之地，成为秦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战略基地。

到了秦末汉初，北方的匈奴在冒顿单于统治下，威服草原各部，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万”，势力强盛，遂凭借其军事优势，不断南下袭扰。不仅重新夺取了河南地，而且将势力伸入河西走廊，控制西域诸国，从北、西、西北三个方向形成对汉朝的战略包围。因此，彻底解决了匈奴对边疆的威胁，成为汉朝边疆经营中的关键。而西汉政府鉴于国家初建，百废待兴，尤其是国力有限，难以与匈奴争锋于战场，不得不隐忍待机，在军事上采取守势，实行战略防御。

汉武帝继位后，汉朝经过近 70 年的励精图治和休养生息，国家政治修明，国库充裕，马匹大增，尤其是建设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军事训练也大有成效。一代雄主汉武帝适时转变战略，决定对匈奴实施战略反击和战略进攻，在西起河套、东至辽西（今河北卢龙东）的广大正面，先后与匈奴进行了多次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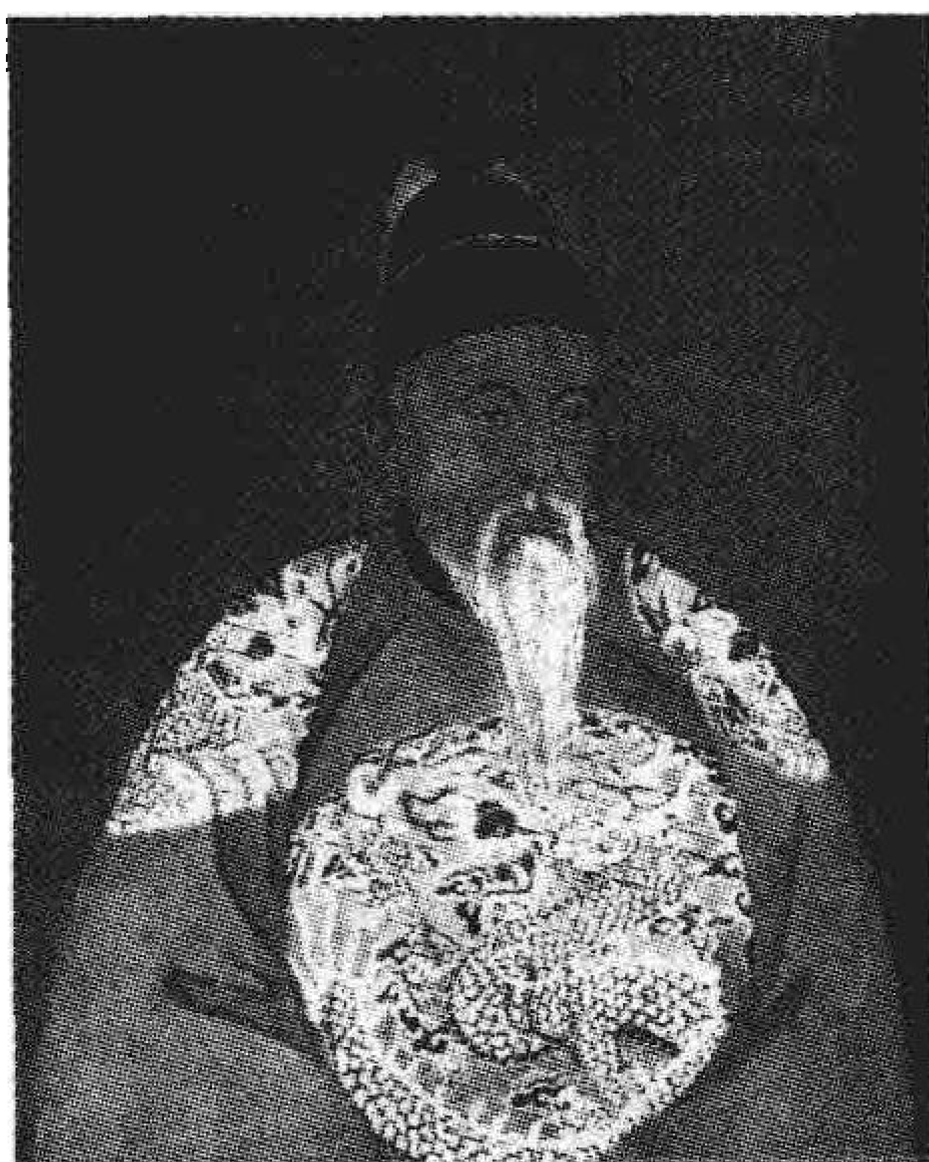
首先是发起河南、漠南之战。公元前 127 年，匈奴侵犯上谷（今河北怀来）、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汉武帝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策略，置上谷、渔阳于不顾，派卫青等率汉军主力由云中、朔方沿黄河向西迂回进击，突然包围黄河以南的匈奴军队，使敌措手不及，大获全胜，一举收复了河南地这一战略要地。公元前 124 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率军出朔方，进入漠南反击右贤王。另派李息率军出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牵制单于和左贤王，策应卫青。卫青以 3 万精骑出高阙塞外六七百里，夜袭右贤王王庭，迫右贤王北逃。

接着，汉武帝又根据匈奴单于王庭偏在东方，汉都长安偏在西方，匈奴利于东侵，汉军利于西击的战略态势，主动出击，发起河西之战，进攻对汉朝威胁最大且实力较弱的右贤王。公元前 121 年，汉武帝派大军分东西两路实施先发制人的出击，一路由霍去病等率数万骑兵出北地（今甘肃环县东南）向河西进攻，一路由张骞、李广率领 1.4 万骑兵出右北平（今辽宁凌原西南），进行策应。西路军霍去病率部深入 2 000 余里，过居延海（今内蒙古额齐纳旗东

南），奔袭祁连山，击败匈奴休屠王、浑邪王所部主力，迫降单桓、酋涂王、相国及其部众2.5万余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是年秋，浑邪王因连年失败，怕单于怪罪，杀休屠王，率部众4万余人降汉。河西之战的胜利，消灭了河西的匈奴势力，打通了西域，切断了匈奴之右臂，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从战略上孤立了匈奴。伊稚斜单于被迫远走瀚海沙漠以北，在东方则再难以发起有威胁性的进攻。

经过漠南、河西两大战役，汉匈双方主客变换，汉军已完全占有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汉武帝决定发起漠北战役，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集中了精锐骑兵10万人，组成两个大的战略集团：霍去病率5万骑兵出代郡，大将军卫青率5万出定襄，另外以步兵数十万、驭马十余万匹配合骑兵主力的行动。计划两大战略集团沿东西两路北进，在漠北合击匈奴主力。此役，卫青率主力穿过沙漠，北上千余里，击溃单于主力，并追击单于至寘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麓）的赵信城，放火焚毁其城以及匈奴的积粟，然后胜利班师。霍去病的东路军则深入2 000余里，跨越大沙漠，大败匈奴左贤王，歼其精锐，并追击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从此，匈奴再也无力大举南下，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全面胜利。

到了东汉，虽然匈奴乘中原战乱，一度势力复炽，控制了除莎车以外的西域诸国，并降服了鲜卑、乌桓等边疆民族，频繁南下。为解除匈奴的威胁，东汉王朝在战略上



光武帝刘秀像

采取了政治招抚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一方面，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对匈奴各部及受匈奴控制的其他少数族，进行分化瓦解，结果南匈奴、鲜卑、乌桓等族的相继归附，与东汉王朝一起共同对付北匈奴的袭扰；另一方面，积极把握战略时机实施军事打击。到汉明帝时，随着国力的强盛，东汉政府抓住战略时机，出动大军一举击败北匈奴，并在战后继续实行招抚政策，彻底解决了北匈奴对边疆的威胁。东汉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对东汉历史发展进程，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社会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　大一统的军事制度和国防方略

秦汉时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封建统一的国家。与此同时，也奠定了大一统的军事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防建设。

（一）中央集权的军事制度

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强化与巩固相一致，秦汉王朝采取各种措施，在军队领导体制和军队建设上全面贯彻大一

统的政治原则。

秦汉时期，皇帝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控制着战略方针的决策权，统军将帅的任免权，军队的调动指挥权。皇帝之下，太尉（汉武帝时改称大司马，东汉仍称太尉）虽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上只处理日常的军事行政事务。遇有战事，皇帝往往临时任将出征，战事结束，则罢归入朝。在军事领导机构方面，中央有两大军事机构控制全国军队，一是由郎中令、卫尉、中尉等组成的中央警卫部队领导机构，一是由太尉、将军、将等组成的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以领导各级地方的军队。它们互不统属，互相制约。负责中央最高军事行政的太尉（大司马）、属于禁卫军系统的郎中令、卫尉、中尉和战时指挥系统的将军幕府及地方上的郡尉、县尉系统，各自分别对皇帝负责，听从皇帝的统一指挥。这种分工合作、互相钳制的御军方式，可使“将无专兵，兵无常将”，从而保证皇帝独揽军权。

在军队构成方面，与全国统一后面临的形势、任务相适应，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将全国武装力量区分为中央警卫和作战部队、边防守备部队、地方郡县部队三大系统，形成“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三者各承担相应的军事任务，又互相配合协作，共同履行巩固国家政权、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统一的责任。

在全国军事布局上，则奉行强本弱枝、“居重驭轻”和内外相制的原则。这主要表现在，在地方和边疆部署一定

兵力的前提下，国家武装力量的驻防重心首先是以京畿为代表的政治中心，其次是边疆地区，最后才是其他地区，从而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居重驭轻”之势，以消弭地方的分裂叛乱和边防的危机。其中，中央军作为整个国家武装力量体系的主体，占有主导的地位，对地方拥有巨大的优势。它往往由皇帝的亲信、重臣统领，兵力集中，待遇优厚，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足以控制地方或边境的军队，保卫京师的安全。

（二）国防建设和国防方略

秦汉王朝在完成国家统一之后，形成了明确的将国家安全与国防联系起来考虑的国防观念，为了实现天下太平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非常重视建设强大的国防，并配合政治、经济措施而倡导和实施高明的国防战略，建立了以长城为主干的边防筑城体系，以首都所在地为核心的交通体系和边疆屯戍体系。

一是针对边防需要建设武装力量。在边防武装力量构成方面，确立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基本格局，而以中央派出的边防军作为守边的主要力量。同时，贴近实战需要发展对抗兵种。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秦、西汉、东汉三个朝代均加强马政建设，大力发展养马业，作为建设强大的骑兵部队的基础，到汉武帝时终于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集团。

二是加强边疆军事部署，重兵戍边。秦汉统治者从国

家大一统这一根本原则出发，非常重视从地缘战略高度维持在边疆的军事存在，以保证边疆稳定，其基本做法是：在边疆地区派驻重兵，形成重兵戍边的局面，作为捍卫边疆的主要力量；建立军政一体的边疆体制，形成严密的边疆军事系统。

三是“因险置塞”，加强边防防御设施。针对以骑兵为主体的游牧民族军队骑术精良，来去自如，飘忽不定，具有高度机动性的特点，秦汉时期中央政府依据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从战略全局和战役全局的需要出发，在敌必攻、我必守的战略、战役要点上，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边疆地区因地制宜进行了国防工程的建设，其最主要者就是举世闻名的国防工程——长城。长城虽然是一种线式防御工程，但并不是一道孤立的城墙，而是由许多障、塞亭、燧等点式环形工事组成的，是集中反映中华民族军事智慧的综合防御体系。

四是完善道路交通和军事通讯体系。如秦朝修成了著名的“驰道”和“直道”。“驰道”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直通各边疆地区；“直道”南起云阳（今陕西淳化县北）、北抵帝国的主要战略方向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西），全长“千八百里”（约合今700余公里）是为防御匈奴而新建的专用军事交通线。这一国防交通要道因与长城呈丁字相交，互为支撑，故有“直道”之称。同时，路况良好，能供车、步、骑组成的大军团顺利、迅速地通行，路上还有贮存军事装备及屯驻军队的兵站，可随

时以物资、兵力迅速地支援长城防线。一旦边疆有警，长城沿边戍卒立即点燃烽火，边防将领便可根据敌情作出相应的防御部署，中央也可以沿直道征调内地部队驰援，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汉王朝对秦代修建的“直道”、“驰道”，进行经常性的修整和扩建，完善和延长了秦的道路系统。同时，汉朝在统一西域后，还开辟了极具军事价值和商业价值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国西部边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此外，汉朝为了对西南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又修筑了通往西南民族地区的两条重要道路：“南夷道”和“西夷道”，将交通干线延伸到了云贵地区。

此外，秦汉在统一边疆之后，都曾实施军事屯田和移民实边的政策。这些战略性举措，对“以边养边”，对于开发边疆、巩固边防，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五　大泽乡·绿林·黄巾

在封建政治、经济、军事成熟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景观”——农民战争也与之俱生，从而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第一个高峰。

（一）大泽乡揭竿而起

公元前210年，“千古一帝”秦始皇帝在出巡返京途中病死，随秦始皇出巡的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

高等人，秘不发丧，篡改遗诏逼死长子扶苏，夺取了军权，立了二世胡亥，史称秦二世。

秦始皇在位之时，秦帝国已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秦始皇只是靠着严刑峻法才勉强维系统一局面，而秦始皇死后，胡亥、李斯、赵高等人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又大搞恐怖政治，大肆屠杀宗室、近臣，导致最高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帝国的瓦解已不可挽回了。

前209年，阳城（今河南太康）的地方官和军官强行押解征集的900名民夫前往1 000公里外的渔阳去换防，民夫中的陈胜和吴广被选出来协助管理。队伍急行军赶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县）时，因遇上了连绵的大雨，道路中断，根本不可能在规定限期内到达渔阳。按照秦帝国的严酷法令，这些人免不掉被处死的命运。面临这种处境，陈胜与吴广商议之后决定起义。为了作好舆论准备，陈胜假造了“鱼腹丹书”的异事，并让吴广夜里到附近的破庙中燃起篝火，学着狐狸大叫“大楚兴，陈胜王”，在民夫中树立了威信。时机成熟后，陈胜又杀掉了监押的军官，然后召集大家宣布起义。他说：“现在开小差逃走被抓回来是死，起来造反也不过一死，同样是死，还不如起来反秦。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白白送死，要死就死出个名堂！王侯将相难道就是天生的吗！”大家对陈胜的决定一致拥护，立即“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树起了反秦的大旗。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起义军攻下陈县，建立了“张楚”政权。各地闻风响应，甚至六国的旧贵族和其他对秦帝国心怀不满

的人，也都纷纷起来反秦。

陈胜除派人分头联络各地义军外，又立即兵分两路向秦国的统治中心进击。吴广率领的起义军主力西攻函谷关，威胁秦朝的国都咸阳，另一路则南下武关迂回西进，与进攻咸阳的主力相策应。吴广军至荥阳，遇秦将李由据险阻关，久攻不得进，陈胜又派周文率军 10 万绕过荥阳直趋函谷。秦二世得知义军入关，急将在骊山服苦役的奴隶、罪犯编成大军，由大将章邯率领，与起义军激战。周文因孤军深入，最后失败。而吴广在荥阳为部将所杀，大军为章邯、李由所破。秦军趁势扑向起义军的大本营——陈县。陈胜兵力不支败退，至城下父（亳县）为车夫庄贾杀害。

但秦朝并未将起义军彻底打垮。此后不久，项梁在南方起义，刘邦也在沛县起义，两支大军最终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

（二）昆阳大战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重重，王莽代汉后进行的改革，也未找到出路并缓解这种危机局势，反于走投无路之余发动了对外战争。当时关东连年灾荒，由饥民形成的流民大军，已为起义准备了力量。

17 年，新市人（今湖北京山东北）王匡、王凤在饥民拥护下在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起义。不久，琅琊（今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也举起了义旗。绿林军不断发展达 10 万之众，推刘玄为更始皇帝，建立了农民政权，起义

军一部进攻南阳，直逼洛阳、关中，一部由王凤率领，北上昆阳。王莽闻讯，急派王寻、王邑率大军40万，号称百万，由洛阳直扑昆阳，将之团团围困。当时驻守昆阳的绿林军不足1万，刘秀建议王凤坚守，自己率部突围求援。23年6月，刘秀率援军1万亲自冲锋，打破官军外围，又率敢死队出其不意，迂回官军侧后，向中军发起猛攻，与守城起义军内外夹攻，大败官军。这一战役被视为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昆阳之战后，起义军分兵进击，王匡攻克洛阳，申屠建等取长安，长安市民起而响应，杀了王莽，汉朝正式灭亡。但攻下长安后，绿林军内部分裂，更始皇帝刘玄被杀。不久，赤眉军进入长安，绿林军并入赤眉军。因为长期灾荒和战乱，关中一带乏食，起义大军无以自养，只好向东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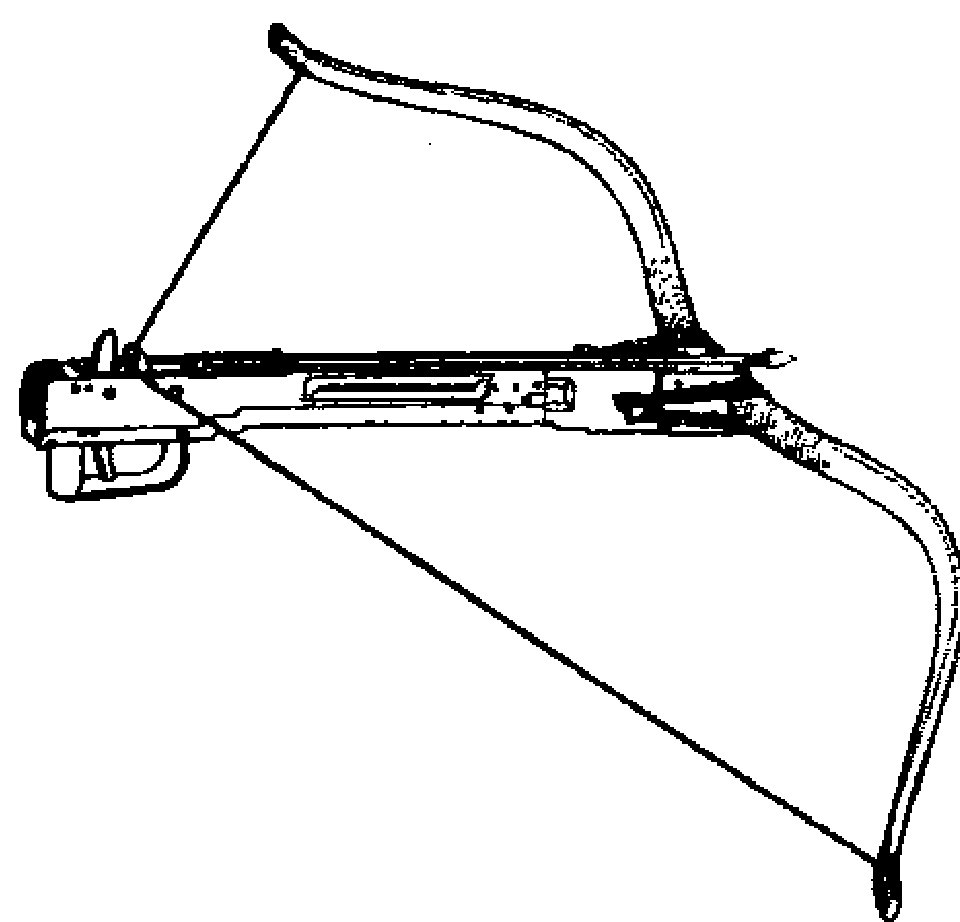
此前，刘秀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已与农民军分道扬镳，他曾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汉朝宗室的身份离开了诸侯争雄的中原，到河北招兵买马，并通过劝降征伐等手段，趁机壮大了个人势力，并以谨厚者的形象笼络各地地主武装，然后回军争夺中原，成为农民军的死对头。他趁农民军东归之际，在农民军的必经之地河南宜阳和新安两路截击，打败了赤眉军，此后陆续收复洛阳、长安，平定各路诸侯，统一全国，重建汉政权，史称东汉。

（三）黄天当立

刘秀建立的东汉代表的是豪强地主的利益，并没有解

决西汉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社会长期战乱之后，矛盾稍为缓和，但不久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朝政前所未有的黑暗，党争、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交替发生，终于引发了秦汉时代第三次农民起义——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领导人张角是一位传奇型的人物。在起义之前，他已利用太平道进行了多年的宣传、准备和组织工作，并制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但起事前因为叛徒的告密，起义不得已提前。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因义军皆头裹黄巾，故称黄巾军。东汉政府除派官军进行镇压外，又号召各地地方武装进攻黄巾军，起义军被各个击破。



西汉弩机

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董卓的凉州兵团进入中原，成为独揽军政大权的军阀。他控制朝政后，并未建立起新的秩序，反而杀皇帝刘辩，另立刘协为帝，以显示自己的权威，结果引起各方面的反对。同时董卓的士兵毫无纪律，入京后烧杀抢掠，激起洛阳人民的反抗。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军阀为争权夺利，联合出兵讨伐董卓，董卓鉴于压力，退出洛阳，并纵火将洛阳焚烧一空。而关东军逼走董卓后，又各自为政，全国遂至分崩离析，演化为魏晋南北朝近400来年的大动乱和大分裂。

第五章

军阀混战下的南北对峙

一 魏武挥鞭

汉末众多割据势力中，袁绍发展最快，占有河北、山东、河南等数州之地，而且袁氏四世三公，门生子弟遍天下，可谓地广人众。曹操则是汉末割据者中少见的风云人物。他自少即志在天下，敢说敢做，豪迈磊落。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不断用高明的策略在军阀割据的夹缝中壮大自己的势力。尤其在兖州牧任上，他打败青州黄巾军，收编降卒30万，从而占有黄河南北的兖、豫二州，成为袁绍的劲敌。

时值董卓乱后，东汉皇室无人理睬，颇具政治远见的曹操为杜绝天下有野心之人利用皇帝“借尸还魂”，遂听从谋士“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捷足先登，亲率大军到洛阳勤王，将傀儡皇帝刘协掌握在自己手中。后又借口洛阳残破，将国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许都，然后用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发号施令，无人理睬的皇帝反成了曹操手中的尚方宝剑，使他在政治名分上名正言顺，处于有利地位。袁绍到这时候才明白傀儡皇帝的用处。为了打击曹操，争夺中原，袁绍自恃实力雄厚，打着勤王的旗号南下与曹操决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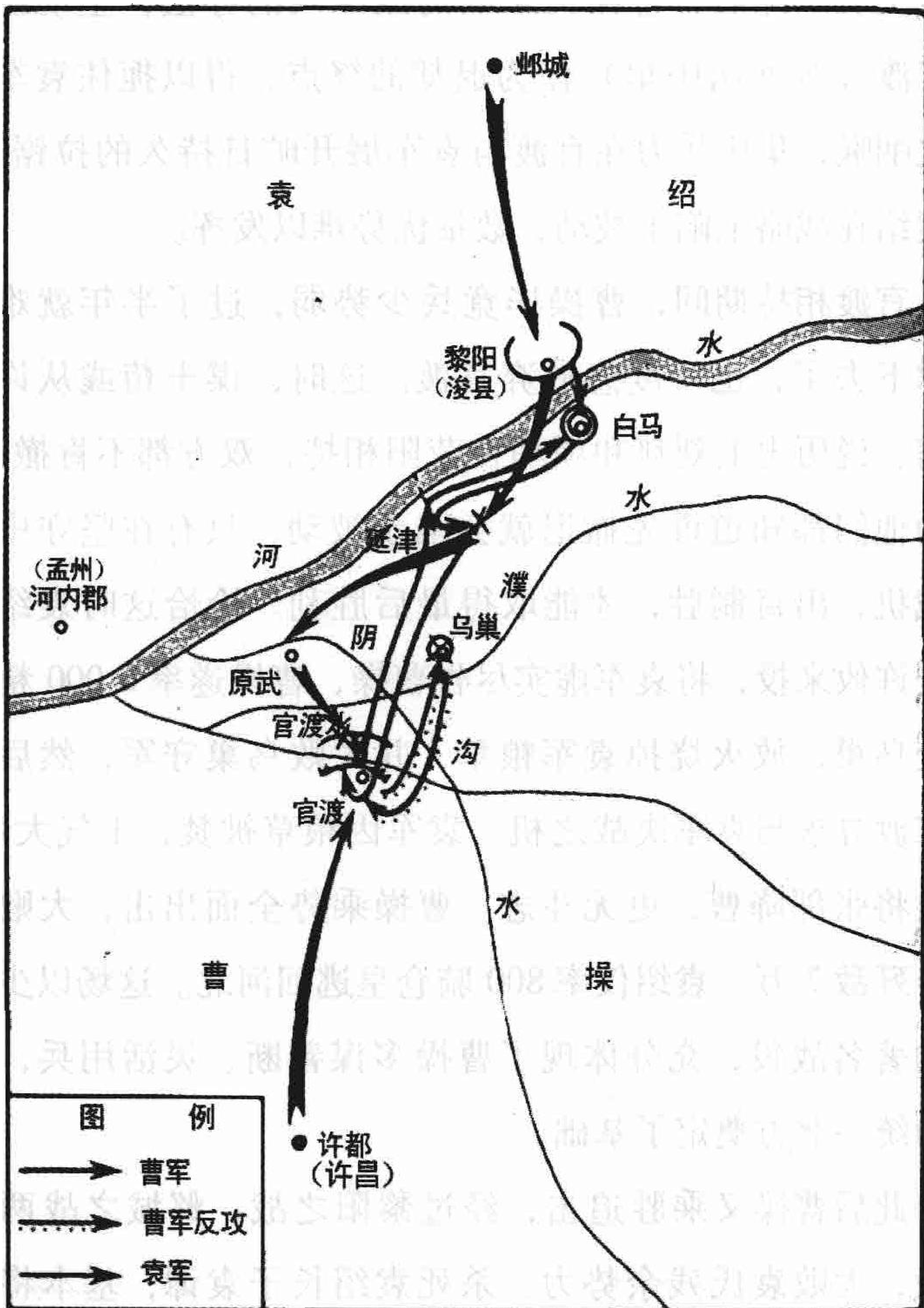
200年，袁绍亲率数十万精兵拟直捣许都。袁军一路顺利，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白马。但外线作战的袁

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就是大军猥集一路而不分进合击，结果数十万大军局促于一个战略方向，只想一线平推，沿黎阳——白马——许昌一线进攻。曹操则用声东击西之计，率主力佯攻袁军后方，当袁绍分兵来救时，曹操则急驰白马，斩颜良，解白马之围，同时又伏击杀死袁军另一大将文丑。此后，曹操又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主动撤退至官渡（今河南中牟）作为退却的终点，得以扼住袁军南进之咽喉，集中兵力在官渡与袁军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使袁绍在战略上陷于被动，数量优势难以发挥。

官渡相持期间，曹操毕竟兵少势弱，过了半年就难以支撑下去了，也一度想放弃官渡。这时，谋士荀彧从许都来信，说历史上刘邦和项羽在荥阳相持，双方都不肯撤退。因为他们都知道谁先撤退就会陷于被动，只有在坚守中捕捉战机，出奇制胜，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恰恰这时袁绍的谋士许攸来投，将袁军虚实尽告曹操，曹操遂率5 000精兵夜赴乌巢，放火烧掉袁军粮草，并大败乌巢守军，然后回军官渡寻求与袁军决战之机。袁军因粮草被焚，士气大落，兼大将张郃降曹，更无斗志。曹操乘势全面出击，大败袁军，歼敌7万，袁绍仅率800骑仓皇逃回河北。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充分体现了曹操多谋善断、灵活用兵，同时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此后曹操又乘胜追击，经过黎阳之战、邺城之战两次战役，大败袁氏残余势力，杀死袁绍长子袁谭，基本将河北这一战略要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207年，曹操又率军

北征乌桓，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在班师经过碣石山时，乘兴作《观沧海》。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对曹操的事业作过很高的评价，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表达了一代伟人对这位历史英雄的缅怀。



官渡之战示意图

二　东风不与周郎便

唐朝大诗人杜牧有一首著名的咏史绝句《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宋代曾有人评此诗说杜牧是"措大不知好恶"，认为他的"若非东风，胜负易主"的议论，见识太低。实际上，负济世之才，通晓兵法的杜牧，不过借咏史聊吐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并非将孙、刘的胜利仅仅归功于天时。但考诸赤壁之战之实，天时于军事之重要，自是不能断然否定。

北征乌桓之后，踌躇满志的曹操曾赋诗《龟虽寿》，表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决心乘胜南下，先攻荆州，再下扬州，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208 年，曹操发兵 20 余万，乘胜南下，浩浩荡荡杀向长江一线，大有一举吞并南方的气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迫使新任荆州牧的刘表次子刘琮奉表投降。并击败依附刘表的刘备势力，夺取战略要地江陵，计划乘胜顺流东下，占领整个江东地区。

南方的两股势力孙权和刘备虽弱但也并非不堪一击。当时刘备于屡败之后仍占有樊城，并三顾茅庐请出了"智绝"诸葛亮。诸葛亮为刘备纵论天下形势，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其核心就是跨有荆、益二州，军事上联吴抗曹，然后出师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东吴的孙权、鲁肃和周瑜

面对强敌压境，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也决定与刘备联合，共御曹军。曹军虽人数众多，但长途奔袭，锐气已消。同时，部队到了南方江河水泽之地，不得不舍鞍马而就舟船，等于弃长就短。东吴方面，则有战斗力颇强的水师，刘备虽新败，仍有精兵4万，这些都使南方有潜力可以与强曹背水一战。

战争开始后，双方前锋相据于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曹军因初战不利，退至长江北岸，为使士兵适应水战，曹操下令用铁环将战舰首尾相连。东吴大将鲁肃针对敌强我弱，不宜持久，以及曹军士气低落，战船联结等情况，建议采取火攻，奇袭破曹。周瑜遂安排老将黄盖诈降，由黄盖率艨艟斗舰10余艘，上载浸满油脂的干柴，接近曹军水寨，时东南风劲吹，黄盖的船队同时点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将曹军水寨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大火又蔓延到岸上的曹军大营，曹军在混乱中烧死和溺水而死者不计其数。趁此机会，孙、刘联军水陆并进，追击曹军。曹操全军大溃，率残众仓皇逃回北方。至此，赤壁之战遂以孙权、刘备方面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

赤壁之战作为中国战争史上运用火攻、以弱胜强的典范战例而永载史册。同时，作为曹操集团与孙权、刘备同盟之间的一次决定性战略会战，赤壁之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经此一役，曹操虽仍然控制北方广大地区，但看到人力物力还不占绝对优势，所以暂缓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刘备借得了荆州，乘机获取了立足之地，进

而占有了四川，拥有剑阁、三峡的地理形势，并不断以攻为守，发展势力；孙权在江南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可以依长江天险，坐保江东以观成败。在这种形势下，220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建魏国；次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再次年，最没政治资本的孙权也在建康称吴王，天下三分，鼎足而立，历史进入三国时代。

三　王濬楼船下益州

曹魏末年，中央形成了以宗室曹爽和权臣司马懿为首的两大集团。在双方的斗争中，司马懿这位指挥对蜀作战的主将，发动了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又独揽了军政大权，废曹芳另立曹髦，其后司马师之弟司马昭又继之当政，独掌兵权，声震朝野。260年，魏帝曹髦见威权日去，逃不掉被废的厄运，想作最后一搏，于是召来卫士和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等被他废掉的耻辱”。要求大家跟他一起去讨伐司马昭。这冒险的孤注一掷，结果自然是以卵击石，落了个身死国亡的下场。

杀死曹髦后，司马昭已扫清了夺权的一切障碍。但为了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更加冠冕堂皇地取曹魏而代之，决定发动征蜀战争，认为蜀国“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其战略是先灭蜀国，然后据上流之便，顺江东

下，水陆并进消灭吴国，重新统一全国。

蜀国在三国当中本来就处于弱势。继彝陵之战大伤元气后，对魏国的长期北伐，也导致兵疲民穷。尤其是后主刘禅懦弱无能，虽有诸葛亮竭力辅佐，也仅能自保。而诸葛亮死后，蜀国后继乏人，刘禅昏庸无道，贪图享乐。宦官黄皓又取宠弄权，结党营私，朝政日非，蜀国之亡不过早晚的事。

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4）夏，魏国征调精兵强将，部署18万大军，分三路突然向蜀国发起进攻。征西将军邓艾率兵3万余，自狄道（今甘肃临洮）向甘松（今甘肃迭部县东南）、沓中，进攻驻守在此的蜀国大将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率3万人马，自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向武街（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之桥头，牵制蜀军主帅姜维并切断其后撤之路；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10万乘虚蹈隙，从斜谷（今陕西眉县南）、骆谷、子午谷（今陕西西安南）袭取汉中。

蜀军主帅姜维获悉魏军主力进入汉中的消息，意识到剑阁一定危在旦夕，遂巧施"金蝉脱壳"之计，成功回撤，退守剑阁，凭险拒阻魏国10万大军，打破了魏军乘虚直下成都的整个战略计划，使魏军进退维谷。

面对久攻剑阁不下的不利形势，魏国的决策者采纳了邓艾提出的出奇制胜的计划，即避开剑阁，而从阴平直取涪城（今四川绵阳东，涪江东岸），逼姜维从剑阁回救，如此则攻蜀大军可以顺利从剑阁突入成都平原。如果姜维不

回援，则魏军破涪之后，可以切断姜维后路，并可直指成都。不久，邓艾率大军在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从成都北面的万山丛中突入成都平原，神兵天降，连下江油、涪城、绵竹。蜀军主力这时几乎全在剑阁，成都兵少，实际上无防守可言，加之魏军突然出现，后主刘禅及一班大臣慌作一团，不知所措，降旗投降，魏军占领成都，蜀汉灭亡。

司马昭灭蜀后还未来得及做皇帝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正式代魏建晋。吴蜀本以联合抗曹而勉强立国，如今蜀国一亡，吴国唇亡齿寒。同时，孙权之后，孙皓继为国主，此君粗暴骄奢，好酒成性，搞得上下离心。而晋灭蜀之后，已控制了长江上游，并任命王濬为巴郡太守，后又兼益州刺史。王濬具有大刀阔斧的胸襟和抱负，他到四川后，立即大造船舰，训练水师，时间长达7年之久，训练精锐水军数万，史称“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王濬已成了70岁的老人，但晋朝灭吴正是依赖于他的努力。所以唐朝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就写道：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攻吴的晋军水陆俱下，尤其是顺江而下的水军“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吴国皇帝孙皓只有束手就擒，汉末以来的三国鼎立局面正式结束。

从东汉以来，自耕农的社会组织业已崩溃，所以在战

乱中，各割据政权相继采用新的征兵制度即世兵制。西晋统一全国后，在军制上作了一些改革并继承了这些成果，由专门的营署“押领”百姓，属于兵户的子弟，从孩童时起就要为官府服各种杂役，长大后从军，到六七十岁方可免役。除服兵役外，兵户还要耕田输租，在地位上比自耕农要低一些。这种制度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占主导地位。

西晋还错误地总结了历史教训，认为曹魏的灭亡在于皇室的孤立，所以在建国后大封宗室，分封了27个同姓王。皇帝在名义上是全国最高军事领导，但实际只直接掌握中军（宿卫军），人数在10万人以上。而诸亲王甚而大臣皆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地方的军事、行政长官，掌握大量的地方军。外重内轻的态势，不久就引发了“八王之乱”，导致了西晋的灭亡，所以西晋只维系了短暂的统一。

西晋及以后南北朝的主要兵种，则是陆军和水军。陆军在数量上占有最大比重，但以骑兵最具战斗力，因而成为陆军之主力部队。水军由王濬在灭蜀后训练，在灭吴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日后南朝得到大力发展，成为重要兵种。

四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

西晋的统一仅仅持续了30年左右，这也是魏晋南北朝

400余年间仅有的短暂的统一。

“八王之乱”后，匈奴贵族刘渊攻入洛阳，西晋宗室司马睿以都督江南诸军事之便，在南方重建晋朝政权，史称东晋。其时，北方成为各少数族争雄的战场，重新陷入混乱。在100来年中，改朝换代不断，先后建立过十余个民族政权。这些胡汉政权在军事体制上皆以部落组织为特色，少数族的各级首领同时又是各地的地方军政长官，所谓全民皆兵、全族皆兵。同时作为游牧民族，骑兵在北方武装中占据主要地位，成为征战的主力，战斗力极强。水军则由陆军改建，故远远不能与南方相比。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北方的少数族皇帝向以本部族为主组成军队主力——中军，并亲自指挥从皇族本部落中专门筛选的战斗力强的士兵构成的禁卫军，禁军以外的军队则由部族的宗室大臣担任指挥，而地方上的军队则称为外军，由其他被统治部族的首领率领。

东晋所代表的南方汉人政权理应北伐复国，但一则忙于内部稳定，另一方面则军事实力有限，长期无暇北顾，祖逖、桓温的北伐也都虎头蛇尾，成效不大。

与此同时，在北方，出身氐族的苻坚在汉人谋士王猛的辅佐下，不断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建立了前秦政权，统一了中国的北方，建立了东起高句丽，西至西域、梁、益等州（今甘肃、陕西、四川等地），南迄江淮的庞大帝国。

统一北方之后，苻坚朝思暮想的就是一举消灭南方的东晋，实现天下的统一。但因为时机尚不成熟，他的这一

想法遭到大家的反对。尤其他最信任的谋士王猛在临终之际还苦口婆心地劝他不可贸然发动对东晋的战争。王猛认为："东晋虽偏安于吴越一隅，但终究秉承中原正统。我们前秦当前最重要的是与邻国搞好关系。臣死之后，请千万不要立即发兵讨伐东晋。在国内的鲜卑、羌族，是我们的仇敌，也终究是国家的祸患，应该想办法逐渐予以消灭，以便使国家安定。"

王猛的这一临终嘱托主要强调两点：第一，前秦虽然在较短的时间里逐一兼并了北方各割据政权，但靠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征服完成的，内部仍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刚刚归附的民族多怀二心，只是未有时机得以表现。所以，巩固北方的统一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只有在内部整合、巩固的基础上，方可谋求考虑用兵南方。就南方而言，晋室南渡后，一直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同时，它虽顿失中原，偏安一隅，但却仍以中原正统自居，有北伐中原，重建全国政权的理想。谢安执政后，又任用贤才，团结大臣，识拔了一批文武人才，在政治、军事方面"君臣辑睦，内外同心"、"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因中原战乱流寓到南方的北方人民，除有故国之思外，还有保护新家园求安定的思想，并未对东晋政权失望。这就是当时的"时势"。所以，王猛提出在目前刚刚完成北方统一的情况下，应暂"不以晋为图"，即不要贸然发动统一战争，而要与东晋保持友善的睦邻关系，赢得和平，赢得时机。俾可专心于内部问题的解决，为日后一统天下积蓄力量，耐心等待历史

机遇，俟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再挥师南下，实现统一。第二，王猛明智地向苻坚指出，目前策略的重心应是保持国内稳定，消化、解决各种矛盾，尤其对当时因军事失败暂时归附前秦的鲜卑、羌等族要留有戒心，并要想法慢慢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国家内部的安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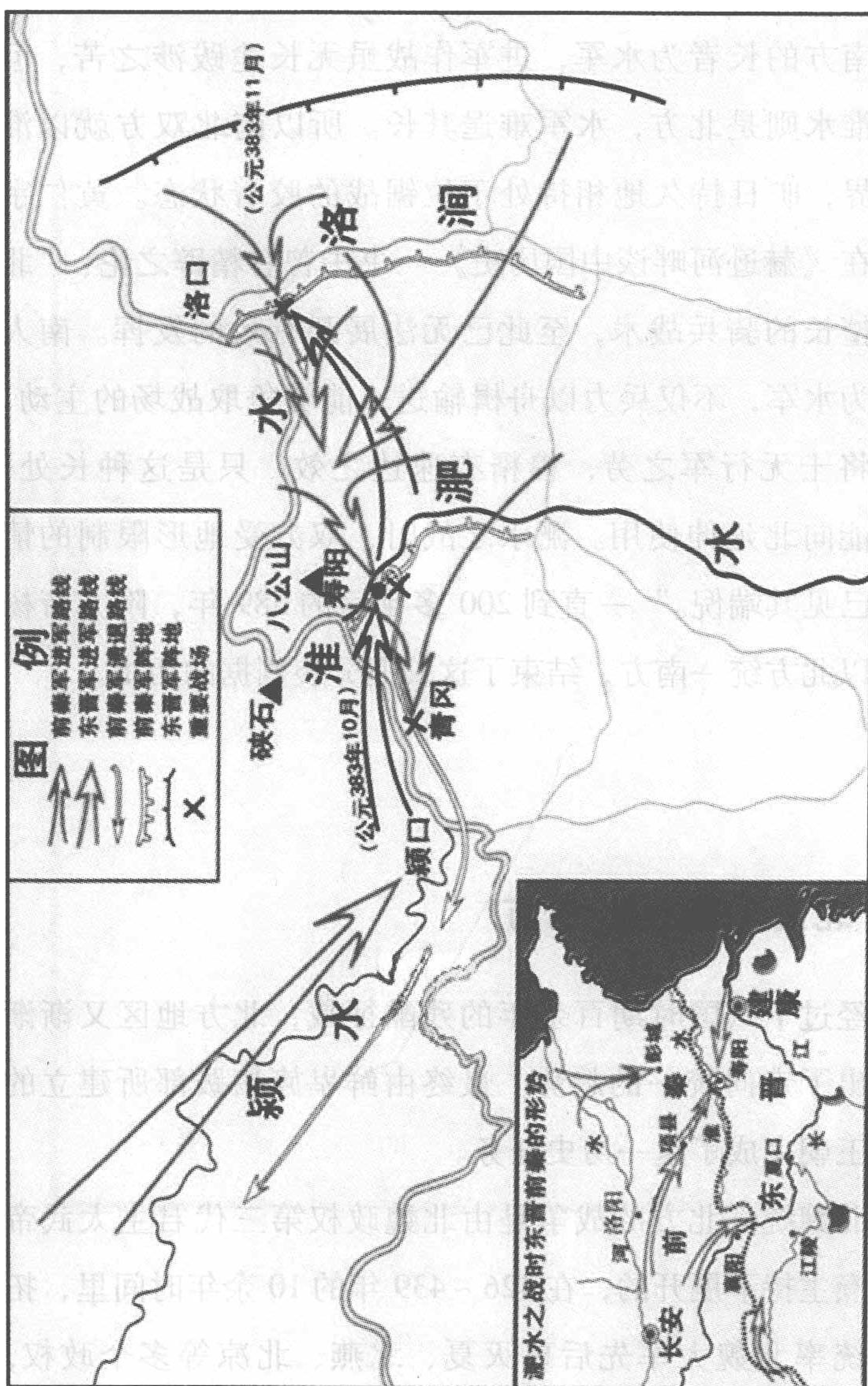
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后来形势的发展，都证明了这是一份有远见的和正确的战略谋划。因为南北统一的历史条件并不成熟。当时北方和南方的经济条件，均难支撑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但苻坚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特别是昧于时势，过分迷信自己在军队数量上的优势，认为“有众百万”，“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他没有认识到，中国自东汉以来长期战乱之后，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且历史上传统的“南船北马”问题也未遑在短时间内加以克服，一旦仓促发动统一战争，北方步、骑在南方水泽地区和南方水军面前势必难逞其长。

383 年，苻坚终于将王猛的临终嘱托弃置脑后，在国内民族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踌躇满志地认为统一全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征兵 27 万之众，号称百万，“东西万里，水陆并进”南下攻晋。

面对前秦大军压境，东晋内部暂得团结，除派桓冲前往长江中游御敌外，在正面战场淮南，则由谢石任征讨大将军组织抵抗。谢石任谢玄为前锋都督，率北府兵 8 万赶往淮南，迎击前秦主力。北府的士兵基本上是战乱期间北方流寓到南方的农民，皆怀有故国之思，有很强的战斗力，

是东晋军队的主力。南下之初，前秦军队进展顺利，遂以为南方不堪一击，大军进至项城。苻坚灭东晋心切，径率8 000轻骑直趋寿阳，并想靠强大的军事威慑逼东晋投降，所以派东晋降将朱序前往东晋劝降。朱序心怀故国，到东晋后，尽告以前秦虚实，劝南方在苻坚大部队主力到达前线之前，迅速击退其前锋，以挫其锐气。东晋方面接受了朱序的建议，速遣北府军进至淝水，苻坚所率前秦先锋隔淝水为阵。苻坚登上寿阳城，远望南崖晋军阵容严整，误以为八公山上的草木也是晋军，遂生惧心。当时谢玄派人向苻坚提出请求，要前秦稍为后撤，以便晋军渡河决战。苻坚满以为可以在晋军半渡时予以袭击，于是答应了晋军的要求，下令部队后撤。谁知这一下反上了当，因为前秦大军是临时匆匆集结的，内中民族成分复杂，早不愿为苻坚卖命，兼之对晋军有畏惧心理，所以一退遂不可收拾，而朱序又作为晋军的内应，在阵后大呼“秦军败矣”。秦军士兵不明真相，以为真的败了，于是自相践踏，只求逃命，遂至大溃。而晋军渡河之后，水陆并进予以追杀。苻坚虽想阻止部队后撤，但难以奏效。时值隆冬，秦军于逃命途中冻死饿死者不计其数，苻坚自己也中流矢，最后收集残卒，数十万人只剩下10万之众，仓皇逃回北方，不久死去。

苻坚仓促之间倾全国之力，伐晋统一全国的尝试以失败和亡国告终，他企图将统一大业“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是丧师辱国，贻笑千古。突然崛起的前秦不仅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反而经淝水之战，流星一样地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图例
前秦军进军路线
东晋军进军路线
前秦军溃退路线
前秦军阵地
东晋军阵地
重要战场
洛口
洛涧
淝水
八公山
寿阳
硖石
淮
青冈
颍口
颍水
（公元383年10月）
（公元383年11月）
淝水之战时东晋前秦的形势
长安
前秦
东晋
建康
寿阳
彭城
夏口
江陵
襄阳

但东晋并没能进一步扩大战果甚而趁此良机收复北方。因为南方的长者为水军，进军作战虽无长途跋涉之苦，但过了淮水则是北方，水军难逞其长。所以南北双方就以淮水为界，旷日持久地相持处于拉锯战的胶着状态。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曾有精辟之论：“北人所擅长的骑兵战术，至此已无法展开有效的发挥。南人所长为水军，不仅兵力以舟楫输送，能够争取战场的主动，而且将士无行军之劳，粮糈有速达之效。只是这种长处，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战时，双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见其端倪。”一直到200多年后的589年，隋文帝杨广才以北方统一南方，结束了这长期分裂割据的历史。

五　北魏重新统一北方

经过十六国时期百余年的残酷征战，北方地区又渐渐呈现出了走向统一的趋势。最终由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北魏统一北方的战争是由北魏政权第三代君主太武帝拓跋焘主持下展开的，在426～439年的10余年时间里，拓跋焘统率北魏大军先后翦灭夏、北燕、北凉等多个政权，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历时100多年的十六国分裂局面，从而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新格局。

出身胡族的统治者之所以成功统一北方，既是民族融

合的结果，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层面又体现了胡汉军事思想的融合，可以说对汉族传统的谋略文化、策略思想进行了充分汲取和发扬光大。这具体表现在：

高度重视儒家知识分子在统一战争和治理国家中的作用。魏武帝拓跋焘不仅本人热心汉文化，积极提倡汉化，而且重用儒家知识分子，积极采纳他们关于治国整军的一套理论。如任用崔浩等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优秀人物为辅弼，对他们言听计从，让他们参与政治，整顿税制，安置流民，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治理军队。这一方面加强了与中原汉族地主的结合，促进了北魏社会政治封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为军事斗争提供强大的支持，为统一北方奠定坚实的基础。结果，北魏国势日益兴盛，为统一北方军事活动的展开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正确选择战略打击的突破口。拓跋焘登基后，即把平定北方提上议程。但在面临诸多对手，情况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以谁为率先打击的对象，统治集团内部一直争论不休。有的主张先伐北燕，有的则主张先攻蠕蠕（柔然）。北方士族出身的崔浩则认为应先击夏国，理由是夏国占据关中形胜之地，而又国力衰弱，民众离心。先伐夏国，不仅胜算极大，而且一旦打下夏国，就能对其他割据政权造成极大的威慑，可以实现各个击破。拓跋焘接受了崔浩的这一建议，极大地推进了统一战争的进程。

善于根据战略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进攻方略。攻夏之役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北魏的北境因受到蠕蠕不断

南下侵扰而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于是拓跋焘及时调整战略，暂停攻灭夏国的战争，转而挥师北上，大规模反击蠕蠕，大破对手。在基本上解决了北方的边患之后，再重新回头收拾夏国的残余力量。这种因形势需要进行必要的战略调整应该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中也反映出拓跋焘战略指挥的务实性与灵活性。

积极运用外交手段，分化敌人，孤立对手，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减少统一北方过程中的阻力。如延和元年（432）六月，拓跋焘亲征北燕，为了防止南方的刘宋政权乘虚北上，使自己处于多面受敌的困境，拓跋焘作了大量的防范性工作，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派遣使者主动与刘宋政权通和，达到了在一定时间里稳定住南部战线的目的。

实施灵活机动的作战指导。游牧民族战法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灵活机动，拓跋焘在统一北方的作战指导上，充分发挥这一特长，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依靠骑兵精锐，或轻骑急进，运用闪电般的突袭战；或佯示虚弱诱敌深入，调动敌人脱离坚城进行野外会战；或穷追不舍大打歼灭战，以致每战必克。

六　南船北马：魏晋时期骑兵与水军

在火器时代来临之前，兼有今日飞机、坦克二者之效

力的骑兵曾以其无与伦比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成为相当长时间内主宰战场的决定性兵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骑兵发展史上继两汉骑兵兴盛之后的又一个大繁荣阶段。这主要表现为骑兵始终是中原地区军队中的第一主力，骑战成为当时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样式，重甲骑兵的建设与运用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马镫的发展与使用使骑兵的战术动作更为娴熟多样，战斗力得以更好的发挥，等等。

自三国时起，与秦汉时期骑兵主要用于漠北、漠南等边地作战不同的是，骑兵的作战地域主要转移到内地、北方。三国时骑兵最为强盛的当数曹魏，其骑兵在军队中占有绝对主力的地位，曾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其所拥有的乌桓三郡“天下名骑”及曹纯虎豹骑那样的“天下骁锐”之强大实力，是蜀汉、东吴少得可怜的骑兵无法比拟的。不过，当时的骑兵尚未配备马镫，这当然多少限制了骑兵战斗力的进一步发挥。

西晋时期，骑兵也是军队中的绝对主力。当时行军、作战，经常以骑、步相结合，协同出征交锋，步、骑两者配置的比例大约在十比二三之间，骑兵的数量虽然要较步兵为少，但是却在步、骑的协同作战之中处于完全主导的地位。从考古发掘的实物看，这一时期，对骑兵和骑战至关重要的马镫已经得到发明与使用。从湖南长沙西晋墓出土的陶俑看，当时已经有了方便骑者上下马的短蹬，这是已知最早的马镫。用于实战的长蹬见于东晋时期制作的陶俑，而最早的长马蹬的实物则发现于辽宁一座北燕期间的

墓葬之中。正是有了马镫的发明和使用，骑手双脚便有了支撑点，可以用腿力完全控驭战马，空出双手用于战斗。而且，双脚踩蹬，还可以使人马完全合为一体，便于骑手完成马上站立、俯身、马侧藏身躲闪等战术动作，从而大大增强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马镫虽小，却是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发展史上一个意义不可低估的环节。

到了十六国北朝时期，骑兵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北方各政权大多是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骑射是其所长，这就使得骑兵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其军队的主力。例如前赵政权中央兵力近30万，石勒后赵政权中央兵力50余万，均主要由骑兵组成，前秦苻坚南伐东晋，号称80万大军中骑兵就达27万，骑兵也占有其总兵力的1/3。在具体战争过程中，动辄投入骑兵数万或十几万人，最多时竟高达数十万之众。如北魏拓跋焘平定北方中原地区时，经常动用骑兵10余万，最多时为40万左右，即可见骑兵数量之多，作用之大。在一般的战斗中，骑兵作战也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南北朝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宋军攻入关中与北魏军激战，宋方勇将薛安都“瞋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辟易不能当，杀伤不可胜数。于是众军并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战”，取得了胜利。

魏晋时期骑兵大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乃是重装甲骑兵的出现。所谓重装甲骑兵，就是人和马都披戴铁甲的骑兵，当时称作为“铁骑”或“甲骑”。这种骑兵的最大特点是具有较强的防护力和集团冲击力，在对没有厚重装甲

的轻骑或步兵作正面猛烈突击之时，往往具有很强大的杀伤力。

在水军建设方面，随着魏晋时期战略作战轴线由东西方向逐渐转变为南北方向，主战场大多在江淮、江汉之间的广大地域，水军在战争中的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高。能否建设强大的水军，成为提高江河作战能力的关键，也是南方政权存亡的关键。

水军的空前发展始于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当时长江是吴国的主要防线，吴国凭依强大的水军，北防曹魏，西拒蜀汉，牢牢占据了富饶的江南地区。当时吴国在侯官（今福建闽侯）设立造船厂，在濡须口（今安徽巢县）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设置水军基地，驻重兵防守。水军的大型战船称“五楼船”，为上下五层结构，可载乘士卒 3 000 人。孙吴后期，吴国水军已经具有海上作战能力，黄龙二年（230）水军万人抵达夷州（今台湾省），嘉禾二年（233）其水军沿海路北上辽东；赤乌五年（242）其水军 3 万人征讨今海南岛珠雀、儋耳，均显示了很强的运载力与战斗力。

西晋王朝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建立了一支拥众七八万的庞大水军，其大型战船，方 120 步，载士卒 2 000 人，船上筑木楼，开四道门，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东晋水军比西晋更为强盛，当时东晋军队出征，经常以水军为其主力。如平定桓玄之乱，就是以水军在长江峥嵘洲（今湖北鄂州东）进行水战，一举奠定胜利的基础。

南北朝时期，水军是南朝军队的主力兵种，南朝历次出兵，多以水军为主。如宋文帝元嘉元年，北魏大军南进，宋军水师沿长江列阵迎击，从采石直到暨阳，江面上船舰集结连营，绵延六七百里，旗帜鲜明，军容整肃。在强大的南朝水军面前，北朝以骑兵为主的军队一筹莫展，只得铩羽而归。

水战的基本战法是，首先进行远距离的弓弩齐射，接近敌人船只时则使用“拍竿”打压击撞，接舷格斗时使用矛戟等长兵器击刺，攻入敌船后则以刀、剑等短兵器近身肉搏。特定条件下也常实施火攻。当敌人弃船逃跑时，则实施登陆作战，追歼敌军。

与北方以骑射见长而南方水军强盛的现实相对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南船北马”的作战理论。南方政权所在地域河湖纵横，因而水战成为十分重要的作战方式，这就直接促成了水战思想的迅速发展，其核心是：在南北相峙中，充分肯定水战之长，重点发展水军，从而以长击短。在处于弱势时，主张不与北方军队在平原旷野争一日之短长，而是扬长避短，诱敌深入，将江淮地区作为预定战场，依托江淮水系重创北军；在战略部署上，重视控扼长江上流，严防敌人顺江而下。至于北方的战争指导者，则特别重视骑战，主张在与南军作战中，必须发挥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或实施运动防御或快速进攻，从而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第六章

盛世军事

一　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

公元581年，杨坚以北周外戚的身份逼迫周静帝退位，建立隋朝，与南方的陈朝南北对峙。这时，经过魏晋南北朝400来年的发展，门阀士族势力急剧衰落，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进一步扩大。在民族关系方面，民族融合的步伐大大加快，程度前所未有，民族隔阂大大减轻。这都为中国的重新大一统扫除了巨大障碍。隋文帝建立政权后，继承了北魏以来的汉化政治，巩固了北周改革的成果，重新确立了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北方政治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在力量上远远超过了南方。于是顺应历史潮流，将统一全国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首先，总揽全局，慎重决策，明确国家统一的目标。面对北方强大的突厥不断南下袭扰和南方的陈朝企图凭借长江天险拒阻统一的复杂战略形势，以杨坚为代表的隋朝统治集团，灵活果断地确定了南和北战，先击突厥，后灭陈国的统一战争战略方针，并排除种种干扰，紧紧围绕既定的长远战略目标。一方面把握战略时机，集中精力解决突厥问题；另一方面潜心于内政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改革，刷新政治，发展生产，建立和健全动员体制，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完成了统一战争的综合准备。

其次，围绕灭陈实现全国统一这一战略目标，精心运筹，形成预案。在长达8年时间里，隋文帝先后向多人征询关于平陈的建议，然后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制定了环环相扣的统一战略预案：一是经济打击，困敝陈朝。鉴于陈国疆域广阔，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隋朝采取各种措施破坏陈朝正常的生产秩序，从经济上拖垮敌人。二是广泛欺敌误敌，示假隐真。针对陈朝凭恃长江天险抵抗统一的企图，为了麻痹陈军，削弱和瓦解陈朝的江防能力，为隋军日后发起突然袭击提供必要的条件。隋朝反复以部分兵力佯动，诱使陈军集结，待陈军出动后便解甲收兵，从而使陈军丧失警惕，戒备松懈，为日后隋军乘其势衰不备予以突袭创造条件。三是确定主要战略方向，将长江下游作为伐陈作战的主要战略方向，而在长江中上游则"多张形势"，转移陈朝方面的注意力，以隐蔽长江下游主力渡江袭取建康的战略企图，从而造成一个主次配合、东西呼应的战场进攻态势，置陈军于首尾脱节、顾此失彼的被动境地。四是预先选定打击要点，将陈军重兵防守的江防要害和战略重点京口（今江苏镇江）作为战役要点，以突破建康的门户和屏障。

再次，周密部署，速战速决。当时主宰南方命运的是历史上荒唐得出奇的陈后主陈叔宝。他认为长江天险牢不可破，整日不理政事，沉溺于酒色，过着荒淫无道、醉生梦死的生活。当隋兵已临城下时，陈后主仍在与宠妃们寻欢作乐。唐代诗人杜牧《台城曲》中所写"门外韩擒虎，

楼头张丽华”，正系当日之实情。

在渡江作战的作战指导方面，隋朝按照既突出重点又统筹兼顾的原则进行周密的部署。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实施多路并进、水陆俱下的战略部署。针对陈军依托长江千里设防的特点，隋文帝部署八路进兵，沿长江北岸全线出击，使陈军陷于防不胜防、首尾难顾的被动境地。二是按照集中兵力，重点突破的原则，以长江下游为主攻方向，实施战略突袭。

开皇九年（589）正月，趁陈国朝野正在欢度春节之机，隋下游诸军突然发起进攻。当时，陈后主为增加春节的喜庆气氛，将沿江水师的战舰，甚至九江、京口等江防要点的舰船，全部调往建康，结果江中无一战船，江防形同虚设。于是，隋军宇文述率军三万，由桃叶山渡江，夺占石头山（今江苏江宁县西北）；贺若弼率军从广陵渡江，一举攻占京口；韩擒虎率军由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袭占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三路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进合击，向陈国统治中心地带突击。在隋军突然的强大攻势面前，陈军仓促应战，根本形不成有力的抵抗，以至于节节败退，望风而降。经白土冈一役，陈军主力与精锐几被全歼，名将萧摩诃束手就擒，陈国再也无法对隋军实施实质性的抵抗。隋军乘胜进击，一举攻入陈朝都城建康，生擒陈后主陈叔宝，一举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全国大统一。

隋朝灭陈、统一全国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通过战争实现国家统一的著名案例。战争过程中，以隋文帝为代表的决策层通过慎重决策、综合准备、制定周详的战争预案、周密部署兵力、灵活指挥，实现了对统一战争全局与全过程的正确指导，既推进了国家统一大业，又为统一战争的战略指导提供了丰富经验。

二 太原起兵和李世民的《取关中策》

李渊是隋炀帝的姨表兄弟，同属关陇军事贵族的上层人物。但史书对这位唐朝的开国皇帝却不太恭维，两《唐书》均说他是个糊涂虫，认为太原起兵反隋全是他儿子李世民的主意。李世民决定起兵时，李渊犹豫不决，无可奈何地说“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其后转战6年，统一全国，都是李世民的功劳，李唐的天下都是李世民打下的。这极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杀兄逼父登上皇位后对老父的调侃。

曾经跟随李渊的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真实地记载了隋末唐初的这段历史。据温大雅的说法，李渊是个足智多谋的老官僚，早有反隋的志向，但一直引而不发，韬光养晦，隐忍待机，并与其子李建成、李世民以及心腹幕僚制定了周密可行的反隋策略。当时正值隋朝末年，全国到处爆发农民起义，变乱四起，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

太原留守。太原自古为军事重镇，是首都长安的北方门户，兵源粮饷充足。李渊在太原一直秘密准备反隋斗争，他借抵抗突厥的名义，四处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实力，并杀死隋炀帝安置在军中的监军，派人到长安和洛阳打探情况。后来又私下与突厥讲和，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暗中与农民起义军联络。隋炀帝被困扬州后，全国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起义军已形成了三个中心，并向隋朝统治的中心进发，隋朝的灭亡已指日可待。李渊密诏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及女婿柴绍进赶赴太原，共商起兵大计，一切准备就绪，李渊父子才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在太原誓师起兵，树起了反隋大旗，部署军队进军关中。

但是在进军关中途中，一遇到小小的挫折，作为最高统帅的李渊就要改变既定的战略。同年七月，李渊的3万大军沿汾水南下，到达距霍邑（今山西霍县）50里的贾胡堡。镇守关中的隋朝代王杨侑为拒李渊入关中，派大将宋老生率精兵2万屯驻霍邑，又派大将屈突通率精兵数万扼守河东（今山西永济）。当时，恰遇阴雨连绵，数日不晴。李渊的军队前不能进，久驻又粮草不继，加之误信北方的刘武周将联合突厥袭击自己的战略根据地晋阳（今山西太原），不由得六神无主。在最高统帅部的会议上，裴寂等谋士提出，隋朝的两员大将互为犄角，控制了南进关中的战略要地。看来一时是难以攻下，而宿敌刘武周与突厥联合南下晋阳，更是腹心之患，所以主张“不如还救根本，徐图后举”。李渊本人也倾向于撤退回晋阳，再等机会，于是轻易地否定

了入据关中以图天下的既定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挺身而出，切谏李渊，重新论证了先入关中方略的正确性，最终使李渊下定决心，重新实施既定的战略方针。

李世民的《取关中策》之所以能打动李渊，使其收回成命，在于其从战略的高度重新论证了入居关中之策的正确和可行。

其一，李世民首先具体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按原定计划继续进军关中的时机业已成熟，且机不可失。他说，眼下虽然军队乏粮，但时值夏收，田野里到处都是成熟了的庄稼，粮食问题可以很容易地就地解决；北方的刘武周虽依附突厥，但双方貌合神离，担心突厥端了自己的老巢，也不可能冒险南下进攻晋阳。隋军方面，宋老生轻浮急躁，这种性格不适合担任固守的重任，唐军可以利用他的缺点战胜他。打败了宋老生，隋军的防御体系就被撕开了缺口，进军关中就不成问题了。所以从现实情况和战略格局上说，继续南进仍然是可行的。李世民的这一分析，充分体现了战略家胸怀天下、通观全局的宏观意识。


李渊画像

其二，指出先入关中夺取长安对日后夺取天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关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对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

时，隋朝都城所在地的关中长安，业已成为北方尤其是西北割据者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对李唐而言，机会稍纵即逝。只有迅速进军关中，才可以据形胜之地积蓄力量，壮大自己的实力，为进一步统一全国打下基础。同时，可以“拥隋”相号召，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号令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反之，如果统帅有畏敌之心，迟疑观望，犹豫不决，没有乘胜进军推翻隋朝的志向，则追随者就会人心涣散，成为乌合之众，不待敌人进攻就会解体。到那时，不仅失去有利的战略态势，使自己陷于覆灭的境地，恐怕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全，更遑论夺取天下了。

李世民的《取关中策》高屋建瓴，切中肯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李渊认识到继续实施进军关中战略的正确和可行，于是回心转意，改变了决心。他让李世民和李建成连夜追回已撤退的部队。按照李世民的计策，重新部署军队进攻据守霍邑的宋老生部。在战斗中，李世民利用宋老生性格轻浮急躁的弱点，数次派人挑战，终于激怒宋老生，逼之出战，将宋老生所部隋军一举歼灭，攻克霍邑，为下一步进军关中号令天下扫清了道路。武德元年(618)，李世民又率军与薛仁杲的西秦军队决战于浅水原，俘虏了薛仁杲，解除了西秦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从此，唐朝不仅据有了关中，而且夺得了陇右和河西，具备了成为统一政权的基本条件，并为以后逐鹿中原打下了基础。

夺取关中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不失时机地出兵潼关，逐鹿中原。在此后的几年中，唐军在李世民的率领下先后

打败了盘踞东都洛阳的王世充、中原的瓦岗军，并北取河北，南灭萧铣，抚定江南，最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清除了当皇帝的障碍，逼迫李渊主动将皇位让给自己。此后，李世民以年轻有为之君的姿态尽心于国家治理，从而迎来了历史上著名的昌明时代——贞观之治。

三　府兵制与募兵制

府兵制是源自西魏、北周的一种军事制度，到了隋朝和唐朝，统治者又根据现实情况对之进行了改革，成为与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相配套的一种重要军事制度。

在西魏、北周时期的府兵制下，府兵属职业军人性质，其身份被编入军籍，单独编为军户，隶属相应的军府，超越于地方民政系统之外，不受驻地州县政府的行政管辖。而且府兵拖家带口，家属随军营迁徙。隋文帝统一全国后，社会复归于安定，发展经济成为第一要务，于是下令取消华北及沿边地区新设立的军府。未撤销军府的地方，府兵虽然仍然编入军籍，但本人和家属又隶属于所在州县，同当地农户一样，可以按均田令分得土地，登记户口。有固定的住处和产业，从事农业生产，这就使府兵制变成了一种兵农合一的义务兵役制。

唐朝建立后，疆域广阔，空闲土地较多。唐政府规定

了社会各色人等占有土地的标准，即丁男（21岁的成丁）和18岁以上的中男皆100亩，老年男丁40亩，道士、女冠及僧尼每人30亩，工商业者减半。在分配的土地中，有1/5为永业田，4/5为口分田。国家既给农民分配土地，农民则要对国家履行义务，受田农民1个男丁缴一份租赋，服一份徭役和兵役，这样国家则可以将政权建立在自耕农的基础之上，按租庸调取得财政收入，同时建立军队。于是，与均田制和租庸调相配套，农村户口中凡享受均田的20至60岁的普通健康丁男，都有承担兵役的义务，他们被组织在各个兵府之中，叫做府兵。这就使军事组织建立于社会组织之上，农民构成国家财政军事的来源，达到兵农合一，寓兵于农。

府兵平时务农，农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服役时，其任务有两项：一是“番上”，即轮番到京师执行宿卫任务；另一个是征戍，即由折冲府调出去从事战斗或镇守。要自备兵器战具和干粮，轮番戍守边境和京师。按唐制，成丁从21岁应征隶属兵府，到60岁方可免役。鉴于府兵既要执行军事任务，又要从事农业生产，还要自备兵器和粮饷，国家在征点士兵时不得不在家庭财产、个人健康和丁男多少等方面统筹考虑。于是作出了“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丁多”规定，即家庭财产相当，取身强力壮者；健康状况相当，取家境富裕者；财产、体格均相当，取家中丁男多者。府兵在执行军事任务期间，本人免除租调，但其家属不能免除徭役。

由府兵组成的军府称折冲府，折冲府设正长官折冲都尉1人，副长官左右果毅都尉各1人，其下设校尉6人，校尉统领的单位为团，其下依次为旅（长官为旅帅）、队（长官为队正）、火（长官为火长）。编制上，10人一火，50人一队，100人一旅，200人一团，这样，一个折冲府计1 200人。全国共有折冲府650多个，总计府兵近70万人。折冲府之上的领导机构，则是卫。全国的各折冲府由中央十二卫和东宫六率领导，其中左右卫均领60个军府，诸卫领50个或40个，其余均隶属东宫六率。卫大将军为府兵的最高长官，但只有带兵权。军队的征调由皇帝直接掌握，诸卫大将和地方官均无调兵权。遇有战事，中央政府下令从各地征集府兵，加以混合编制，然后交由大将统领。战争结束，则兵士回兵府，临时委派的大将则归朝廷，所谓“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从而使兵不识将，将难专兵，统兵大将难以拥兵作乱。在府兵的分布上，唐朝的634个折冲府遍及全国，但关中集中了261个，占全国兵府数量的40%还多，其次则以河南、河东为多。这种分布状况显示出内重外轻的态势，保证了唐朝前期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固。

为保证府兵的战斗力，唐朝前期大搞边防设施，在沿边要地设城布防，同时大力推行屯田，实行农战结合，使军需供应问题得到部分解决。此外，为了建设强大的骑兵，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就特别注重马政建设，在中央设立马政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和指导养马。全国建起了许多国有马场，民间养马也十分普遍，到玄宗天宝时期，达到了

秦汉以来养马的最高峰。冲锋陷阵的强大骑兵一直是唐朝陆军的主力。

在军事力量的使用方面，唐朝前期实行的是极富弹性的军事体制，即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相分离。按照这一体制和当时的军事部署，府兵、禁军、边疆镇戍部队等，主要在平时发挥作用。在边防方面，一般也是由边防部队担当维护边疆安全稳定的责任。而一旦边疆出现大的威胁，或开展大的军事行动，则由“行军”制度来弥补边防体制的不足。所谓“行军”，即遇到大的战事，临时由府兵、禁军、镇戍部队等军事单位以提供兵员的形式组建作战部队，由中央任命大将统一指挥。这一体制在对付边疆威胁方面非常灵活，中央可以根据战争形势迅速调集大军，集中优势兵力以形成强大突击力量投入征战。因此，唐建国后的历次开边征讨，无不以“行军”方式进行。如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征伐东突厥的军队就是这样组建的；调露元年（679）突厥降众大规模叛乱，负责管理北部边疆的单于都护府应付不了数十万人的叛乱，唐太宗立即令裴行俭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组建数十万大军，立即开赴北疆，迅速平息叛乱。此后，随着战争的频繁和每次战争的持续，唐朝又逐渐将“行军”体制改为类似于大军区的节度使体制。

不过，在兵农合一的制度下，府兵的最主要身份还是农民，他们自然会把主要精力用于农业生产上，导致军事操练废弛，军事素质不高，难以适应长期战争的需要。同时，既然有了产业，打仗时必然又有后顾之忧，难以舍身

疆场。于是，唐朝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均田制瓦解。国家既不能给农民分配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则也无力为国家履行当兵之义务。而战事的频繁，又使得府兵久役不能归，于是当兵成为一种深重的负担。农民皆不愿当兵，甚至自残肢体以逃避兵役。国家缺兵严重，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府兵制难以继续实行。所以，到了749年，唐玄宗只得下令停止对府兵的调发，诸军均实行招募来解决兵源，这实际上等于宣布废除了府兵制。

募兵制在唐玄宗朝完全取代了府兵制。为解决宿卫诸军缺兵，唐政府首先在内地实行募兵，招募了12万人，号"长从宿卫"，这些都是用各种经济待遇为交换招募来的职业兵。在宿卫诸军为募兵取代的同时，唐政府又在边地逐渐实行招募，组建"长征兵"，号称"长征健儿"，从此以后直到唐朝灭亡，宿卫禁军和边地守军一切兵员均来自于招募。在募兵制下，唐朝将帅和地方官，尤其边地将帅，



唐代壁画上的甲骑具装战斗图

靠着募兵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从而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这是造成“安史之乱”和晚唐长期动荡的基本因素。

四　渔阳鼙鼓动地来

唐朝中期，自耕农的社会组织业已崩溃，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自然瓦解。因为府兵制的前提是国家分配土地，农民没有土地，自然无力当兵。同时，承平日久，社会风气也耻于当兵，初唐的“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已经是遥远的豪言壮语。

749 年唐玄宗下诏宣布实行募兵制后，唐朝的内地宿卫诸军及边防军很快为募兵所取代，各地方官更是自行招兵买马，屯粮制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实同军阀。当时全国有兵 49 万，关中还不足 10 万，且大部分为老弱病残，内轻外重的局面业已形成。其中，安禄山一人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成为地方上最大的军阀，内乱的爆发势不可免。

面对这种情况，帝国的舵手唐玄宗仍然沉浸在开元盛世的光环之中，意识不到将要到来的灾难，更未想过要去采取对策。这位昔日的贤君如今仍然认为社会太平无事，所以深居后宫，纵情声色。先是误信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继又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重用无才无能的杨国忠。杨国忠为相后，只知弄权纳贿，甚至向安禄山索贿，安禄山未能

予以满足，杨国忠就怀恨在心，一再向唐玄宗诬告安禄山谋反。755 年，杨国忠又采取逼反的手段，派兵包围安禄山在长安的宅第，杀其全家和宾客，终于酿成了天下大乱。

同年 11 月，安禄山以奉玄宗密诏讨伐杨国忠的名义，在范阳发兵 15 万南下，以一日行军 50 公里的速度直取东都洛阳，直到这时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叛变是真，急忙派重病在身的老将哥舒翰防守长安的东边门户潼关。哥舒翰清楚自己所率的 8 万杂牌军不堪一击，所以主张固守潼关，但唐玄宗急于收复洛阳，强令出战。756 年，20 万唐军在灵宝进了叛军的埋伏圈，全军覆没，逃生者仅 8 000 来人，叛军遂攻占潼关。唐玄宗得知潼关失守，急令大将军陈玄礼集合六军，携杨贵妃、杨国忠等西逃，准备到四川避难。行至马嵬坡，人困马乏。当时高力士与杨国忠有隙，怕入川后受其摆布。而陈玄礼对唐玄宗也早已失望，希望太子主持国事，打开新局面，所以暗中纵容扈从六军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并要挟唐玄宗缢杀了杨贵妃。

马嵬坡之变后，玄宗独自入川，太子李亨逃至灵武（今属甘肃）即位，史称唐肃宗。肃宗主持国事后，制定了平叛策略。其一，确保江淮，保证中央政府的财赋之源。为此，唐肃宗命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阻止叛军南下江淮，同时命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转运南方财赋接济中原和西北。其二，坚守河东，并寻机直下太行，攻击叛军后方并断其归路。由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兼太原留守。其三，准备向回纥等西域诸国借军，既保证后方安定，又可以西域骑

兵对付叛军。757年，史思明率军10万攻太原，欲长驱而入直取唐肃宗新政权所在地陇西，被唐将李光弼率主力大败于太原，损兵折将达7万人，元气大伤。在河南战场，唐将张巡和许远以仅仅1万人的兵力，坚守孤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力拒叛军13万之众，经过10个月400余次苦战，歼敌7万，阻遏了叛军南下江淮，保证了江淮财赋顺利输入关中。

睢阳保卫战胜利后，唐肃宗错误估计了形势，急于收复两京，所以派郭子仪反攻。安禄山反叛之初，郭子仪就取道山西、河北，欲断敌归路，如果不放弃原来的战略计划，则难以迅速集结兵力反攻，所以，唐政府只得向回纥借兵请援，条件是：收复长安时，允许回纥兵团任意抢掠长安之美女、财产、珍宝等。这时，安禄山在长安双目失明，心情烦躁，性格愈加残暴，动辄杀人。当他要杀儿子安庆绪时，安庆绪先杀之自代其位。757年9月，唐军与回纥兵团等共15万攻打长安，郭子仪、李嗣业等唐将在回纥骑兵的帮助下，发起总攻，杀敌6万，收复长安，叛军东逃退保洛阳。收复长安后，回纥兵团要求如约进行抢掠，唐肃宗想到允许回纥在长安抢掠，一定影响官军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并将导致洛阳人民与叛军一起坚守东都，所以请求攻下洛阳后再兑现许诺。不久，唐将郭子仪又乘胜攻克潼关，并与回纥骑兵在陕州（今河南陕县）大败安庆绪叛军15万。安庆绪见主力已溃，只得撤出东都洛阳，逃往邺城（今河北磁县）。回纥兵团在收复洛阳后，遂大肆抢

掠。隋唐二代繁华的东都，被洗劫一空，盛况不再。

叛军退保邺城后，内部分崩离析，拥兵范阳的大将史思明因受安庆绪猜忌，率部降唐。安庆绪一时孤立，唐朝欲借此机会，击灭安庆绪，遂命大将李光弼指挥20余万大军围攻邺城，而史思明乍降又叛，反成为官军最大之敌。唐军始料未及，结果损失惨重，史思明在大败官军后杀安庆绪返回范阳，自立为大燕皇帝。759年，史思明率军南下，攻下洛阳，但洛阳已是一座空城，无以生存，只得回攻河阳（今河南孟县）。唐将李光弼早已在此据险防守，双方在河阳相持了一年，史思明又不得不退回洛阳。不久，史思明之子史朝义杀父自代，叛军内部由此内乱。762年，唐代宗下令各路唐军与回纥兵收复了洛阳、开封等中原要地。次年，史朝义逃至河北自杀，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

安史之乱虽以唐政府平叛胜利而结束，但唐朝历史也因而发生了重大转折。战争主要在北方和中原进行，长期的战乱使唐朝统治的中心地带遭到极大破坏，唐朝因而由强盛、富裕转向衰弱和贫困。从此以后，中央政府失去了号令全国的威望和权威，地方军阀势力不断膨胀，与中央对抗。统一强大的唐王朝一去不复返，而打击藩镇和理财则成为中央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头等大事。同时，平叛期间唐朝的军队大都集中于西北和内地，相应则边疆空虚，减轻了对周边少数族的压力。周边少数族遂乘虚而入，唐朝在军事上由进攻转为退守，由主动变为被动，直接引发了

五代、宋、辽、金时期多个民族政权并立割据的局面。

五　周世宗北取三关

安史之乱后，唐朝名存实亡，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也就是军阀混战。中央因为兵力财力有限，难以发起对藩镇的军事打击。同时，宦官监军和领兵，也造成了大将无权。宦官还与地方军阀相勾结，以固宠权位。唐朝中央只得以军阀打军阀。到了公元907年，朱温以关东地区最大军阀的身份，废李唐而自代，建立梁，历史进入又一个分裂时期——五代。

所谓五代，指的是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的5个割据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这5个政权在历史上前后加起来还不到60年的时间。5个割据政权之外，同时在南方还有9个割据政权，加上北方的北汉，一共是10个，所以历史上又称这一时期为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中，在军事上最有作为也最有成就的首推后周的周世宗柴荣。

柴荣与当时其他割据者的不同是明显的，他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那就是用武力重新统一中国。具体来说就是要“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这一雄图大略使周世宗成为安史之乱后200来年中最有政治眼光、最有见识的人物。为此，他注意减苛税，均田赋，组

织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尽力恢复被长期战乱破坏的北方经济，使唐末以来地方军阀控制的地方政治和经济走上轨道。同时增修扩建开封城，疏浚了五丈河、运河，使开封既能得江淮经济发达地区之利，又控制中原，成为取代长安、洛阳的新兴政治、经济中心和统一天下的枢纽所在。

为武力统一中国，周世宗特别注重军事建设。954 年，他亲自率军在高平抗击入侵的北汉和契丹联军，取得胜利，使北汉和契丹长期不敢南向用兵。高平之战后，他毫不留情地处斩了临阵脱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等 70 余人，重申军纪，改革唐末五代以来骄兵悍将之风，根除政权不稳的最大隐患。接着，他又本着精兵的原则，整顿禁军，淘汰禁军步、骑兵中的老弱无能者，以武艺出众者和招募来的天下豪杰组成上军。此外，周世宗又亲自考察士兵武艺，挑选其中的出类拔萃者组建殿前诸班，革除了长期未能解决的冗兵问题，在节省大量军费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的中央军，有效地控制了地方军阀，为日后用兵于统一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55 年，周世宗开始了统一中国的第一步行动，出兵从后蜀手中夺取了秦（今甘肃天水）、凤（今陕西凤县）、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功）四州之地，尽得入蜀之战略要地。伐蜀胜利后，周世宗又兵锋南指，派李谷、李重进、韩令坤、赵匡胤等 12 员大将第一次征南唐，因雨季到来及粮草不继而撤兵。同年 6 月，后周第二次进兵，周世宗带着刚刚训练的水军于 957 年 3 月亲往前线，指挥攻打寿

州，周军水、骑两路夹击，攻打寿州城，但南唐并不投降。同年 10 月，周世宗第三次亲征，周军骑兵和水师并进，大败唐军于濠州（今安徽凤阳），全歼南唐在淮河上的战舰，继之由淮水入长江，乘胜推进。南唐因难以抵挡，被迫派使者献地求和。三次南征最终以后周胜利而告终，共夺取淮南江北 14 州 60 个县，南唐主被迫取消帝号。

周世宗的战略是稳定后方以集中力量北上收复燕云，然后回过头来对付南方弱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这实际上是先难后易，而收复燕云也就成为统一事业的关键。所以，攻蜀和降服南唐后，周世宗立即移师北上。



突厥石人

959 年 2 月，周世宗下令诸军赴沧州（今属河北）集结，以韩通率军为北伐先锋，并亲率大军作为主力，不到 42 天就收复了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及 20 余个州县。5 月，周世宗率诸军乘胜进攻幽州，大败北汉援兵及契丹骑兵。可惜的是，在这关键时刻，周世宗得了重病，周军只得撤军。6 月，39 岁的周世宗英年早逝，统一事业中道而止。

第七章

陈桥涯海须臾事

——宋、辽、金、元时期作战方式的变革

明人何希齐写过两句很有名的诗："陈桥涯海须臾事，天淡云闲古今同。"其实，因为特殊外部环境与内部情况，宋、辽、金、元时代一直交织着频繁民族（种族）争战，各民族政权的生存角逐，使得这一时期的军事情况至为复杂，用两个军事事件来涵盖这400来年的历史，也未免太过简单化。

一　赵匡胤的"一天下之志"与"一天下之策"

旧史上所谓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红光满室，当然是粉饰之词。但他与唐末五代的其他军阀确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这位出身职业军人和高级武将的皇帝，夺取政权之初便显出过人的"一天下之志"与"一天下之策"。

（一）陈桥兵变

赵匡胤出身于军人世家。他和他的父亲原来都是周世宗部下军官，曾随周世宗南征北战，因战功卓著被提拔为禁军的高级将领。周世宗临死前，立幼子柴宗训为继承人，为防止兵变，曾于病中煞费苦心地安排后事，罢免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由赵匡胤接替了禁军的最高统帅权。

后周显德六年（959），宰相范质遵周世宗遗诏奉柴宗训继立为恭帝。这时恭帝年仅7岁（一说5岁），后周出现了“主少国疑”的不稳定局势。一个由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策划的军事政变计划正在酝酿着。

960年正月元旦，赵匡胤等人制造了契丹和北汉发兵南下的假情报，执政大臣范质等人不辨真假，匆忙派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三日，赵匡胤统率大军离开都城，夜宿距开封东北20公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导演了一幕“黄袍加身”的闹剧。然后回师开封，而守城的正是其心腹大将石守信、王审琦，所以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赵家王朝，国号为宋。

仅从这一事实本身看，陈桥兵变只不过是五代乱世军阀夺权易代的平常之事，但赵匡胤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想使赵宋成为又一个短命王朝，更不甘心于做一个乱世之君，而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政权。兵变之初，赵匡胤就接受心腹谋士赵普的建议，以不做皇帝相要挟，与三军约定入城之后要“秋毫无犯”，严禁抢掠烧杀，从而一改五代以来伴随改朝换代而来的洗劫和抢掠的“夯市”、“靖市”等恶习，朝着安定民生的长远目标迈进，保证了政权的和平易交，也予人以仁者之师的形象。兵变成功后，赵匡胤立即打击地方藩镇的反叛势力。当时，后周政权一些带重兵在外执行巡边使命的将领，如慕容延钊、韩令坤，

大都表示拥护宋太祖登皇帝位，只有盘踞潞州（今山西上党）的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驻守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先后起兵反抗，于是宋太祖亲率大军平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击败李筠和李重进。李筠和李重进当时是后周境内两个力量较强的藩镇，他们的失败，使得一些势力较小，又对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不满的地方藩镇，更无力与中央抗衡，只得表示屈服。这样到建隆元年（960）末，北宋在原后周统治区已基本上稳定了局势，这就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

（二）影响深远的《雪夜对》

虽然赵匡胤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就稳定了内部政局，但是在宋政权的辖区外，在北方有强大的契丹（后改国号辽）和在契丹支持下的北汉，而南方也仍有6个割据政权。所以能否结束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关系着赵宋王朝的前途和长治久安，也是赵匡胤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而要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摆在北宋君臣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是先南后北还是先北后南，换句话说是先易后难还是先难后易？据史载，赵匡胤为此颇费踌躇，并反复征询过军界及政界的意见，迟迟未能做出决断。

但这一关乎统一大业战略方针的重大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统一战争必须展开，“一天下之策”必须确立。为此，赵匡胤在一个大雪纷飞之夜去找赵普商议，于是发生了以下一段“雪夜对”。

赵普："天寒夜深，皇上为什么不在宫中呆着？"

赵匡胤："我实在睡不着，自己睡榻之外，全是别人的地盘，所以来同你聊聊。"

赵普："天下那么大，正是南征北伐的时候，皇上的打算如何呢？"

赵匡胤："我想先收复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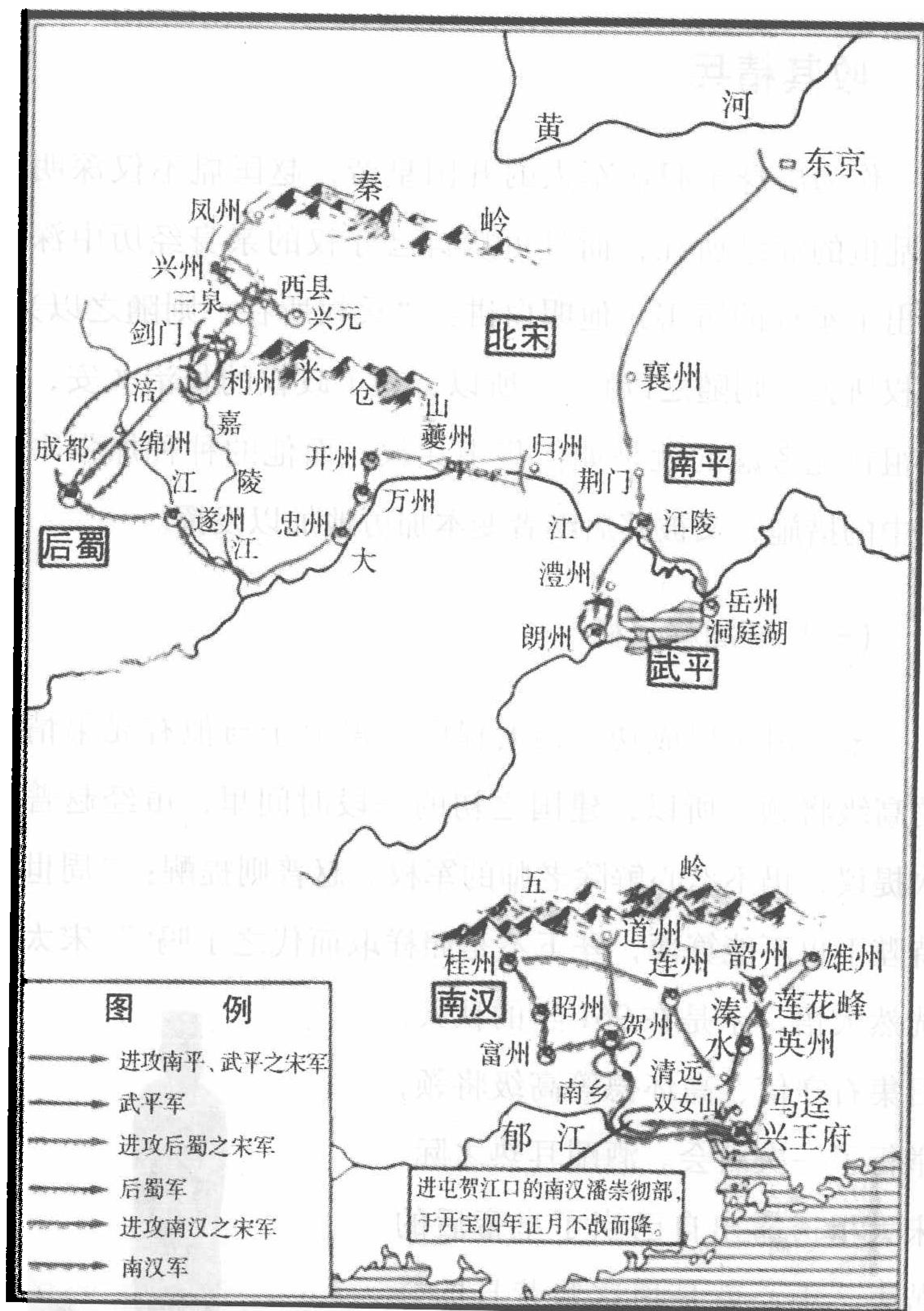
赵普听后"默然不语"，显然是不同意皇上的策略。赵匡胤逼赵普谈谈自己的看法，赵普慷慨陈词：北汉虽小，但有辽国之助，攻之并无必胜把握。即便攻下，反而与辽国和西北少数族直接敌对，战争将旷日持久。而南方诸国都是弱小之国，又是经济最富庶、最发达的地区，取之正可增强国力，然后北向用兵，即可一举而下北汉，收复燕云，与辽长期对抗。听了赵普这一席话，赵匡胤大笑："吾意正尔，姑试卿耳。"一个先消灭南方各个割据势力，后消灭北汉的统一战争的"一天下之策"就这样确定了。

此后，宋太祖按照这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展开了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963 年，湖南军阀内乱，宋太祖应周保权之请，派慕容延钊、李处耘率军出击衡阳的张文表。并以借道为名，顺便灭掉了荆南的军阀高继冲，不久即平定湖南。964 年，宋太祖以后蜀主孟昶勾结北汉为由，发兵 6 万分两路西讨，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率领，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两路宋军只用了 66 天时间，即攻下后蜀，孟昶投降。灭后蜀后，赵匡胤又于 970 年派大军征讨割据于岭南的南汉。宋将潘美用火攻打败南汉军主力，直取

广州，平定了岭南。974 年，宋朝以强大的军事威慑逼迫割据杭州的吴越钱氏归附，并开始对十国中最强的南唐实施夹击。宋将曹彬、潘美用李若水之计，在长江上建成浮桥，大军突入江南，围攻金陵（今南京）。南唐主李煜求和不成，只得调集 10 余万大军负隅顽抗，但为时已晚，宋军于 975 年攻下金陵，南唐灭亡。在宋军的强大军事威慑下，割据杭州的吴越钱氏与割据漳州、泉州的陈洪进献地纳土，宋朝完成了统一南方诸国的任务。

北汉是十国中唯一一个割据北方的政权，宋太祖在灭蜀后曾两次兵临太原城下，甚至亲往前线指挥攻城，但都因为辽国增援而功败垂成，被迫撤军。976 年，宋朝已完成了统一南方的任务，发动了第三次北伐。宋太宗派潘美担任主帅，名将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等各率大军奋勇进攻，将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郭进所部在石岭关也有效地阻击了辽国援军，宋太宗也亲自赶到太原城下督战，北汉主刘继元困守孤城。在外无援兵、内部厌战的情况下，走投无路，于五月初五被迫投降。

北宋王朝自公元 963 年至 979 年，经过 16 年的战争，结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方主要地区的统一，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北宋王朝统一战争所以能取得胜利，其军事上的原因，一是先南后北的战略符合当时南弱北强的情势；二是成功运用了各个击破的策略，从而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


黄
河
东京
秦
岭
凤州
兴州
三泉
西县
兴元
剑门
北宋
米
仓
山
利州
涪
嘉
襄州
成都
绵州
夔州
归州
开州
南平
荆门
江
陵
万州
遂州
忠州
江
江陵
后蜀
江
大
澧州
岳州
朗州
洞庭湖
武平
五
岭
道州
桂州
连州
韶州
雄州
南汉
昭州
贺州
浈
水
莲花峰
英州
富州
清远
南乡
双女山
马迳
郁
江
兴王府
进屯贺江口的南汉潘崇彻部，
于开宝四年正月不战而降。
图 例
进攻南平、武平之宋军
武平军
进攻后蜀之宋军
后蜀军
进攻南汉之宋军
南汉军

北宋统一战争示意图

二　收其精兵

作为出身于职业军人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不仅深明五代乱世的症结所在，而且更从自己夺权的亲身经历中深刻悟出了军权的厉害，他明白讲："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所以，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宋太祖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集中兵权，而他的种种加强军权集中的措施，又被其后继者变本加厉地加以发挥。

（一）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夺权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与他有兄弟情分的高级将领。所以，建国之初的一段时间里，虽经赵普多次提议，仍不忍心解除老帅的军权。赵普则提醒："周世宗待陛下也不能算薄，陛下不是照样取而代之了吗?"宋太祖恍然大悟，于是在961年的秋天，召集石守信、高怀德等高级将领，举行了一次酒会。酒酣耳热之际，宋太祖透露出自己当了皇帝后的苦衷，中心就是怕这些昔日的好友重演他"黄袍加身"的故伎。这些高级将领没想到皇上如此不信任他们，忙请教求生之道。赵



宋代武官像

匡胤则大讲他的人生哲学："人生短暂，恰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并许诺，只要老帅们交出兵权，国家则给予他们丰厚的经济补偿，"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产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当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结果，这些人第二天纷纷要求解除军职，宋太祖从而兵不血刃地剥夺了功臣宿将的兵权，达到了"罢功臣，释兵权"的目的，将中央禁军的领导权牢牢控制于自己手中。

（二）收其精兵

解除功臣宿将兵权之后，宋太祖接着思考从体制上根除兵变篡权的痼疾。他曾为此事专门请教心腹谋士赵普。赵普认为，唐末五代以来之所以会出现篡夺成风、地方割据的局面，关键在于地方长官权力太大，"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宋太祖对赵普的说法深为赞同，立即从"权"、"钱"、"兵"三个方面着手，用"夺"、"制"、"收"的办法，对地方军阀釜底抽薪，进行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的努力。

唐末五代的地方军阀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掌握了地方的行政和经济大权。宋太祖则按照赵普的建议，让地方州郡直隶中央，并下令地方财政收入除留下办公费用外，一律上交中央。这样，地方长官节度

使就失去了割据一方的经济条件。对更为直接的兵权问题，宋朝总结了五代以来的成功经验，改革了军队领导体制，在中央专门设立枢密院，作为主管军事事务的最高机关，负责制定战略决策，处理国防事务，招募和调遣军队，但仅有发兵权而不掌握军队。枢密院与宰相机构合称二府，其长官与副宰相平级。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则是“三衙”，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者平级，互不统属，分别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主要任务是管理全国军队的训练、轮流戍守等，但没有皇帝的命令不可调动军队。其长官分别为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其上不再设殿前都、副都点检、侍卫马军、步军正副都指挥使之职。而且“三衙”长官全部用资历浅、易驾驭之人充任。每遇部队出征，“三衙”将帅不能统兵，而是由皇帝临时任命其他官员统率部队。同时，大军出征，皇帝皆预先颁发阵图，遥控指挥。战事结束，兵归“三衙”，而统兵将帅各还原职。这样一种体制，就将调兵权、统兵权、指挥权一分为三，真正将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按宋朝人的说法：“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这种制度对削弱唐藩镇割据以来的兵祸，保障社会安定确有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互相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

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宋朝还根据“收其精兵”的原则，

派出使者到全国各地，挑选个子高、武艺出众的士兵补充到中央禁军。在全国武装力量的构成上，宋朝将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藩兵。禁军是中央掌握的正规军，驻守于京城和其他军事要地，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主力。宋初时，禁军大约有20万人，京城驻扎10余万，京城以外驻扎10万，从而达到“内外相制”的效果。厢军属地方军，因其精锐已被选走加入禁军，所以剩下者多为老弱，无战斗力，只充任营建、运输、工矿的役卒。乡兵则为地方民兵，或称“强壮”，或称“弓箭手”，主要在宋辽、宋夏边境地带的河北、陕西、河东（今山西）组建，到北宋中期曾达到数十万之众。藩兵则是由少数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军，主要集中在宋夏交界的西北边境，用以对付西夏。宋代的禁军和厢兵全靠招募。同时为了防止地方造反，宋朝统治者还实行养兵政策，在出现灾荒之年将灾区的青壮年农民召入军队，或招安收编一些反抗武装，从而形成了冗兵冗费的局面，军队的素质不高。

宋朝的主要军种是陆军和水军。陆军有步、骑两大兵种，步兵主要集中在侍卫步军司，人数最众，但战斗力不强。骑兵则分属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是宋军的主力。但因为唐末五代以来失去了西北产马之地，加上辽、夏、金都实施马禁，所谓“马、羊不许入宋”，所以宋朝严重缺马，一直未建立起强大的骑兵，这也是宋朝在民族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被动挨打的原因之一。相对于步、骑军，宋代的水军发展至为迅速，北宋承袭后周，周世宗对南

方用兵已注意到水军的重要。宋太祖更重视水军建设，他曾多次亲临造船的兵工厂，观看制造战舰，视察水战演习。北宋在都城开封和山东沿海，都驻扎有强大的水军。南宋时，水军更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成为抵御金的主要力量。

宋代的武器装备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武器的更新和发明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宋神宗时，为提高兵器的制作水准和质量，还专门设立军器监，指导和负责全国的兵器制造。为了对付少数族的强大骑兵，宋代步兵的装备主要是弓弩。弩有两种，一种是由人力踏张的轻弩，一种是由绳索绞张的床弩。属于后者的床子弩更是威力巨大，一次可发射几十支箭。在澶渊会战中击毙辽国统军挞览的，就是床子弩。宋代还大大发展了抛石机，用以发射火球、火炮，在守城和野战中发挥着巨大威力。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火药的发明，宋代已开始在战场上使用火器，各种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应有尽有，远远超出了冷兵器的杀伤力。

宋代的这些措施虽收到了“制将帅，立兵制”，集中军权的目的，但并未达到强兵的效果。因为过度压抑将帅，结果兵骄将弱。而“养兵”国策的长期执行，则又与精兵之初衷相违，造成老弱病残充斥军营，训练全废，徒有冗兵而战斗力不强，全非英勇善战之师，并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导致“积贫”，最终军事虚弱、内弱外强，屡败屡战，亡于外患。

三　北伐燕云

赵宋王朝始终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大业，因为北方的燕云十六州仍然控制在辽国（契丹）之手。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不能对周边少数族进行有效的控制，到了公元916年，契丹族在其著名领袖耶律阿保机的领导下，在中国的北方建立了强大的民族政权。其时中原内乱，契丹趁机向中原渗透，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与中原军阀对抗，屈辱地将汉族聚居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从此，中原不仅丧失了长城以外的防线，而且作为第二道防线的长城和长城以内的丘陵山地也一并失去，从此，华北和中原无险可守。而辽国既具有游牧民族全民皆兵的军事优势，又夺得了长城内外的农业区，所以在南北对抗中取得有利的战略态势，并不断派兵南下骚扰中原，成为中原王朝的劲敌。

宋朝建立之初，因为忙于整顿内部和统一南方，对辽国采取和好政策。但宋太祖并没有忘记北方之顽敌，更没有放弃收复燕云的努力，他曾设想改用赎买的办法，从辽国手中买回这一地区。为此他专门设置了"封桩库"积累财富，并多次对大臣讲，"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果达不到目的，则用战争的手段

解决："散滞财，谋勇士，俾图攻取耳"，并设想"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缗"。他还对宰相赵普讲，有朝一日收复了燕云十六州，就要在古北口一带设防。所以在宋太祖看来，不收复燕云地区，就算不上真正的统一，为此他多次拒绝大臣给他上"一统太平"的尊号。但终太祖一朝，主要精力仍在于对南方的征服。

（一）宋太宗兵败高粱河

979年，北汉投降宋朝，十国中的最后一国灭亡，宋太宗为建立不世之功，决定乘战胜的余威，一举收复燕云。宋军以幽州为主要作战目标，迅速自太原移兵东进，越过太行山，一路势如破竹。易州、涿州等幽州外围的辽军，纷纷投降。宋太宗认为幽州易取，遂率宋军主力进至幽州城下，四面围攻，但遇到了辽军统帅韩德让的抵抗，久攻不下，宋军锐气大挫。加上此前围攻太原旷日持久，士卒疲惫，粮饷不足，战斗力也大大下降。正在紧要关头，辽国名将耶律休哥率骑兵10万，与耶律斜轸大军会合，从左、右两翼对宋军实施猛烈反击，在高粱河大败宋军。辽军还直冲宋太宗的卫队，打乱了宋军的阵脚，宋太宗大腿上也中了一箭，于慌乱中乘驴车南逃。宋军全线大溃，而辽国骑兵乘胜追击，杀死杀伤宋军数万人，并夺得大量兵器、粮草，太宗的第一次北伐就这样狼狈而败。

高粱河之战，赵光义被河东之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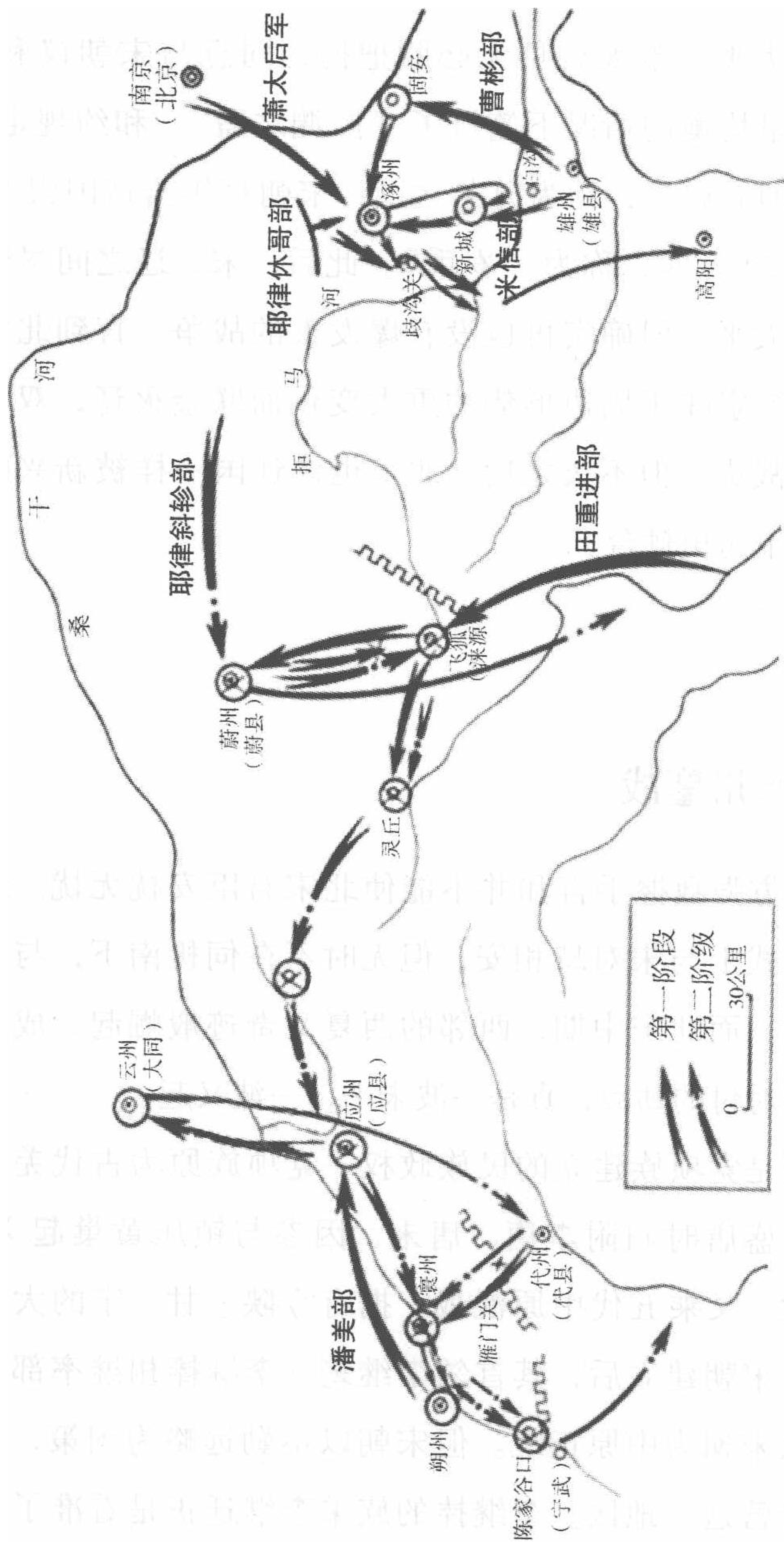
战略决策轻率，不知彼又不知己，打无准备之仗而招致失败，违背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兵法原则。契丹地广兵多，尤其以骑兵见长。因此，北伐幽州必须查明辽国战略预备队的动向，并部署足够的阻援力量。同时，幽州是一座坚城，一直被辽国作为南进的战略基地加以经营，为辽所必守必争之地，根本不存在出其不意奇袭取胜的条件，而必须做好持久攻打坚城的各项充足准备。可惜的是，宋太宗轻举盲动，落得个大败的下场。

（二）雍熙北伐

986 年，宋太宗为报高粱河惨败之仇，发动了第二次北伐。此次宋军兵分三路：东路军为主力，名将曹彬任主帅，与名将米信各率军 10 万出雄州（今河北雄县），直逼燕京；中路军以田重进为主将，率军由定州（今属河北）出飞狐（今河北涞源）；西路军以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率军出雁门关攻取山后诸州。最后三路大军会师燕京。战争开始后，三路大军节节胜利，中路军很快完成预定任务。西路军也击败辽军，连克寰（今山西朔县东）、朔（今山西朔县）、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四州之地。按宋太宗的部署，东路军宜持重缓行，以吸引辽军主力，而由中、西两路大军在山后得手，切断辽国援燕京之敌，然后一起合围燕京。但东路军进展过快，在粮食转运困难的情况下，很快推进到涿州，结果因乏粮不得不退回雄州。等得知其他两路大军连战得捷，又贪功冒进再进至涿州。

辽萧太后得知宋大军北伐，急令耶律休哥率精锐抵挡宋东路军，耶律斜轸率军遏制潘美、田重进两军，萧太后随后也亲自率大军驰援燕京。当时曹彬、米信的大军正二次北上涿州，与耶律休哥对垒。萧太后的大军突然到达，与耶律休哥合击宋军于歧沟关，宋东路军大败，被辽军追到拒马河，死伤及溺水而死者达数万。东路军的溃败，影响到整个战局，原定的战役计划不得不改变，所以宋太宗急令中、西两路军退守，又令西路军的潘美、杨业迁云、应、朔、寰四州之民于内地。此时，中路军已先行撤回，剩下西路军孤悬敌后，而辽军在大败东路军之后，正全力压向宋之西路军。鉴于这种态势，杨业主张暂避敌锋，但监军王侁却指责杨业“逗挠不战”。杨业被逼无奈，只得率军出击辽军主力，并与潘美约定在陈家谷派兵接应。但杨业退至陈家谷时，潘、王二将却率军先撤，导致杨业被围陈家谷，部众大部分战死，杨业本人也身负重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

迭经两次惨败，宋太宗锐气尽失，放弃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计划。一统天下之理想，终成画饼，宋朝从此“不敢北向”，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进攻，转而采取守势，重兵守边，以兵为险，修筑防御工程。比如建城挖壕，在华北平原广开河道，遍植树木等，以阻遏辽军铁骑。而辽军则不时大举南下。景德元年（1004），辽圣宗与萧太后率大军绕过宋朝河北郡县冒险深入，统军萧挞凛所部前锋，直逼黄河北岸的澶渊（今河南濮阳）城下，恰恰萧挞凛中了宋



南京
（北京）
萧太后军
固安
曹彬部
涿州
耶律休哥部
新城
白沟
雄州
（雄县）
米信部
岐沟关
高阳
拒马河
桑干河
耶律斜轸部
田重进部
飞狐
（涞源）
蔚州
（蔚县）
灵丘
云州
（大同）
应州
（应县）
寰州
代州
（代县）
雁门关
潘美部
朔州
陈家谷口
（宁武）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0
30公里

岐沟关之战示意图

朝守军的床子弩而死。宋真宗在寇准等的坚持下御驾亲征，宋军士气大振。萧太后见无必胜把握，同意与宋朝议和，双方在力量均衡的情况下签订了“澶渊之盟”。和约规定，双方维持旧有疆界，约为兄弟之国，宋朝每年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此后，宋、辽之间尽管并不那么太平，但确实再也没有爆发大的战争。直到北宋末期，宋徽宗昧于周边形势的重大变化而联金灭辽，双方才又重开战火。但不久之后，北宋也像辽国一样被新兴的女真族赶下历史舞台。

四　好水川鏖战

与北方强敌握手言和并不能使北宋君臣安枕无忧。辽国虽在形式上与宋对峙相安，但无时不在伺机南下，与宋暗暗较劲。而北宋中期，西邻的西夏又奇迹般崛起，成为宋朝最难对付的劲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民族政权。党项族原为古代羌族的一支，盛唐时归附李唐。唐末，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势力渐大，又乘五代中原混战，据有今陕、甘、宁的大部分地区。宋朝建立后，其首领李继筠、李继捧相继率部归宋，承认宋朝为中原正统。但宋朝以不勤远略为国策，并未着力经营这一地区。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正是看准了宋朝的这一弱点，上台之后立即与辽国结为军事同盟，对宋

朝形成犄角之势，时叛时降，成为宋朝西边之劲敌。宋真宗时，李继迁又率众攻下了宋朝控制西北的枢纽——灵州（今甘肃灵武），并定都于此，从而将势力扩展至黄河上游的最肥沃地带，对宋朝的边防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在与宋朝的长期对抗中，西夏方面并未得到多少便宜，而宋朝方面，劳师动众的军事镇压也很少奏效，所以双方转而议和。

议和反为西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西夏利用摇摆于宋、辽之间的有利条件，不断强大。1038 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宋夏关系重新破裂。宋仁宗对元昊称帝极为不满，下诏募人捕捉元昊，同时派大臣往陕西前线，计划讨伐事宜。而元昊则先发制人，首先向宋朝发动了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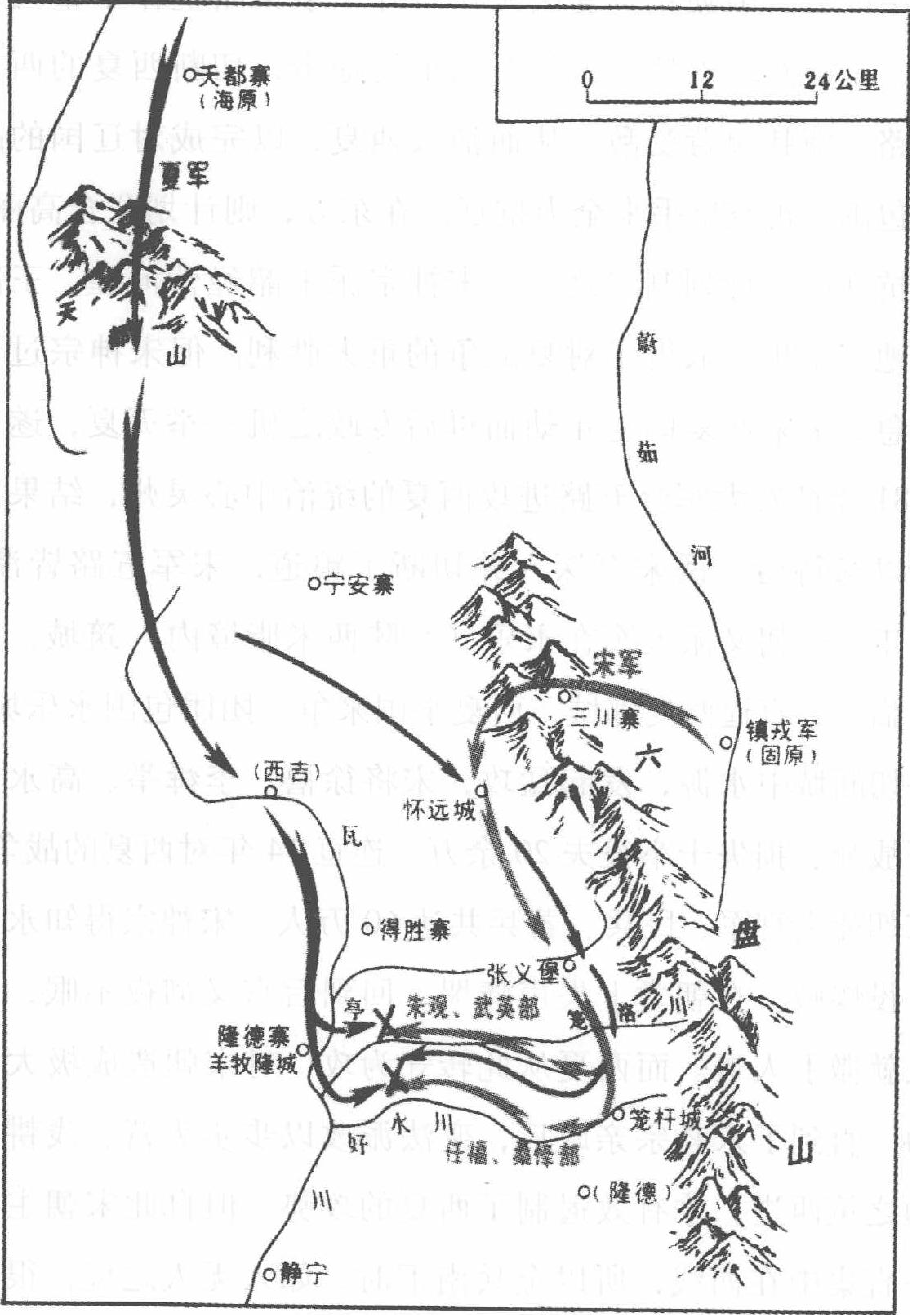
1040 年，元昊率大军袭击宋方军事要塞金明寨，目标是宋方的军事重镇延州（今陕西延安）。为声东击西，元昊一方面派使者与延州守将议和，一面又作出进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的假象。宋军前线主帅范雍被元昊的声东击西所迷惑，急派大将刘平、石元孙率军 3 万驰援保安，发现上当后，又督促刘、石二将回师解延州之围。而夏军 10 万精兵正在延州北面三川口这一预设的战场设伏打援，将宋军诱进了包围圈。双方恶战一天，宋军全军覆没，刘平、石元孙两位主帅也被俘虏。

三川口大败后，宋廷舆论大哗，宋仁宗为挽回大国的颜面，调禁军 20 万、厢军 10 万、乡兵 10 万前往陕西，并派朝廷重臣韩琦为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为陕西安抚副使

知延州，共同负责对夏作战。范仲淹对沿边军事部署作了调整，一方面坚壁清野，固守城寨；另一方面积极备战，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夏的进攻。但因为宋廷在是攻是守上一直举棋不定，所以元昊抓住这一机会，计划实施对宋朝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1041 年，元昊故伎重演，又是一面派人请和，一面亲率大军 10 万进攻渭州（今宁夏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并派兵去诱惑宋军，拟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设伏围歼。韩琦得知夏军入境，不顾范仲淹的反对，集中所有人马，又选勇士 1.8 万，由大将任福率领出击。结果，任福恃勇轻进，视夏军佯败小胜为不足破，只率几千人穷追不舍三天三夜。追到好水川，反不见了夏军踪影，仅于路旁发现几只银泥盒，令人打开后，只见 100 余只哨鸽腾空飞旋。此时，早已埋伏好的 10 万夏军立即四面合围，宋军不及列阵，西夏骑兵已杀将过来。此役，宋军阵亡将校军官达数百人，士卒更达 6 000 余人。次年，元昊根据宋朝 20 余万精兵驻扎于沿边，而关中空虚的情况，又率骑兵 10 万突入关中，直捣宋朝腹心之地，在定川寨将数万宋军分割包围，导致宋方葛怀敏等几十个将领战死，损失士卒 9 000 余人。西夏军又乘胜大掠渭州，关中六七百里以内均受破坏，陕西大震。在宋夏战争正紧张之时，辽国也向宋朝施加压力，派使臣再次索取关南之地。面临北线、西线的两面压力，宋廷只得答应每年给辽国增加银 10 万两，绢 10 匹，并在辽国的压力下，不得不与西夏议和，以“岁赐”名义，每年给夏国银 7 万多两、帛 15 余万匹、

茶 2 万斤。元昊则答应取消帝号，由宋朝册封其为夏国主。

到了宋神宗朝，为摆脱两面受敌的局面，王安石主持变法以图富国强兵。变法派在对外军事策略上作了重大调整，决定西取熙河，占领黄河上游地带，切断西夏的西方出路，使其腹背受敌，从而消灭西夏，以完成对辽国的战略包围，再空出手来全力抗辽。在东方，则计划联合高丽，共抗辽国。计划制定之后，宋神宗派王韶经营河湟，王韶拓地三千里，取得了对夏战争的重大胜利。但宋神宗过于性急，欲乘西夏国主年幼而母后专政之机一举灭夏，遂于 1081 年征发大军分五路进攻西夏的统治中心灵州，结果西夏以逸待劳，诱宋军深入并切断了粮道，宋军五路皆溃。次年，宋朝又派大军在永乐（今陕西米脂境内）筑城，居高临下，直逼西夏都城，西夏举国来争，团团包围永乐城，并切断城中水源，发起猛攻，宋将徐禧、李舜举、高永能等战死，损失士卒役夫 20 余万。连亘 14 年对西夏的战争，宋朝死去官军、民兵、蕃兵共达 60 万人。宋神宗得知永乐一役惨败，在朝堂上失声痛哭，回到后宫又彻夜不眠，不久就撒手人寰。而西夏从此转守为攻，对宋朝造成极大威胁。直到了宋哲宗亲政后，变法派改以步步为营、浅耕挠边之策西进，才有效遏制了西夏的攻势。但自此宋朝主力一直集中在西线，所以金兵南下时，如入无人之境，很快灭亡了北宋。



0
12
24公里
天都寨
（海原）
夏军
天
都
山
葫
芦
河
宁安寨
宋军
三川寨
镇戎军
（固原）
六
（西吉）
怀远城
瓦
亭
得胜寨
张义堡
朱观、武英部
笼
洛
川
盘
隆德寨
羊牧隆城
好
水
川
笼杆城
山
任福、桑怿部
（隆德）
川
静宁

好水川之战

五 “海上之盟”与“靖康之难”

正当宋朝末年内外交困之际，中国北方的形势却发生着重大变化。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在进入军事民主制时代以后，势力迅速膨胀。1115 年，女真族著名领袖完颜阿古打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称帝建立金国，誓师抗辽，并不断大败辽军，攻下了辽国的黄龙府（今吉林长安）。辽天祚帝派步、骑 27 万前往镇压，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遂亲率大军 70 余万亲征，但尚未对阵而国内发生动乱，只得仓皇撤军。金兵则趁势追击，天祚帝一日一夜向西逃了 500 公里。经此一役，辽国主力丧失殆尽，灭亡已成定局。

就在这一年，辽国大臣马植投奔宋朝，向宋廷进献“联金灭辽”之计。宋朝徽宗听说可以收复连太祖、太宗都未能收回的燕云十六州，顿时来了精神，马上亲自接见马植，并任命其为宋国的全权使者，两次从山东半岛渡海绕道前往金国去见阿古打，商议两国夹击辽国之事。马植与金约定：宋、金共同出兵灭辽，灭辽以后，宋朝收回燕云地区，并将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 50 万银绢转送金朝。这一盟约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之盟”。

1120 年，金国发动灭辽战争，一路进展顺利，攻下了辽国的四座京城。剩下的燕京，依盟约规定应由宋方出兵攻打。但宋方迟迟不能践约，在金国的不断催促下，宋朝

才派童贯率领大军北上。童贯所领部队本为陕西前线的精锐，但因刚从南方镇压方腊起义回来，疲惫不堪，所以北上之后，与辽国燕京守军刚一接触即溃败。后来童贯又盲目发动偷袭，结果在辽军骑兵的冲杀之下，反而死伤殆尽，尸体遍野。童贯于是暗中请金国帮忙，金国攻下了燕京，不肯给宋朝，童贯只得私下答应按每年100万贯的租税额赎回燕京。而金兵退出燕京时，将城中居民全部掳走，宋方只得到一座狐狸出没的空城。

宋朝君臣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中，全然未意识到金国已变成了新的最具威胁的敌人。而金国经燕京之役，也看穿了堂堂大宋的西洋镜，南方的富庶对这一新兴民族充满着更大的诱惑。

1125年，金兵擒获了辽天祚帝，遂即全国动员发动南侵。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东路军由完颜宗望（斡离不）率领攻下燕京，然后南下；西路军由完颜宗翰（粘罕）率领从大同出发进攻太原，计划两路大军会合于开封城下，攻取宋之都城以灭亡宋朝。年底，宋燕京守将郭药师率众降金，并作为向导与金东路军一起南下，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渡过黄河，直逼开封。宋徽宗闻讯，忙遣使者求和，同时下令各地方官率兵勤王，并匆匆忙忙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桓（宋钦宗），自己逃向南方。靖康元年（1126）正月，当宋廷仍在争争吵吵，为议和还是抵抗而纠缠不清时，金军人已兵临开封城下。危急之际，文臣李纲挺身而出，主持开封防务，将攻城的金军击退，加之各地勤王军也陆续

到达开封城外，斡离不见宋方已经有备，一时难以攻下设防坚固的东京，加上自己孤军深入，有被宋军切断归路的危险，所以答应讲和。宋方一听金人愿意议和，喜出望外，除答应给金国大量金、银、绸缎外，又满足了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要求。宋钦宗还下令严禁在金兵北归途中进行邀击，结果金军安然无恙地退回了河北。

金兵刚一撤退，宋钦宗就认为万事大吉了，立即罢免性格耿直的李纲，还遣散了各地的勤王军。宋徽宗也从南方回来，准备过太平日子。殊不料金人得到李纲被罢相，各地勤王部队已从开封撤军的情报后，认为有机可乘，立即于当年8月再次兵分两路南下。其中，粘罕仍率军进攻太原。太原自第一次被围，至此已达8个月之久，守将王禀一直坚决抵抗，最后粮断水绝，又得不到救援，终于城破。此后，金两路大军继续南下，各地宋将听到消息，主动率兵前往开封救援，但宋钦宗一味想通过割地求和挽救危局，并下令诸军退回原地，金军遂得以长驱直入，并于此年12月再次包围开封。靖康二年，金军攻下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以及皇室子弟和大臣3 000余人，并带着掳掠的大批文物、财宝北返，北宋正式灭亡，史称“靖康之难”。

六　泥马渡康王

金军第二次围攻开封之际，宋钦宗除议和之外别无上

策，故派弟弟康王赵构入金营作人质，赵构于是因祸得福。

野史《南渡录》曾记：赵构被金军作为人质扣留后，只好装疯卖傻，金人以为他真是疯子，放他回国。赵构脱身后拼命南逃，到了黄河北岸的崔府君庙，人困马乏，酣然入睡。梦中忽得神人相告："金人已至，快醒来，门外已备好了马匹。"醒后果然有马在侧，立即骑上南驰。渡过黄河后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匹泥马。

实际上，赵构并未到过金营。因当日行至磁州，遇上了州官宗泽。宗泽认为赵构此行若被扣留，将永无回国之日，所以劝他不要前往金国。不久，围城之中的宋徽宗也派人送来密诏，任命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要他领兵勤王。赵构接到密诏后并没有率兵勤王，而是赶紧逃命，所以金军攻下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及皇室人员时，赵构得以幸免。另一个在浩劫中幸免被掳的是宋哲宗的废后孟后，她因为被废居于道观而漏网。金兵北归后，傀儡皇帝张邦昌在众人的谴责下，不得已把孟后迎回朝廷装点门面。靠着孟后的支持，赵构得以正式登基，于1127年5月在商丘称帝，史称南宋。

1128年，金国借口张邦昌被废和宋政权的重建，发动第三次南侵，目标就是捉获赵构，消灭赵氏南宋政权。宋朝方面除宗泽在开封附近进行了有效抵抗外，其他部队皆不堪一击。金军很快占领了开封、洛阳、长安等重要城市。此后金东路军在兀术的率领下，攻下了黄、淮之间的许多城市，并渡过淮河，对赵构穷追不舍。赵构从商丘一路马

不停蹄南逃，一直跑到了扬州。喘息未定，兀术兵团又千里奔袭扬州。当时赵构还以为已脱离了危险，正在扬州寻欢作乐，乍一听金兵杀来，慌忙带着五六个亲信太监骑马奔至长江边的瓜州渡，乘小船连夜渡江到了镇江。金兵在扬州烧杀抢掠后尾随而至，攻下建康（今江苏南京）。赵构跑到杭州后听说金人也已渡江，觉得杭州也不安全了，于是又由杭州往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兀术则紧追不舍，追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宋高宗无路可逃，只得乘海船出海避敌。而金兵追至明州，因无船可用，只有望海兴叹，然后转向杭州大肆抢掠一番后北归。宋高宗等在东海上航行了20多天不敢上岸，得知金人已撤，才由温州登陆，回到临安（今浙江杭州）。

金兀术的10万大军北归行至镇江，遇上宋将韩世忠的截击。韩世忠虽只有8 000士兵，但早已募集了许多大海船，控制了过江的通道，作好了截击金兵的准备。兀术想强渡长江，但他的水军在江心的激战中被韩世忠大败，遂率步、骑与水军沿南岸西上。韩世忠的舰队也沿长江北岸与金军并进，终于将兀术大军逼进了死港黄天荡。金兀术率大军多次突围均告失败，被困48天，才在向导的指引下挖开旧河道入长江，用小船分批渡江北去。在江北，兀术又受到岳飞部队的邀击，最后狼狈撤到淮北。但兀术兵团驻留淮北，久久不肯回北方，对南宋仍然是一个压力。

在兀术南下的同时，金国的西路军也大举进攻陕西，以牵制四川、陕西之宋军。为了解除金国对南方的威胁，

宋高宗命张浚前往陕西组织反攻。张浚到陕西后，立即布置防务，收复了长安等重要城市，并组织骑兵 7 万、步兵 13 万，号称 40 万与金西路军决战，以策应淮东战场。富平一役，宋军虽溃败，但仍打乱了金国的战略部署，迫使停住淮北的兀术兵团被调往陕西战场，减轻了金军对东南的压力。此后宋将吴玠、吴璘在和尚原、仙人掌又大败金兵，保住了入川的门户，阻遏了金军入川从长江上游顺江东下的企图。金之中路军虽一度进入江西，攻陷了不少城池，但也没追上孟后，不久也撤军北归。至此，外部压力暂得缓解，南宋遂定都于杭州。

因为一直处于战争的直接威胁之下，战争、备战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所以南宋一切制度不得不围绕战时体制展开，在军事体制上尤其如此。比如为适合战争需要，南宋的宰相多兼御营使之职，从而代行枢密使成为中央的最高军事统帅，总揽军政大权。军队体制上，则由御营司统一编制所能控制的军队，将全国军队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后来，又增设了御前五军、御营五军，分别由大将率领，屯驻于宋金边界的各个要害地区。所以南宋虽仍有禁军之名，但禁军在北宋末的宋金战争中已大部溃散，真正的国家主力则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几支驻屯大军，著名的中兴四大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岳飞的部队，以及川陕地区吴玠、吴璘的部队，就是五支最大的驻屯大军。所以作为国家主力的禁军已为新型的驻屯大军所取代，而且驻屯大军全是通过重新招募、改编或改组而建立的，

兵与将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战斗力也强。在地方上，南宋政府又于各路普遍设置“帅司”即安抚使，作为军事长官，服务于战争的需要。

从兵种上看，马匹来源的切断一直制约着南宋骑兵的发展，驻屯大军普遍缺马，在陆战中难以与骑兵占优势的金军争锋，常常败绩。相反，南宋的水军则发展迅速，显出极大的优势。南宋政府也比较重视水军建设，各驻屯大军皆有强大的水军。南宋还在沿江、沿淮和沿海设置了20余支水军，并重点配置在长江中下游和江苏沿海，对抵御金军的南下起了重大作用。



河南开封朱仙镇岳飞庙

七　北伐与“和议”

南宋王朝在对金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上一直未能作出正

确的抉择，主战、主和的争论反映在军事上就是北伐和议和。

宋高宗南逃之初，宗泽即力主抗金，在东京开封附近抵御金军入侵，大败金军70余次，并与河北的民间抗金武装——忠义民兵联络，准备收复失地。但赵构一味恐金，在逃难途中也念念不忘派人前往金国进行沟通。不过，当时金国一味要消灭南宋，形势也不容赵构讲和。

1130年以后，双方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金国名将兀术屡受宋军的打击，了无先前的气势。其他几支金国精锐，势力也大不如以前。而南宋方面，抗战派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不断壮大，形成了岳飞、韩世忠等几支战斗力强的部队。1134年，岳家军出兵收复了战略要地襄阳，夺得了北伐中原的前哨根据地。此后岳飞在襄阳苦心经营，不断壮大队伍，并多次打败金和伪齐联军。1140年，金国强硬派完颜宗弼（兀术）发动兵变，杀掉了倾向于与宋议和的挞懒一派，并亲任统帅率大军南侵，南宋朝廷起用抗战派大臣张浚部署反攻，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率军北伐。5月，金军15万余人由兀术率领直抵淮河下游重镇顺昌（今安徽阜阳），南宋抗金名将刘琦率1.8万人守城。当时天气炎热又大雨不止，刘琦利用金军轻敌冒进、不惯暑热的弱点，主动出击，击溃了金兀术的精锐，然后又轮番袭击金营。金兀术的15万大军溃败于顺昌城下，只得撤回开封。同时，宋军在川陕一带也奋力抵抗，使西线金军受到沉重打击。

趁着兀术撤军，宋将岳飞立即指挥大军从鄂州（今湖北武昌）出发北伐中原。岳家军将领王贵、牛皋、杨再兴等分别率部进军河南各州郡，攻克了颍昌（今河南许昌）、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洛阳等地，并在颍昌保卫战中大败金兀术，歼灭了金兀术的主力，乘胜追击到离开封只有45里的朱仙镇，大败10万金兵。此时，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军也在岳家军将领梁兴等人的联络下，对金军发起进攻，以配合正面战场。但是，南宋政府中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视岳飞北伐为议和之障碍，宋高宗也因有了议和资本，不仅不支持北伐，还强令岳飞撤军。次年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同意对金称臣，每年送给金国银绢25万匹、两，双方西以大散关，东以淮水为界。

但即使这屈辱的和平，也仅仅维持了20来年就为金国所打破。1149年，金完颜亮在金国篡位，两年后即迁都开封，并正式撕毁和约，以60万大军分四路南侵。金军主力突破南宋淮水防线，直抵长江北岸的和州（今安徽和县）、采石（今安徽当涂），准备船只大举渡江。当时守江的宋军因主帅尚未到任而一片混乱，前来犒军的文臣虞允文见情况紧急，毅然担负起指挥江防的责任，他将部队分为水陆两路进行殊死的抵抗。战斗中，宋军的霹雳火炮大显神威，渡江登岸的金兵全部被歼，乘船渡江的金军也受到南宋水军的有效拦阻。恰在这时，金国国内发生政变另立新君的消息传来，完颜亮的部下人心惶惶，不愿再战。完颜亮一

意孤行，想在灭亡南宋后再回国收拾局面，结果军中发生兵变，完颜亮被乱箭射死。南宋方面虽暂时渡过危机，但也无力进一步扩大战果。此后宋孝宗发动北伐，但经符离之败，全线溃败，宋金双方遂于1164年签订了“隆兴和议”，南北对峙的局面从此奠定。


朱仙镇岳飞庙岳飞塑像

符离之败后，宋、金之间有30来年未爆发大的战争，基本上相安无事，南宋小朝廷沉湎于歌舞升平之中，“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一直到了1205年，权臣韩侂胄才又发动了最后一次北伐，但因为准备不足，师出无功，议和派的史弥远趁机发动政变，杀死韩侂胄，将其人头送往金国，重新与金议和。宋方除增岁币外，与金国的关系还从叔侄关系降为伯侄关系。

八　重蹈覆辙的“联蒙灭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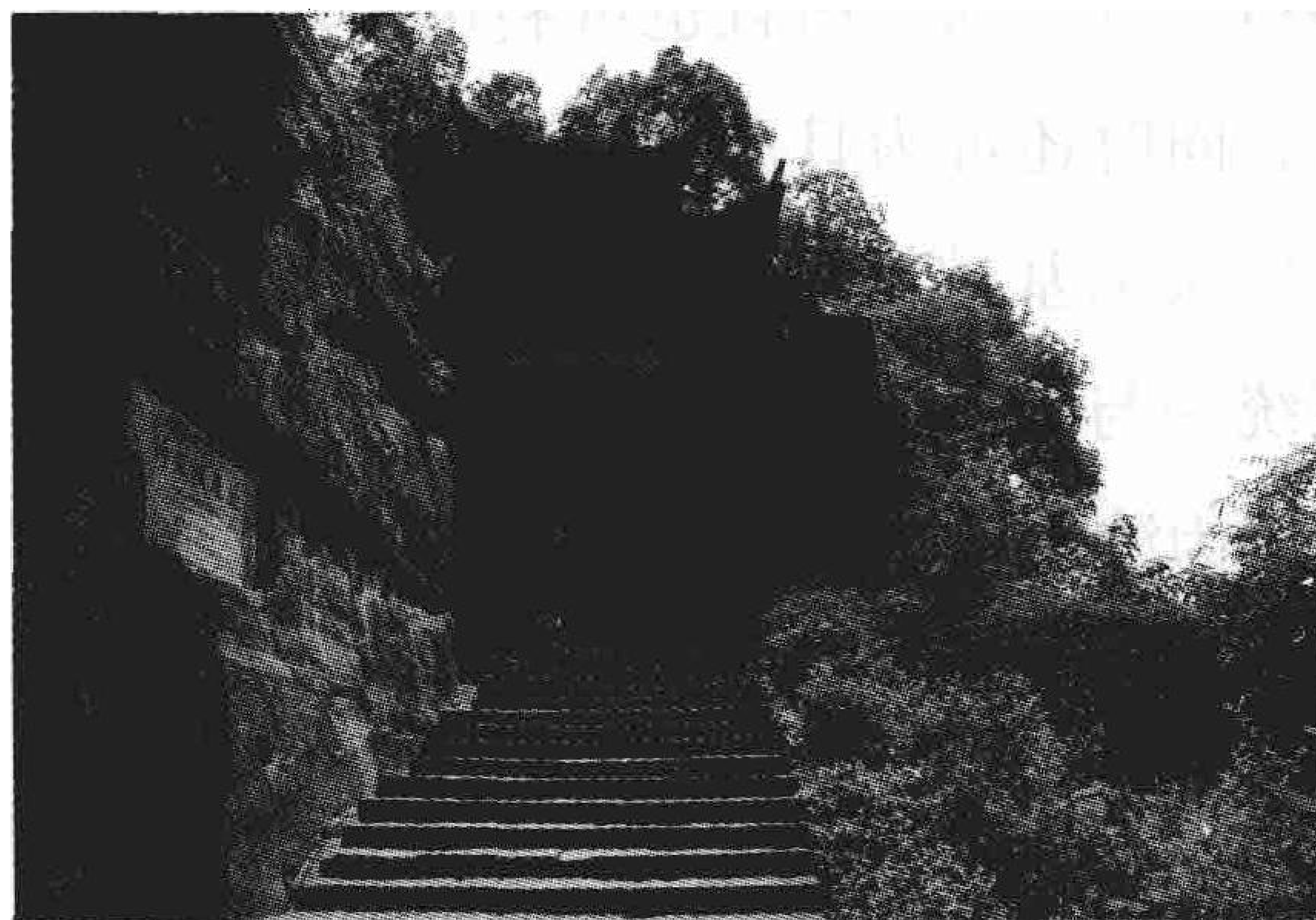
13世纪初叶，正当宋、金双方在江淮间鏖战之际，北方形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古族悄然崛起于大漠，成为

一个更强有力的角逐者。

1205 至 1209 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将其纳为自己的附属国。1211 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率军进攻金朝统治的北方，占领长城以北地区，不久又突破长城防线，进入华北和黄河平原。进入中原后，他首要的进攻目标是金朝。因为灭亡金朝不仅可为自己从事西进征服大业解除来自战略后方的掣肘，而且也可利用中原的经济、技术为西进服务，同时还可为日后征服整个中国，即灭南宋统一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首先灭亡金朝可谓是决定整个蒙古族统一与征服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但女真族与蒙古族同为游牧民族，在当时仍然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且经营中原多年，据有潼关等战略要地。单独依靠蒙古军队对其发起正面进攻，虽说也有成功的希望，但毕竟是硬碰硬，必定伤亡惨重。而且短期内很难取得成功，将影响到整个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属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以，如何更积极有效地击破金国，需要从以往成功的高明战略中汲取经验，指导新的斗争实践。为此，成吉思汗将联盟战略加以改造，服务于自己的总体战略。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以游牧部落为联盟伙伴的经验直接应用于对中原王朝的征服上。

当时，蒙古已经消灭了金军的一部分有生力量，便迫使金国迁都到中原的开封。后因蒙古主力转攻西亚，金国迁都后才得以苟延残喘。而南宋方面也及时发现了蒙古崛起和金国衰弱的现实。但是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三个

奸臣的接连专政，已使南宋国势日落西山，难以振作。当时，金国在蒙古的进逼下，幻想通过进攻南宋来弥补损失，又一次发动南侵战争。1219 年，金兵在西起川陕东到江淮的几千里战线上分三路攻宋，欲一举消灭南宋政权，但受到南宋方面的坚决抵抗，大败于淮东和陕西，一无所获。



钓鱼城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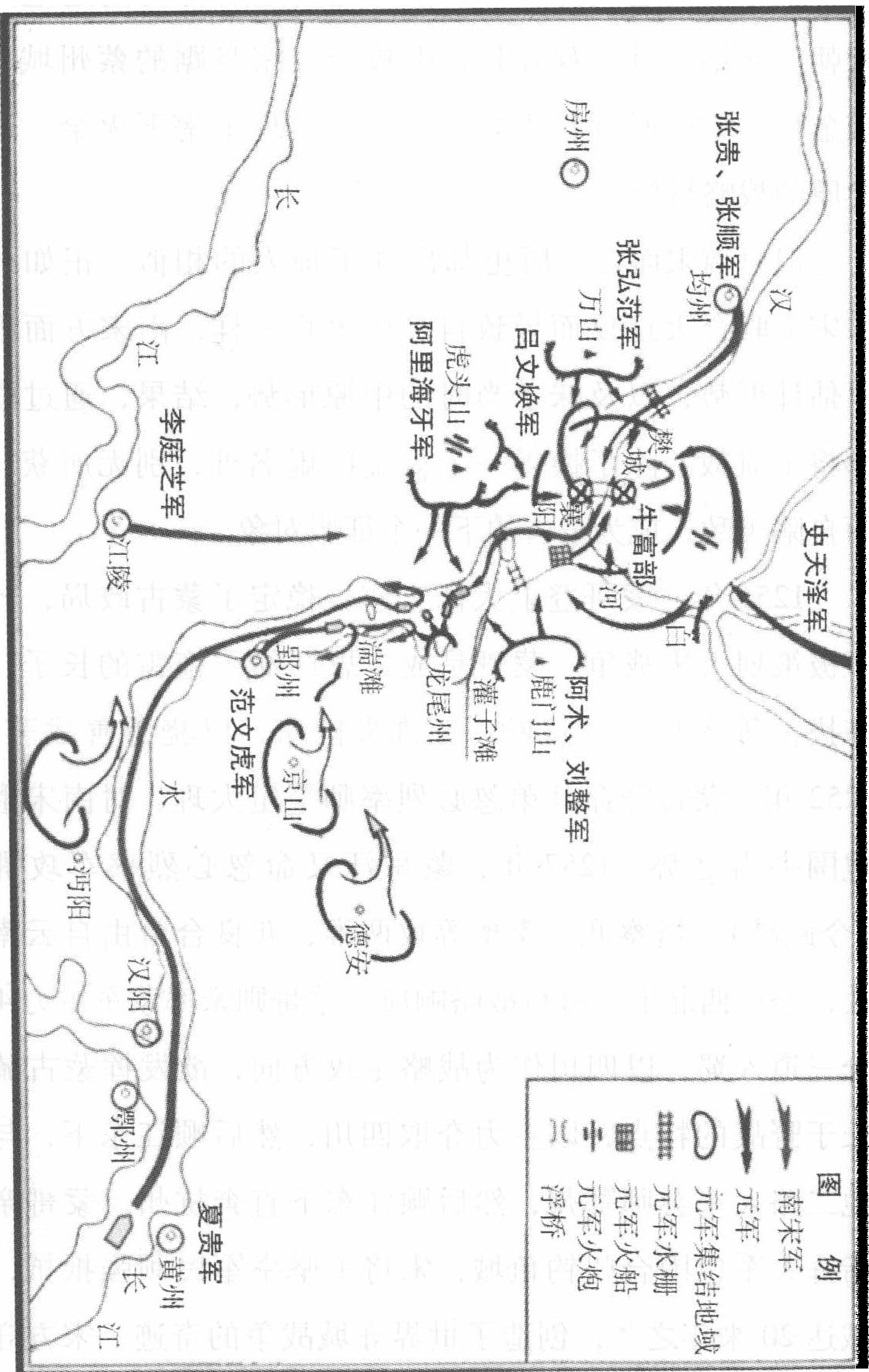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1227 年 7 月，成吉思汗病重弥留之际，专门就联宋灭金问题留下遗言，提出了联宋灭金的战略。这一战略的要点是：利用南宋对金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假道于宋，绕过金军所据的潼关天险，兵出唐、邓，进而直捣金朝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拖雷等为尽快灭金，遵照成吉思汗联宋灭金的遗言，于金天兴元年（1232）十二月遣使入宋，提议宋蒙联合。对蒙古人的提议，宋廷虽有不同意见，但“可遂复仇之举”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宋理宗

更未暇多思，带头予以响应，派使者前往蒙古军营予以回应，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蒙古应允灭金后将河南之地归于宋朝。此年八月，双方联合围攻金哀宗盘踞的蔡州城，城破金亡。蒙古通过联盟战略顺利地实现了南下灭金，逐鹿中原的战略目标。

但对南宋而言，历史却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正如北宋末宋金联合灭辽反而导致自己被灭亡一样，南宋方面因错误估计形势，以及昧于当时的中原形势，结果，通过联盟和将士血战，除了换得一个灭金的虚名外，别无所获，反而自陷于敌，成为蒙古的下一个征服对象。

1251 年，蒙哥登上大汗宝座，稳定了蒙古政局，开始积极策划灭宋战争。蒙哥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长子，曾与拔都等率兵远征过欧、亚许多国家，以骁勇善战著称。1252 年，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率师平定大理，对南宋形成包围夹击之势。1257 年，蒙哥汗又命忽必烈率军攻鄂州（今武昌），塔察儿、李璮等攻两淮，兀良合台由自云南出兵，经广西北上，进行战略响应。蒙哥则亲率蒙军主力 4 万分三道入蜀，以四川作为战略主攻方向，欲发挥蒙古骑兵长于野战的特点，以主力夺取四川，然后顺江东下，与其他二路大军会师鄂州，然后顺江东下直奔杭州。蒙哥亲自指挥大军包围合州钓鱼城，宋将王坚率军民顽强抵抗，守城达 20 来年之久，创造了世界守城战争的奇迹。宋方守城的火炮大大挫败了蒙军的进攻，蒙哥可汗为炮石击伤，死于钓鱼城下，蒙军被迫撤军。


张贵、张顺军
房州
长
江
汉
均州
张弘范军
万山
吕文焕军
虎头山
阿里海牙军
李庭芝军
江陵
樊城
襄阳
牛富部
史天泽军
白
河
阿术、刘整军
鹿门山
灌子滩
龙尾州
湍滩
郢州
范文虎军
京山
水
德安
沔阳
汉阳
鄂州
夏贵军
黄州
长
江
图例
南宋军
元军
元军集结地域
元军水栅
元军火炮
浮桥

襄樊之战

忽必烈登基后，采取南宋降将刘整提出的“中路突破”战略，调整战略部署，改以襄阳和樊城为主要战略方向，并大建水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仅编练的水军就达7万人，如果加上南宋方面投降过来的水军，则蒙方水军更多于此数。整个襄樊战役，蒙军投入的战船多达1.3万余艘，水军约15万人次。在长达5年的襄樊围攻战中，蒙古共出动了10万以上的兵力，并采取先下樊城，再下襄阳的战术。先截断襄阳与樊城的联系，尔后调炮队以回回炮猛轰樊城，继之以水陆夹击，成功突入城内。襄阳和樊城唇齿相依，历史上有“铁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樊城失陷后，襄阳顿成孤城。于是蒙军全力围攻襄阳，南宋守军坚守6年之久，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被迫投降。

襄樊之战的胜利，使蒙元军队在南宋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的缺口，不仅取得了中路突破的主动，切断了南宋东西两大战略基地的联系，使之陷入了被动的困境，而且经此一役，蒙元还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水军。从此以后，宋朝水军大部分投降元人，长江下游宋军的设防几乎完全失去意义。至此，元军水陆俱下，一举灭宋，统一全国的条件完全具备。以忽必烈为首的元军统帅部遂及时把握战机，委派伯颜统领雄师，实施渡江作战，直下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灭亡了偏安的小朝廷。1277年，元军占领南方的重镇广州。3年后，又在海南岛沿海将南宋残余海军消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而死，元朝完成了

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不过，南宋以偏安之局，能够抵御横扫亚欧、令西方谈之色变的蒙古铁骑长达60余年之久，也称得上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成吉思汗雕像

第八章

明朝和清前期的军事

一　朱元璋在统一战争中的战略指导

（一）朱升的“九字真言”

蒙古族以少数族入主中原，仅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一直未处理好民族问题，因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直都很尖锐。

到了元末，民间反元斗争日渐高涨，北方的韩山童、刘福通和南方的彭莹玉都在民间广泛传播摩尼教（明教），预言明王即将出世，弥勒佛将要降生，黑暗将要为光明取代。1343年，黄河决口，元政府征调大批民工开挖黄河故道，治黄工地成了老百姓的灾难场。韩山童趁机派人传播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在民工中制造舆论，并暗中埋下石人，起义时机业已成熟。韩山童和刘福通遂在颍州（今安徽阜阳）斩白马、乌牛正式起义，以韩山童为明王。起义军头包红巾，身穿红衣，老百姓称之为“红巾军”。韩山童的一把火燃起了遍地革命风云。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响应，攻占两湖；盐贩张士诚在太湖起事，方国珍在浙东起义。次年，郭子兴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反元。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赤贫出身的皇觉寺小和尚朱元璋脱下袈裟，投奔到了郭子兴的起义军中。

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后，凭着机智勇敢，很快得到郭子

兴的赏识，从普通士兵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总管。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继任这支队伍的大元帅，于1354年率军攻下了重镇滁州，成为雄霸一方的霸主。也就是这一年，一位出身乡间的老学者朱升进入朱元璋的幕府，向朱元璋奉献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献言。

朱升的九字真言主要是向朱元璋揭示了夺取天下的战略原则及其具体的策略、步骤。其战略原则的核心，乃是韬光养晦，后发制人，先固根本，再求发展。即注重军事与政治、经济的综合平衡，俟时机成熟之后，再展现锋芒，削平群雄，完成国家统一。至于具体的策略、措施，则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后方，谋求有利于未来发展的战略环境；二是发展生产，为日后的统一战争准备充足的兵员和物质资源；三是缩小目标，学习刘邦的经验，避免树大招风，尽量保存实力，从而不断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地盘。朱元璋正是遵循这一劝告，并作为自己集团的战略指导，通过整整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条不紊地准备，而最终具备了逐鹿中原的各项条件。

（二）先陈后张，逐一扫荡

在实施“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战略的同时，朱元璋接受谋士刘基提出的《平江南策》，先难后易，先主后次，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稳步向外拓展。他首先寻求与处于其上游的陈友谅摊牌。1360年，陈友谅企图凭借自己的水军优势进行战略突袭，一举攻下南京，摧毁朱元璋的

势力。但是他的水军中了埋伏，元气大伤，而朱元璋经此一役夺取了对手一支完整的水军，壮大了自己的水师。1363年朱元璋亲自率军在鄱阳湖击败陈友谅的主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当双方决战正酣之际，处于朱元璋东邻的张士诚却没有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反而按兵不动，坐失良机。陈友谅失败后，张士诚才如梦初醒，认识到和朱元璋之间必有一争。然而，一切为时已晚，朱元璋这时已可空出手来专力对付张士诚了。朱军本来已对张士诚形成战略包围之势，此时遂以破竹之势展开外围进逼，“翦其两翼”，先夺占长江以北，再从浙江迂回，很快就将苏州围困。10个月之后，朱军一举攻陷苏州，在南方取得了最后胜利，以后就只待北伐奄奄一息的元军残余了。此后，朱元璋奠定了自己在江南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为最后芟夷群雄，北上灭元统一全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先翦羽翼，后捣腹心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8）十月十八日，朱元璋在与高级将领的联席会议上果断作出大军北伐灭元的战略决策，并亲自制订了“先翦羽翼，后捣腹心”的战略方案。按照这一方案，整个北伐战争分为五个相互衔接、逐次推进的步骤：第一步，“先夺山东”。山东地区是拱卫元朝京畿的战略要地，过境的大运河是元大都物资供应的交通命脉，控制了山东，就意味着切断了大都的物资供应，将元大都置于朱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即所谓“撤其屏幕”。同时，山

东南与江南相接，朱军一旦夺取山东，再继续向北前进就拥有了可以依托的后方基地，粮草的供给，人员的补充均有了充分的保障。这样一来，就将朱元璋的势力稳步延伸和推进到了北方。第二步，“旋师河南”。即在夺取山东后，大军转而西进，配合偏师夺取中原四战之地。使王保保所率元军即使不被消灭在河南战场，也会遭受重创，失去斗志，无力回救大都，从而达到“断其羽翼”的目的。同时，对朱元璋来说，将山东、河南连为一片，也意味着将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即中国的腹心地带控制于自己之手，逐鹿天下已稳操胜券。事实亦复如此，朱军在攻下河南后，王保保所部残兵败将逃窜奔突，畏怯避战，不敢再与朱军对阵。朱元璋则立即移都于开封，居中指挥对元朝的战争。第三步，扼守潼关要塞，将关陇地区的元朝军队困于西方，切断其与朝廷中枢的战略策应，以保证中原的安全，为朱军下一步直捣大都扫除最后的障碍。第四步，“进兵大都”，攻克元朝统治中心，推翻元朝。在夺取山东、河南，并占据潼关，切断关陇地区元军与内地元军的联系之后，元朝已势穷孤立，外援无望，失去坚守的信心，这时朱军乘势直捣大都的时机就完全成熟了。洪武元年（1368）北伐军统帅徐达率军逼近大都，一举而下，元顺帝只得退往关外，朱军胜利进入大都，元朝灭亡。第五步，乘着攻克元大都的有利态势，及时发起战略追击，扫荡元朝残余势力，“鼓行而西”，逐次占领云中、太原与关陇地区，彻底完成国家的统一。事实果如所料，元大都一下，远在陕西等地的元

朝旧将和割据势力无心再战，次第被平，北伐灭元战争顺利结束。1368 年正月，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立起又一个封建王朝。

二　明成祖五征漠北

明朝建立后，元顺帝逃往开平，仍拥有长城以外的半壁江山，雄踞塞外，对明政权造成不小的威胁。鉴于这种情况，1368 年明军攻下北京后，朱元璋立即命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伐。此后明军又多次大军北征，虽将蒙古军队赶出长城，但并没能彻底消灭蒙元残余势力。朱元璋见一时难以平定蒙古军事力量，只好改变策略，派大军在北部要冲之地设防，从长计议。

明成祖朱棣夺位后，本拟用怀柔办法与蒙古的鞑靼、瓦剌部通好，但看到蒙古诸部纷争，便贸然派丘福率 10 万精锐骑兵北征，丘福又轻敌冒进，派先头部队深入敌境，结果被鞑靼军重重包围，全部覆灭，主力不得不退回塞内。此后鞑靼则不断南下袭击，明朝北部边防重又出现危机，明成祖遂决定亲征，企图用以攻代守的战略，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于是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一年（1410～1424）的 14 年间，明成祖先后 5 次率军出塞，其中 4 次以鞑靼和兀良哈为对象，一次以瓦剌为对象。前三次规模较大，后两次因鞑靼首领避而不战，无功而返。作战地区主要在斡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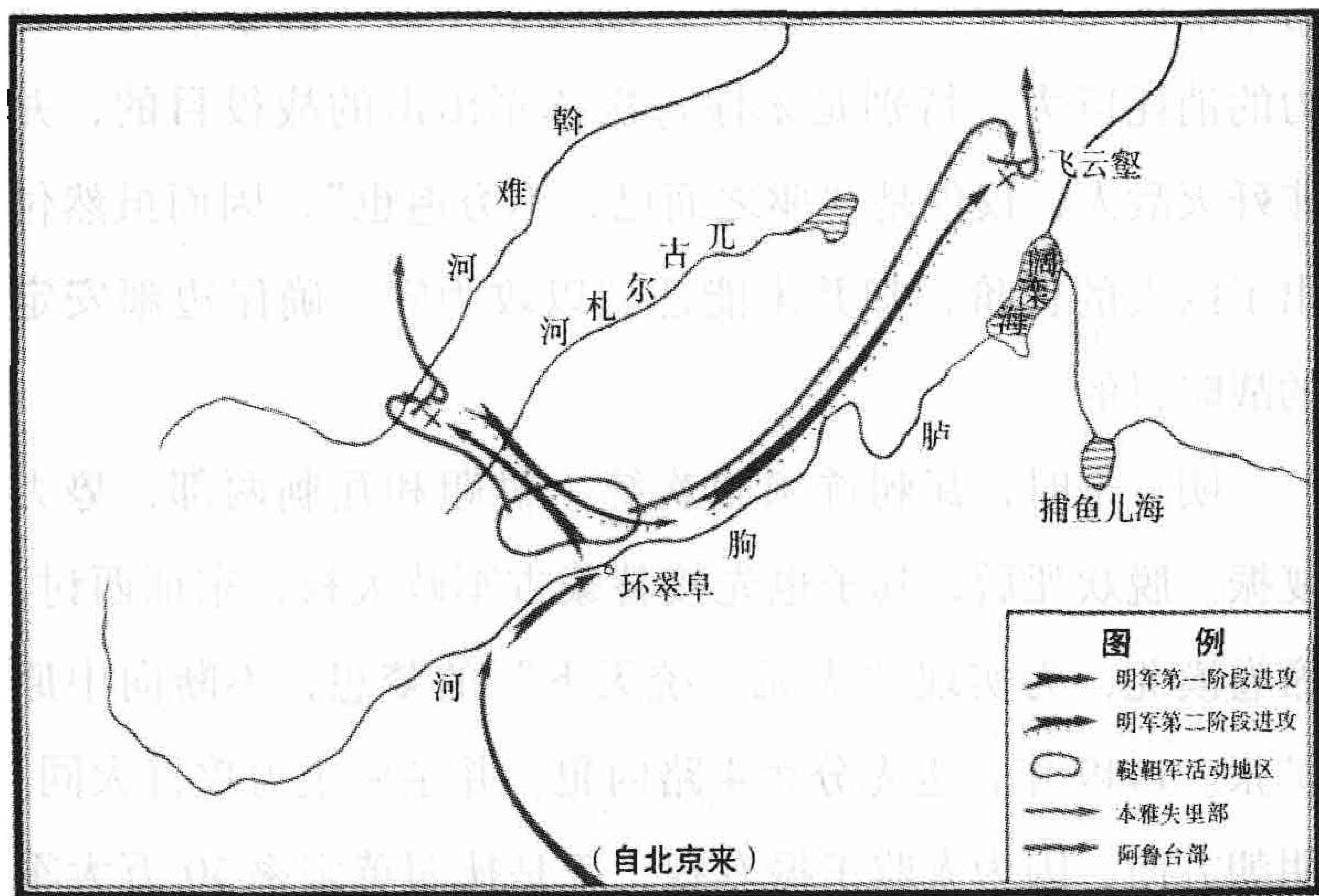
河（蒙古国鄂嫩河）、忽兰忽失温（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阔滦海（黑龙江满洲里东南）和屈裂儿河（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境）附近。

朱棣5次出击塞外，其目的在追求战略主动，打击鞑靼和瓦剌的气焰，保障边防安全，其在战略运用上有以下特点：重视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并用，且每次出击，只限于打击一个目标，军力集中，收效显著；远程出击而不冒进，取得一定战果后即及时回军；每次都倾全国之力，战前计划周密。经过5次大规模的用兵，虽未能完全解除蒙古贵族势力对边境的威胁，但有效遏制了蒙古贵族势力的袭扰，这就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朱棣5次出击的巨大成就。当然，明朝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皇帝御驾亲征，动用的兵力动辄数十万，国家人力、物力的消耗巨大。特别是朱棣每次挥军出击的战役目的，并非歼灭敌人，仅仅是“驱之而已，不穷追也”，因而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并未能达到以攻为守、确保边疆安定的战略目的。

明宣宗时，瓦剌首领脱欢统一鞑靼和瓦剌两部，势力复振。脱欢死后，其子也先接替蒙古军政大权，东征西讨，席卷漠北，为实现“大元一统天下”的梦想，不断向中原扩张。1449年，也先分兵4路内犯，并亲率主力攻打大同。明朝方面，因为太监王振专权，于是挟明英宗率50万大军仓猝亲征，结果被围困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涞县境），士兵死伤过半，明军中最具战斗力的“三大营”也丧失殆尽，

明英宗则被也先俘掳，史称“土木之变”。败讯传至北京，举国震惊，百官张惶失措。危难之际，大臣于谦挺身而出，率文武大臣拥立明景宗，组织抗战，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也先无隙可乘，又捞不到什么好处，遂放回明英宗，与明朝议和。但明英宗回来后，却与宦官曹吉祥等相勾结，趁明景宗病重而复辟，并杀害了于谦。

明神宗即位后，张居正以师傅之尊力行改革，决心对明朝边防加以整顿。他起用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北方防务，又重用名将李成梁镇守辽东，明军战斗力大增。蒙古俺答可汗看到明朝实力雄厚，不得不收敛南侵野心，表示归附朝廷。从此以后，蒙汉双方和睦相处，北方边患终于得以解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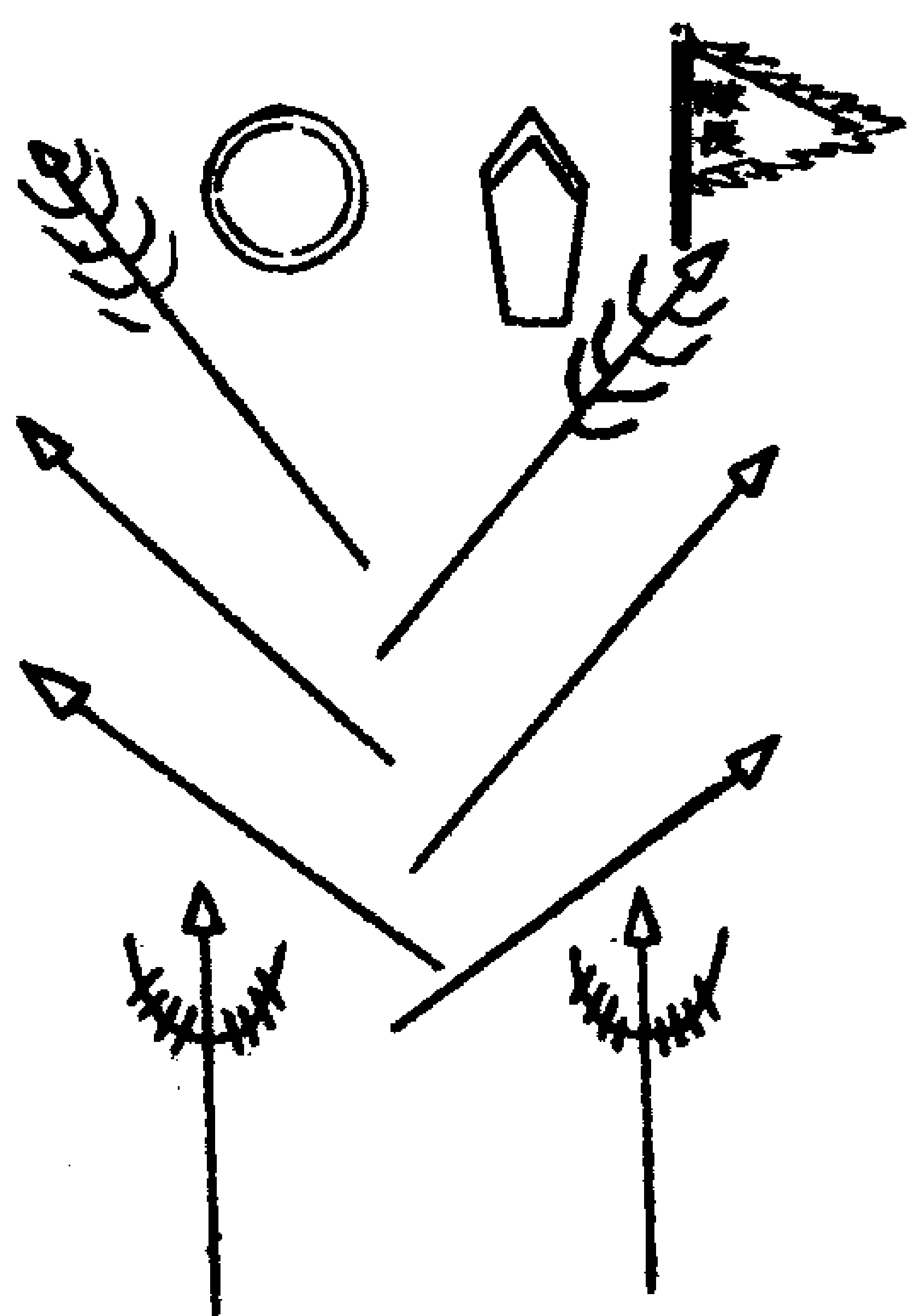
明成祖远征漠北示意图

三　戚帅平倭

16 世纪上半期，中国第一次受到大陆以外势力的威胁，倭寇的骚扰严重冲击着中国东南沿海的海防。

倭寇为害中国，可追溯至明初。不过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未至酿成大患。到了 15 世纪后期，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岛内的混战使一些武士沦为海寇。同时，一些商人也因无法与明朝开展贸易而武装走私，这两类人遂成为中国内地沿海的海盗。因为他们都来自日本，而中国古代称日本为“倭奴国”，所以当时人就称之为倭寇。16 世纪初，明朝政治黑暗，国防松弛，倭寇重又猖獗，千里海疆，不得一日安宁。

1555 年，明政府将戚继光从山东调往浙江抗倭前线，镇守倭害最严重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戚继光是明代最杰出的军事家，他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自勉，决心为国立功。为了消灭倭寇，戚继光特地到浙江义乌征兵，挑选了 3 000 名“乡野老实之人”，建立起一支新军，成为后来“戚家军”的前身。召兵之后，戚继光首先对新兵进行严格训练，使之勇敢善战、纪律严明。戚继光还根据江南多水泽、道路曲折的地形特点，创新性地设计了新的阵法——“鸳鸯阵”，用以对付善于设伏、擅长短兵相接的倭寇。因为新的阵法便于发挥每个战斗集体中各个成员



戚继光鸳鸯阵

和各种兵器的长处，使其互相配合、灵活机动，所以这支新兵刚刚训练了3个月便在抗倭战争中立下功劳。1561年，倭寇数千人入犯台州，戚继光率领他的新军以寡敌众，取得了台州大捷，消灭倭寇5 000余人，使进犯台州之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台州大捷后，戚继光扩充了部队，并率军驰骋于浙东御倭前线，所向披靡，百战百胜，终于扫清了浙东的倭寇，其军队也博得了“戚家军”的称号。

倭寇因在浙江占不到便宜，于是纷纷南下骚扰福建，福建局势顿时紧张。1562年，朝廷派戚继光前往福建剿灭倭寇。“戚家军”到达福建后，立即进攻盘踞在宁德县东北横屿岛上的倭寇，全歼岛上的倭贼，拔掉了倭寇在福建的第一个巢穴。横屿之战后，戚继光又率军直捣倭寇在福建的最大巢穴——牛田，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倭寇的另一大巢穴——林墩。在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戚家军”攻克大小倭巢十余个，威震福建，倭寇视戚继光为“戚老虎”，对戚家军更是闻风丧胆。到了1564年，戚家军已全歼福建境内的倭寇。第二年，戚继光又挥师南下广东，与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通力合作，荡平了广东境内倭寇。

至此，东南沿海重获安宁。

四　闯王进京

明朝末年，政治黑暗，土地兼并加剧，恰又遇上连年的天灾，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明朝政府为筹集辽东作战以及镇压农民起义的巨额军费，采取各种残暴手段，加紧压榨、剥削人民，官逼民反的农民大起义首先在陕西爆发了。

1630年，放牛娃出身的李自成投身到农民的反抗斗争中，成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著名“闯将”，起义队伍迅速扩大。虽然明朝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暂时平息了起义，但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结果已被朝廷招抚的义军纷纷再起。为扑灭各地的反抗，明政府任命洪承畴为山西、河南、陕西、湖广、四川五省总督，洪承畴改用“以剿兼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义军，企图将农民军围歼于河南。面对明军的围剿，起义军于1635年正月在河南荥阳举行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各路英雄在会上接受了李自成“分兵定所向”的战略方针。会后，起义军组成五路大军，分头出击明军，实施带有游击战性质的流动作战。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率部攻破明军的东路防线，直取凤阳，焚毁明朝皇帝的祖坟，粉碎了明军的围剿，给明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不

久，高迎祥在战斗中牺牲，李自成被公推为“闯王”，成为起义军的领袖。此后，明朝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围剿农民军的主要战场，并以山西、山东、江西等六个省区为辅助战场，所谓“四正六隅十面网”，企图一举消灭农民军。在明军的围剿下，起义军损失惨重，起义陷入低潮。张献忠为保存实力接受“招抚”，李自成在失败后也隐伏于陕西商（商县）、洛（洛南）山中。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辽东的清军两路入边，京师戒严，洪承畴、孙传庭率军北上保卫京城，这就减轻了对西北地区起义军的压力。趁此机会，张献忠、罗汝才、张天琳等先后再举义旗，攻破房县、保康，在罗猴山痛歼左良玉军。明神宗朱由检震怒，赐死明军统帅熊文灿，改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军进剿。在官军的大举进攻下，罗汝才、张献忠先后兵败玛瑙山及夔州，被迫转进四川。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帅杨嗣昌率主力入川追击罗汝才、张献忠之机，东山再起，挥师东进，进入河南。当时河南正闹灾荒，饥民纷纷加入农民军，李自成的队伍很快扩大到数十万之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牛金星、李岩等，也参加到李自成的队伍。在这些谋士的帮助下，李自成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苛重的现实，及时打出了“均田免粮”的旗号，一时从者云集，起义军由弱到强，不久便攻破河南重镇洛阳，杀死崇祯帝的叔父朱常洵。

此前，起义军一直采取各部时分时合，忽东忽西，寻找空隙及薄弱点进行袭击的流动战术。至此，经过 13 年的

游击流动作战，已经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并在多次反复起伏的战争实践中，开始实施运动作战，向明军战略要点进行机动进攻。尤其是李自成的起义军，成功地遂行了席卷河南的项城之战、襄城之战、朱仙镇之战、柿园之战、汝宁之战五次大的战役，几乎全歼河南境内的明军，并为进军湖广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汝宁之战消灭明军杨文岳以后，农民军即转锋向襄阳进军。左良玉闻风丧胆，经武昌逃向九江，李自成率农民军在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襄阳，并在此建立了农民政权。接着，李自成乘胜分兵四路，攻克了河南全省及湖广部分地区，从而达到了“据中原”的战略目的。

中原之战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军事形势也已经强弱易势。李自成于是决定实行西入关中再进军北京的战略方针。1643 年农历九月，李自成指挥起义军发起郏县战役，采取佯退诱敌，疲而歼之的作战指导，全歼明军主力孙传庭部 4 万多人。此战的胜利，扫除了西进关中的障碍，也为胜利地夺取北京，推翻明朝反动统治奠定了基础。1644 年正月，李自成在攻克潼关后进入关中，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二月，李自成指挥大军东渡黄河，出兵山西，兵分两路向北京挺进：南路军出太行经正定、保定北上，北路军由李自成亲自率领经大同南下。次月中旬，起义军主力攻破北京门户居庸关，于十七日兵临北京城下。崇祯皇帝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自缢于万寿山（今北京景山）。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市民的夹道欢

呼中，由德胜门进入京城，明朝正式灭亡。

明末农民起义军在推翻明朝的作战中表现出如下特点：在作战方向上，在同一时期内只选择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在作战目标的选择上，常常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或集中兵力打击危害最大之敌；在作战时机的选择上，善于隐蔽主力，捕捉和创造战机，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在兵力使用上，始终注意集中兵力；在进攻方法上，往往趁敌立足未稳或处于运动之中时，采用伏击或急袭的方法予敌歼灭性打击。这些充分显示了农民军高超的作战指挥。

五　萨尔浒之战和山海关之战

满族是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一个古老民族，也就是辽、宋时期的女真。

明太祖和明成祖时，中央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曾设立“建州三卫”予以统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奴尔干都指挥司。但随着明朝的衰弱，到了15~16世纪，女真逐渐强大，其领袖努尔哈赤于1616年（明万历十四年）建立政权，国号大金。第二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乘明朝不备，攻取抚顺等东北要地。

东北边疆的危机使明朝朝野为之震惊。明神宗朱翊钧立即任命杨镐为兵部侍郎经略辽东，下令从全国各地调集兵马，并调朝鲜李氏王朝和女真叶赫部出兵增援，准备大

举进攻赫图阿拉，企图一举消灭后金。

次年，各路明军云集辽东，当时明军总兵力，包括朝鲜李、女真叶赫部共约10万人，号称40万。杨镐的作战方针是：兵分四路，以赫图阿拉为进攻目标，分进合击，约期会师，企图一举围歼努尔哈赤。但是明军的攻击行动在实施之前已经泄露。努尔哈赤在得到明军作战部署的情报后，认为明军西路军威胁最大，其他三路则可能因山路险远难与西路军协同。于是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略，决定利用要隘和谷地，集中八旗精锐6万人先破西路军，尔后逐一歼灭其他三路明军。3月，努尔哈赤率军急驰至铁背山（萨尔浒东），发现杜松兵力分散，遂抓住战机，以二旗兵力增援凡城以抗击杜松的攻城部队，集中六旗兵力进攻萨尔浒，全歼杜松的西路军。接着，努尔哈赤挥军乘马林立足未稳，仍用各个击破的战法，将明北路军全部歼灭。之后，努尔哈赤又以一部兵力阻击李如柏军，而以主力在赫图阿拉以南伏击刘綎的东路军，刘綎军被诱至阿布达里岗一带的预定设伏地区，进入后金军的伏击圈被全歼。

坐镇沈阳的明军主帅杨镐本来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但他对四路明军，均未能作任何策应。及至三路丧师后，他才慌忙下令南路的李如柏军撤兵。李如柏在回师途中，受到小股的后金军骚扰，部队大乱，自相践踏，死伤千余人，不过总算是逃脱了被后金军聚歼的悲惨命运。至此，努尔哈赤在5天之内，干净利索地结束了战斗。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在东北争夺战略主动权的一次决定性战役。明军在数量、武器（尤其是火器）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四路分进合击，却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三路被全歼，仅一路部分逃回。战后，后金政权更趋巩固，并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为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明军遭此惨败，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被迫采取守势。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继位，改国号为大清，又改女真为满洲，决心夺取全国政权。他先征服朝鲜，解除后顾之忧，并出兵征服蒙古，从而取得了西起河套东到辽东的广大地区，完成了对明朝的战略包围。1640年，清军进攻关外重镇锦州，欲打通进入北京的通道。为保卫锦州，明将洪承畴率军13万步步为营进行出击，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崇祯皇帝却强令洪承畴速战速决，洪承畴只得将粮草屯于宁远附近，亲率大军前往松山与清军决战。皇太极则火烧明军粮草，又派兵阻挡洪承畴的援军，然后将洪承畴围于松山城，迫使洪承畴降清。洪承畴降清后，成为清军入关的引路先锋。至此，明朝在东北只剩下宁远和山海关两座孤城。直到1642年，清军因皇太极暴病而亡才暂缓了对明的进攻。

而此时中原形势则发生了重大变化。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下了北京，明王朝寿终正寝。大顺军入京后，一直未坚定定都北京的打算，而是陶醉于胜利之中，仅仅大规模地掠降追赃，准备仍回西安建都。其主要领袖李自成、刘宗敏对关外的清军也缺乏足够的警惕。当时，明朝

宁远总兵吴三桂在明亡后率所部 4 万人驻守山海关，对降清还是降大顺游移不决，而李自成仅派了个明朝降将唐通率所部 8 000 人前去招降。吴三桂本来已答应将山海关移交农民军，但在进京途中听说老父被农民军逮捕，又听说自己的爱妾陈圆圆为刘宗敏霸占，随即“冲冠一怒为红颜”，转而向关外的清军投降。接到吴三桂“乞师”的请求，清摄政王多尔衮喜出望外，立即回书答应，并封吴三桂为“藩王”，亲自率清军日夜兼程赶往山海关。

李自成听到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在其他大将不愿出征的情况下，只得亲率大军赶往山海关，进行再次招降，结果没有成功。正当起义军与吴三桂大战疲惫之际，多尔衮的清军突然突入战场，大败农民军。李自成仓促败归北京，第二天便撤出北京。而清军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率领下，由吴三桂引导，对大顺军紧追不舍。

李自成本拟撤回西安后，凭借黄河和潼关天险据守关中，重整旗鼓。但清军入关后，以摄政王多尔衮为代表的统治者，虚心采纳了汉人谋士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高明战略谋划，坚定了入主中原、混一天下的战略目标。一方面，清军以为汉人报君父之仇相号召，打出“义师”旗号，将自



袁崇焕雕像

己打扮成拯救中原百姓于水火的“义军”，从而把农民起义军作为主要敌人，以赢得汉族地主、百姓的拥护，缓和满汉地主间的敌意和民族矛盾。另一方面，清军为争取时间，迅速取道蓟州、密云而不走山海关，从而先声夺人，连续作战，使农民起义军没有喘息之机，防止起义军有计划、有准备地撤退。结果，清军主力分两路追击农民军，一路由山西进入榆林、延安，从陕北南下，一路从河南直取潼关。农民军两面受敌，抵挡不住清军的进攻。潼关失守后，李自成只好率军继续南撤，不幸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在39岁时英年早逝。此后，清军大举南下，消灭了南明等几个朱明小朝廷，并镇压了农民军的余部，建立起了对全国的统治。

六　平定三藩

清军入关之初，为了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大量拉拢和吸收明朝降将。其中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四人最受宠遇：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尚可喜被封为平南王，镇守广东。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几股割据势力，被称为“三藩”。

三藩占有大量的土地、人口，在辖区内各自为政，并拥有雄厚的武装。其势力的发展日益威胁到清廷的统治。

于是打击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削藩”工作被提上了日程。面对清廷的打击，吴三桂打出“复明”的幌子，首先发动叛乱。他派军攻陷了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又联络四川、广西、福建、广东的其他藩王一起造反。在很短的时间内，叛军便控制了滇、黔、桂、闽、湘、川、粤七省，并扩大到陕西、江西等地。

吴三桂等叛乱后，年轻的康熙皇帝立即调兵遣将进行平叛。战争开始时，清军进展并不顺利，因为叛军除在正面的湖南战场阻挡清军外，还在江西和陕西对清军造成威胁。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康熙帝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分别派军攻下江西和陕西，剪除了叛军的两翼，然后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速战速决消灭割据势力。不久，清军夺取了入湘的咽喉岳州，然后平叛大军水陆并进，全歼了湖南之敌。接着清军又凭借数量优势，数路出击，基本平定了四川和贵州。最后清军从贵州、湖广、广西、四川四个方向对云南形成合击，于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攻入昆明。历时 8 年之久的“三藩之乱”至此被彻底平定。

七　康熙帝统一台湾

平定“三藩之乱”战争的胜利，使康熙帝得以将目光转向台湾，专力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元朝，中央政府就已

经在此地区设置地方行政机构加以管辖。但 16 世纪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开始侵入中国的东南沿海。17 世纪初，荷兰殖民者更悍然在台湾筑城，旋被明朝政府派军驱逐出岛。明末清初之际，荷兰殖民者又乘中国内战之机攻占了台湾。当时清军正集中力量消灭南明的永历政权，具有民族大义的郑成功在其父降清后，继续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并在厦门、金门一带从事反清斗争。为收复中国的故有领土，作为抗清的根本，郑成功决心驱逐荷兰侵略者。而台湾人民为摆脱荷兰的殖民压迫，也寄希望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1661 年二月，郑成功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收复台湾问题。会上，郑成功力排众议，决定不顾荷兰殖民者“炮台厉害，水路险恶”，立即进军台湾。该年四月，郑成功亲率大军 2.5 万人，大小战船数百艘，由金门出发直抵澎湖，利用涨潮时间落差和大雾的掩护，出其不意地突过了敌人认为无法逾越的鹿耳门航道，神兵天降，迅速在台湾登陆成功。荷兰殖民者“不胜惊骇”，急忙从海陆两方面组织反攻，并依赖优良的装备和城防的坚固企图阻止中国军队。郑成功则采取先弱后强、分割包围和各个击破的方针，打败了荷军的反击。此后，郑成功指挥军队对困守孤城的荷兰侵略者进行了 8 个月的围困。1662 年 2 月 1 日，荷兰侵略者终于在投降书上签字，被荷兰殖民者强占 38 年之久的台湾，重新回到中国怀抱。

郑成功逝世后，中国内地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清

朝不仅统一了内地，并攻占了金门、厦门等沿海各地，平定了“三藩之乱”。而台岛上郑氏后代内耗不已，并放弃了原来的政治目标。统一台湾的任务已提上了日程。

台湾问题是清朝统一全国过程中面临的新的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历次统一中从未遇到过的问题。历史上的统一战争，多是南北问题，最多遇到江河作战，而割据台湾的郑氏集团则与大陆横隔着台湾海峡，所以统一台湾在军事上有着更大的难度。

清廷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逐渐坚定了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做到了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筹划统一台湾问题。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如何消灭在台湾的郑氏割据势力，统一台湾，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即使在康熙皇帝做出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后，一部分清廷官员仍认为台湾“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所以，武力统一台湾的主张在朝廷上层官员中并不占主流，而前线将领中也不乏持异议者，如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是康熙素所倚重的名将，但他也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

在文武大臣中，施琅是武力统一的坚定支持者，他不仅是一个带兵的能将，而且是一位善于谋划的战略家。经过多年的对台斗争实践，他总结了经验教训，潜心谋划，深思熟虑，终于形成了“因剿寓抚”战略指导方针。这一方针重点是“剿”，即以军事进攻为主，以政治招抚为辅，军事进攻配合政治招抚，最终实现军事斗争的政治目的。康熙二十年，郑经病死，郑氏集团发生内讧，康熙帝认识

到武力统一台湾时机业已成熟，遂当机立断，下诏："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六）这一诏令表明最高决策者肯定了施琅提出的战略方针。康熙帝作出这一历史性决策后，立即作了相应部署，任命享有声望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具体负责军事进攻事宜。

施琅在两次出兵不利的情况下，仔细研究了郑氏在海上的兵力部署情况，确定了"先取澎湖以扼其亢"的作战方针。其作战部署是：先以水、陆军攻占澎湖，消灭郑军的有生力量，造成大兵压境的有利态势，使台湾门户洞开，贸易受阻，直接威胁割据势力的生存；占领澎湖后，引而不发，在做好进攻本岛准备的同时，大力开展招抚工作，派使者赴台与郑氏集团和谈，晓以大义，劝其向中央投诚，实现和平统一；若郑氏集团仍执迷不悟，负隅顽抗，导致和谈失败，则实施剿抚战略的最后一着：派清军主力直抵台湾政治中心承天府（今台南市），实施正面牵制，另派两支精锐海军，封锁台湾南北两大港口，控制其进出水道，使其首尾不能照应，进行围困，同时继续进行招降，促其内变和不战自溃。如果仍达不到目的，则最后实施登陆作战，扫清外围，然后围困岛上的重要城市，最终消灭郑氏集团。

1683 年，施琅率战舰 300 艘，精锐水师 2 万，由福建铜山乘南风顺海潮直取澎湖，经过 7 天的海上激战，夺取了

澎湖。台岛上下为之震惊，军心大乱，郑克塽投降，清军进驻台湾。统一台湾后，在善后事宜的处理上，清廷又接受施琅的主张，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将台湾重新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

康熙帝统一台湾，使清政府最终实现了完整意义上的统一，从政治上加强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隶属关系，这对台湾的安全是最大的保障。因为在当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加速武装海上贸易和海外扩张之际，台湾孤悬大海之中，如果没有祖国大陆的有力支持，将会重演此前沦入荷兰殖民者之手一样的命运。同时，清朝统一台湾后，在台湾、澎湖部署防御力量，使台湾与大陆形成一个整体，大大巩固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防，一直到鸦片战争前的150来年时间里，西方殖民主义者始终未能对我国东南沿海形成大的威胁。而对清朝中央政府来说，东南海疆的安全有了保障，方可以全力对付来自陆疆的各种入侵和威胁。

八　雅克萨反击战

东北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至少从唐朝以后，中国政府就已经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行政管理机构，同时又是建立清朝的满族的发祥地。

但明清交替之际，由于清军主力入关，东北边境一度

空虚，其时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已抵达东西伯利亚，并开始进一步觊觎我国的东北边疆，把矛头指向黑龙江流域。

1643年，沙皇俄国驻雅库次克的长官戈洛文派出了以瓦西里·波雅可夫为首的远征团再次侵入我国黑龙江，遭到当地人民的沉重打击。波雅科夫侥幸逃回雅库次克后，野心不死，又竭力怂恿沙皇政府派兵侵占黑龙江流域。1649年，沙皇俄国又派出了以哈巴罗夫为首的武装力量第二次入侵黑龙江，攻占了雅克萨城作为进一步入侵的据点，并到处烧杀掠夺。1653年，斯捷潘诺夫又接替哈巴罗夫，率军入侵黑龙江流域。

为驱逐侵略者，清政府派兵讨伐斯捷潘诺夫，并在松花江和牡丹江会流处将侵略军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打死和活捉了270多个入侵者，斯捷潘诺夫也被当场击毙。另外一些侵略军因慑于清军的声威，缴械投降。第二年，清军收复雅克萨，拆除了侵略者修筑的据点，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军。

但沙俄政府并未接受教训放弃侵略扩张政策。在斯捷潘诺夫覆灭的当年，俄国侵略者又出兵分别占领了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和下游的雅克萨，并不断用武力扩大侵略范围。1681年，国内平定“三藩之乱”的事业已取得了胜利，在多次外交交涉不成的情况下，康熙帝毅然决定集中精力反击入侵者。他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坐镇瑷珲负责指挥收复雅克萨的军事行动。清军首先搞清了俄军在雅克萨的兵力布置情况，攻下了雅克萨的外围据点，对雅克萨

形成包围，并敦促侵略者退出中国领土。但侵略者拒绝撤军，并一再增派援军，加筑工事，企图负隅顽抗。在这种情况下，清军只好水陆两路强行攻城。战斗中，清军的神威将军大炮发挥了巨大威力，打得城内俄军死伤累累，侵略者头目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向清军投降。清军在宣布严正立场后，给予俄军以极为宽大的处理，准许他们携带财物和武器离开，俄军表示不再到雅克萨骚扰。

但清军撤回之后，俄方却趁清军防备疏忽，又集结军队侵占了雅克萨，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了清政府的愤慨，康熙帝立即部署军队，再次进讨。

1686 年 5 月，清军在萨布素的率领下分水陆两路从瑷珲出发，直逼雅克萨城下。萨布素致书托尔布津，责其不守信义，并要求其立即撤回本土。托尔布津不仅不听劝告，反而袭击清军。为打击侵略者，清军奋起反击，经过几个月的激烈战斗，重创沙俄侵略者。托尔布津被清军的炮火击伤后死去，雅克萨指日可下。在清军的打击下，沙俄政府不得不出面与清朝交涉，同意清政府和平解决中俄边界的建议。为表示中国对和平的诚意，清军主动解除对雅克萨的围困。1689 年，中俄双方在尼布楚进行了谈判，在中国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对双方的边界作了划分。《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意义上明确了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属于中国的领土，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国防向近代国防的转型。直到 100 多年后，俄国才强行撕毁了

这一条约。

九　卫所、八旗与绿营

明清两代在兵制方面经历了明代的卫所制到清朝前期的八旗和绿营兵制的变化。

（一）明朝的卫所兵制

如何有效地控制军权并保证军队战斗力，是朱元璋建立政权后最关心的问题。为此，他曾和谋臣刘基多次商讨，并研究历代兵制及各种措施。

朱元璋是因为投身农民军，然后逐步掌握军权并依靠军事力量夺取天下的，所以他对军队和军权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统一全国后，朱元璋在调整中央各部门职权时，念念不忘对军权的控制。最初，除了中央政府的六部中专门设立兵部之外，朱元璋又设立大都督府，以控制中外诸军，并由自己的侄子亲任大都督。后来，感到这样还不能放心，就于1380年下令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设立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分领京城及各地卫所。兵部的最高官员为尚书，副长官为左右侍郎，五军都督府的最高官员则为左右都督。在兵部与五大都督府并立的军事体制下，兵部掌管各级军官的考选任命、兵员编制、兵器生产等军政事务，都督府则主管部队训练和奉命出征之事。

二者均不能直接统率军队。军队的调遣和最高指挥权归皇帝一人掌握。打仗时，兵部奉皇帝旨意下令调兵，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发给印信，然后统帅方可率领从各卫所调集的军队出征。战争结束，领兵统帅要向朝廷交还印信，士兵回到原来所属的卫所。这样，兵部有调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督府有统兵之权而无调兵之令，这就保证了统军权与调军权的分离，可以防止大将专权作乱，保证皇帝与朝廷（中央）对全国军队的控制。

在兵役制度方面，朱元璋认为，历代所实行的兵制无外征兵制和募兵制两种，但它们各有优劣。征兵制的好处是遇有战事才征集兵员，战争结束后士兵即可回到农村务农，且兵员出自农民，朴实可靠；缺点则是不能适应长期战争的需要，且临时征集，士兵本质上仍是农民，缺乏严格训练，战斗力不强。募兵制的好处是士兵以当兵为职业，战斗力强，兵农分离，不影响农业生产，但庞大的军费对国家财政是一个沉重负担。朱元璋认为这二种兵制都不好，于是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一种新兵制——卫所制。

按照卫所制，明朝自京师至各府县，皆立卫所，一州设所，数州设卫。卫所兵员一是来源于早年跟随朱元璋起义的部队和招收的地主武装，二是元朝降军和其他农民军，三是军民犯罪以后充军，四是从老百姓中按人口比例征集。军人一旦被列入军籍，即为军户，子孙要世世代代当兵。卫是基层军事组织，每卫辖 5 600 人，下设 5 个千户所，每千户所辖士兵 1 120 人，千户所下设 10 个百户所，一直到

一小旗辖10名士兵。全国士兵都按此制度被编制在各个卫所之中，每个卫所官兵又分别隶属于所在地方的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都指挥使司从性质上属于中央派驻地方的军事机构，直接隶属于中央五军都督府（中、左、右、前、后），其长官称指挥使，为地方统兵长官。按照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规定，全国共设都司17个、行都司3个、留守司1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兵额最多时达270余万人。

从类别上说，明军分为京军（亦称京营）、地方军、边兵三大部分。京军为全国军队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洪武初年，京军有48卫。明成祖时，因京师接近前线，扩大为72卫，并增设著名的“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为保卫京师的主力部队，号称“京军三大营”。其中，五军营专习阵法，三千营负责巡逻，神机营为火器部队，战时护驾随征。此外，尚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12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腾骧等四卫营。地方军为各地的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边兵则是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于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九个军镇，称“九边”，各设总兵官管辖。另外还有民兵，为军籍之外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由官府征调，名称有民壮、义勇、弓兵、机兵、快手、土兵（限于西北边地）等，西南少数族地区则有苗兵、狼兵等土司兵。此外，还有不同行业和阶层组建的矿兵、盐兵、

僧兵（少林兵、五台兵）等，遇有战争，也常被召出征，战争结束仍回原址。

卫所兵源来自世兵制，卫所军士和武官均为世袭，一入军籍，称为军户，属都督府管辖，不受地方行政长官的约束，父死子继，世代从军。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常常与罪犯为伍，素质低下，逃亡不断。因而，明中期以后又实行募兵制，招募的士兵逐渐成为军队主力，但募兵制养兵耗费巨大，国库日蹙，终致国力耗竭。

（二）清朝的八旗、绿营与勇营

“旗”本为满族“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兼具军事、政治、生产三个方面的职能。努尔哈赤在逐步统一满洲过程中，以满族这一原有的社会组织为基础组建军队，将其军队分为“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能射军”4个部分，不久又用黄、白、红、蓝四种颜色的军旗作为识别的标志，形成最初的四旗。后来，随着地盘的扩大、兵员的增加，又将原有的四旗扩编为八旗，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

八旗制度的主要特点在于兵民合一、耕战结合，所谓“出则备战，入则为农，兼以收拾兵器”，这是由当时满人少，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八旗各有旗主，皆为世袭。凡旗人成年男丁皆可为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太祖努尔哈赤初定旗兵编制，每300人为1牛录，领兵官称牛录额真；5牛录为1甲喇，领兵官称甲喇额真；5甲喇为

1固山，领兵官称固山额真；共领7 500人，构成1旗。以后牛录数量增加，旗数未变。清太宗皇太极时又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至此共有24旗。清军入关以后，清廷虽仍沿用以旗统兵的制度，但八旗兵逐渐失去生产职能，不再从事生产，成为国家的常备兵。并根据其职能分为京营八旗（由正黄、正白、镶黄三旗担任）和驻防八旗两种，各10余万人。京营八旗亦称禁旅八旗，性质上为首都禁卫军，分为郎卫和兵卫，郎卫负责侍卫皇帝和宫廷，归领侍卫内大臣统辖，卫兵负责拱卫京师，主力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神机营等。驻防八旗由镶白、正红、正蓝、镶蓝、镶红等所谓下五旗组成，分驻全国冲要城镇，以畿辅、东北、内蒙古为最多，作为震慑地方的武力，分由各地将军、都统、城守尉统率。

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时，主力部队不过满洲八旗6万人，即使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全部军队最高额亦不足15万。面对广阔的国土和人口众多的汉人，为解决八旗兵力严重不足的矛盾，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收编明朝降附官兵和新募汉兵组建地方警卫武装，称为“绿营”，以维持各省治安，从而“以汉治汉”。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66万人，清中叶以后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地较少。绿营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基础建制单位，有骑兵、步兵、守兵之分。从兵役制度上讲，绿营属募兵制，招募的对象主要是社会

上的游民和失业工农。其将官由兵部选任，每省均有绿营数镇，主将称总兵，总兵之上设有提督，节制一省或数省各镇总兵，巡抚、总督又有统率提督之权力。

八旗兵和绿营兵都是国家的“经制兵”，即正规军。不过，因为八旗是清军的主力，曾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故而清政府采取了优待满洲八旗的政策，不但粮饷、装备优于绿营，而且拱卫京师和驻守战略要地的重要任务也由八旗执行。同时，清政府对绿营还严加防范。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

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八旗兵养尊处优，渐趋腐败，素质急剧降低，自康熙平“三藩之乱”开始，八旗对绿营的依赖日益严重，其作战主力的地位也逐渐为绿营所取代，清末的内战、外战也就全靠绿营了。但绿营兵平时分散驻扎各地，兵力单薄不能集中，主要任务只是维持当地治安，所以缺乏训练和监督，形同散兵游勇。一旦遇有战事，要将这些分散的小部队集中起来，非常不易，在实际操作中，全部集中更是完全不可能实现。这样临时拼凑而成的军队，兵与兵之间，兵与将之间互不相习，战斗力也很低。到了鸦片战争时，绿营兵与八旗兵一样也已腐败，不堪征战，更敌不过组织严密、制度健全的太平军。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打击，绿营已形同虚设。为了与太平军相抗衡，清廷谕令各省举办团练“助剿”，于是曾国藩在湖南招募团丁

为官勇，称湘勇或湘军，接着又有仿湘军制度建立的淮军和各省勇营。

十　明清时期火器技术的辉煌与衰落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也是最早使用火器于战争的国家。早在10世纪末叶的北宋时期，人们就将火药用于战争，创制了蒺藜火球、霹雳火球和火药弹（用火药做成了炮弹，再用抛石机把火药弹扔出去），于是北宋军队也成为世界军事史上最早使用火药武器的军队。南宋时，出现了竹筒火器即突火枪，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的管制火器。到了元代，更在前代的基础上创制了火铳，标志着中国最早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元末明初，朱元璋军队里已经大量生产和装备各种火铳，其中大口径的火铳就是后来的炮的前身，而小口径的就是后来的枪的前身。而且当时的火铳，在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

到了明代，中国的军事技术在某些领域虽仍具有领先优势，但从世界范围看，从16世纪后期开始，中国和欧洲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上的反差，已开始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来，与此同时，西方科技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传统的科技文化受到挑战，并发生一些融合。

明政府在中央设有军器局、盔甲厂、火药局等进行兵器生产，尤其以火器的生产最为突出。在继承宋元时代燃

烧性、爆炸性和管型火器技术的基础上，明代各类火器都有新的发展，迎来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火器发展的高潮，其中管型火器的发展最为迅速。

在火铳方面，造铳技术大大提高，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比如，为了解决炮身易爆炸、发射速度慢、射程近、准确率低、杀伤力小等问题，人们进行了一些技术革新：在炮身上加上铁箍，以增其抗爆力，防止其爆炸；发明特制的炮车、炮架，将沉重的大炮装在上面，便于转移和四向射击。到15世纪，明朝人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爆炸弹，称为“毒火龙炮”。该型爆炸弹用铁制成，内装火药，射程200步，仅靠大量炮弹碎片就可以大量杀伤敌人。随着火铳技术的发展，制式化的轻型手铳和重型火铳也开始成为军队的主要装备，而且普遍装备于内地城堡和沿边关隘，大大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和防御能力。到了16世纪初的明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入侵中国广东沿海，将西方的佛郎机（Frankish）大炮和鸟铳传入中国，明朝地方官发现佛郎机（明人对葡萄牙、西班牙人的称呼）的大炮比自己的火铳厉害，便想方设法了解其工艺，中央军器局马上组织仿制和研制，在成功仿制的基础上，明朝科学家吸收佛郎机长处，并融合中国传统火器制造的优点进行技术创新，制造出远胜过佛郎机炮的新式火炮。这种大炮成为明军装备的主要火炮，并被配置于北方各边关要塞，大大改善了明朝的防御态势。

与仿制和改进佛郎机同时，明朝又下令仿造明军在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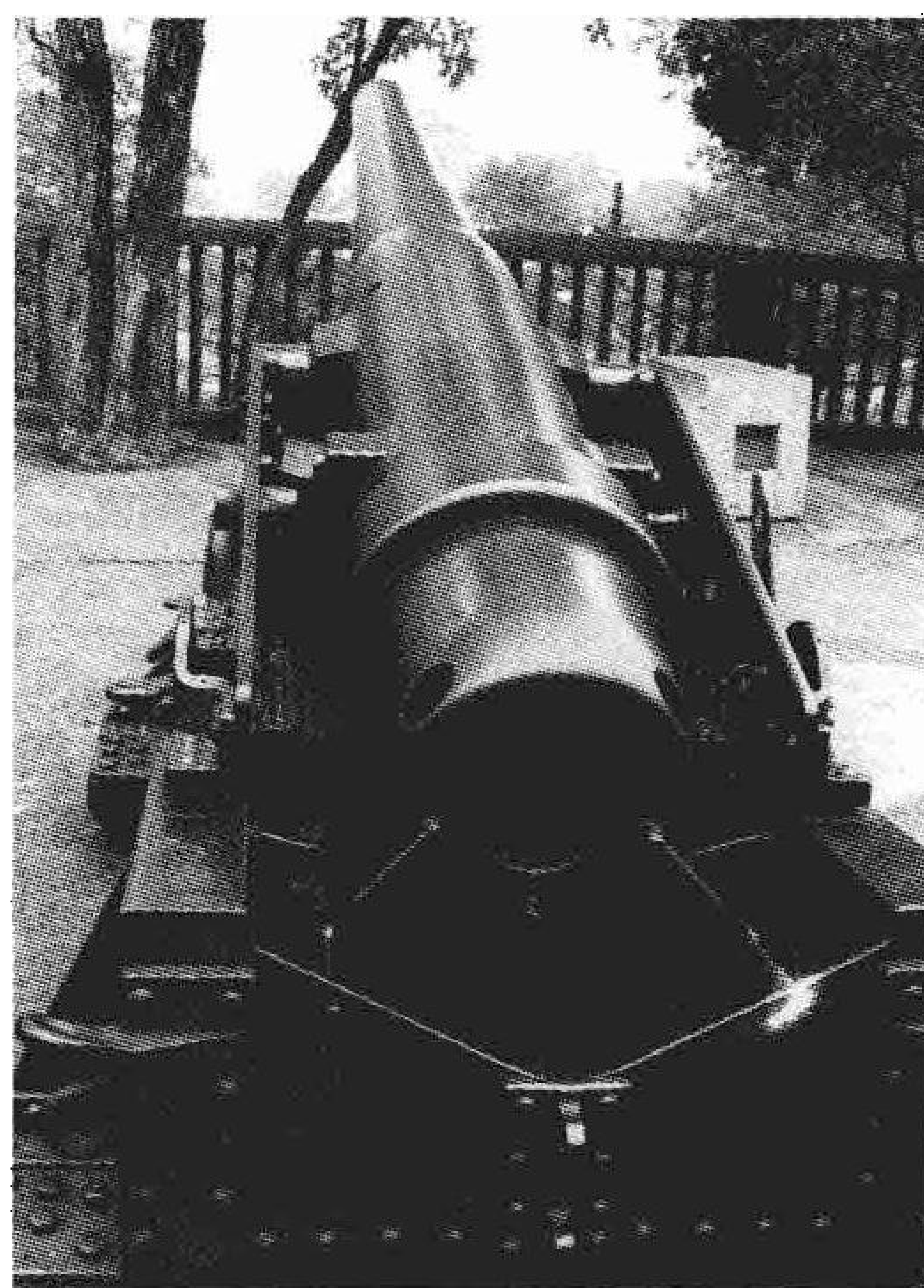
南沿海抗倭时缴获的鸟铳，鸟铳原为欧洲火绳枪，即利用火绳点火发射弹丸的单兵枪，因其能射天空中飞翔的鸟而得名，又因其所安装的弯型枪托形似鸟喙，也称为鸟咀铳、鸟枪。从性能讲，鸟铳属金属管形射击火器，有准星和照门，射击距离和精度都超过明人的火铳。明朝大量仿造时，又作了改进，性能更优越。这种新型的火枪，在16~19世纪中期长达300来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明、清军队主要的单兵装备。在大造火器的同时，明朝还特别注重战舰、战船的制造，其中以江船和海船为多，而且还在船舰上配备了火炮、火枪。大批舰船的制造，装备了强大的水师。靠着装备的优势，不仅维护了统治，而且在明代中后期有效抵御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者的侵扰。

到了明末，因为边防作战的需要，明朝又兴起了一股学习西方兵工技术的热潮，其标志就是“红夷大炮”的仿制。“红夷大炮”属欧洲近代的长管加农炮，明人最初是从活动于中国东南沿海的荷兰舰船上认识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的，由于明人称荷兰人为“红毛夷”，所以有此称。后来凡西洋引进的大炮，虽非荷兰所产，也沿用此称。当然，后来因清人忌讳“夷”字，改为“红衣炮”。这种炮装有照门和准星，具有身管长、弹道低平、射程远、命中率高、威力大、安全性高等特点。正因为“红夷大炮”较之佛郎机更为先进，所以明朝兴起一股仿造的热潮，并在对付关外清军的宁远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

以“红夷大炮”的引进和仿制为标志而出现的明末火

器发展的高潮，在清初得以延续。清军使用火器是在与明军作战中受到损失后才引起重视的。他们认识到火器重要，除俘获明军火炮外，也开始仿制西洋大炮，发展火器。清军入关后夺取政权，以及镇压农民军过程中，大量使用大炮。康熙帝专门聘请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研制各类火炮，支持火器专家戴梓研制28发连珠铳。在平定“三藩之乱”、平定蒙古准噶尔叛乱、抗击沙皇入侵、统一台湾过程中，大量大炮源源不断运抵前线，屡建奇功。清朝著名火炮有：神威大将军炮、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威远将军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是清军主力，重3 600~10 000斤，长9.75尺至12尺，口径3.8~4.9寸。神威将军炮属于轻型长管攻城炮，炮身前细后粗，有炮耳、准星，四轮车装载，弹道弯曲，可用不同装药量来决定射程，并可仰攻城塞、山头。

清朝入主中原后，因在近200年的边疆战争和平叛战争中都在火器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几乎没有遇到对手，加之康熙、乾隆之后长期没有敌国外患，于是逐渐丧失了对火器引进、研发的兴趣，而满足于现有的火炮鸟枪和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自诩“以武功开国”，反复强调“骑射乃满洲之根本”，不愿组织研制新型火器，在改善军队装备和国防设施方面乏善可陈。



克虏伯装箍炮

之后由于对外封闭，更不了解西方世界新一轮的军事技术革命，于是鸦片战争时遭遇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时，中国军队装备的还是“红衣大炮”，武器的装备水平落后对手达一二百年，战争的胜负自然毫无悬念。

第九章

中国近代的军事变革

一　鸦片战争

鸦片又叫阿芙蓉，是一种毒品，人吸食之后很容易上瘾。然而，导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筹议海防折》）的竟然就是这种毒品。

近代以前的中国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在中国没有什么销路，因此，中国对外贸易一直都是顺差，英国人只能拿白花花的银子来同中国做交易。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西方列强无耻地用鸦片来叩击中国的大门。大量鸦片输入中国，中国白银哗哗地往外流。毒品贸易的泛滥，导致中国几乎大大小小的港口都以英商为主，且弥漫着烟毒。难怪林则徐大声疾呼：“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害怕危及统治，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达广州，将缴出的烟土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正在寻找借口的英国政府立即作出了向中国出兵的决定。1840 年，英国政府以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率 46 艘军舰、4 000 多名士兵陆续到达澳门附近海面。因为进攻防守严密的广州和厦门没有得逞，英军转而北上攻占定海。在这里建立补给站后，又经山东半岛，直抵大沽口外海面。道光皇帝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派琦善到天津海口同英军谈

判，英军同意南返。道光认为琦善劝退英军，是天下奇才，于是把林则徐撤职发配新疆充军，任命琦善当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负责同英国谈判。琦善一到广州就毁弃林则徐的守卫措施，结果英军突然袭击，攻陷虎门附近的沙角、大角两炮台。琦善束手无策，只好满足英国提出的割让香港的无理要求。

清廷得到报告，觉得大失面子，宣布锁拿琦善，对英宣战，并派出御前大臣奕山主持广东战事。英军攻陷了虎门炮台，军舰直抵广州城下开炮轰击。奕山率大军到了广州以后，听到炮响，胆战心惊，赶紧乞求和谈，同英军签订《广州和约》，奕山率清军退出广州城，并交出赎城费白银600万两。

但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600万两白银的赔款，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增调援军，扩大侵华战争。璞鼎查率英舰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兵锋直指浙东重镇宁波。清廷派杨威将军奕经组织反攻失败后，对英军已是闻风丧胆，只好派盛京将军耆英和已革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到浙江向英军求和。英军不予理睬，又一口气攻占浙江海防重镇乍浦和上海的吴淞口，然后溯长江西上，攻陷镇江。

8月，英军抵江宁江面，一路求和的耆英、伊里布等人，匆匆赶到南京。8月29日，中英双方在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向英国赔款白银2 100万两，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天朝帝国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军舰、大炮打开。

从此，中国独立的主权遭到严重损害，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 英法联军攻进北京

《南京条约》使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很多利益。13 年后，英法等国又想借全面修改条约以扩大权益，在遭到清政府拒绝后，英国于1856 年制造了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并以此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次年，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聚会香港，决定由英法发动军事进攻，外交上四国公使共同行动。随即英法联军5 600 人对广州发动进攻，两广总督叶名琛不仅不积极备战，反而裁撤兵勇，还反对当地群众自发组织的抵抗。结果，在联军炮舰的轰击下，广州失陷，叶名琛也被俘虏后押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占领广州后，四国公使又率军舰北上。英法积极备战，美俄佯装调解，引诱清政府上钩。清政府既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又指望美、俄的调停，更无同侵略军作战的决心。聚集在大沽口的外国军舰达 30 艘（内有美、俄船只 4 艘），向大沽炮台进攻。守台士兵英勇反击，但是守将却偷偷地溜走了，炮台随之失守。联军到达天津，扬言还要进攻北京，统治者感到“战守两难”，只好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

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议和。

5月中旬，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订，美俄两国则在此之前就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了公使进京、增开商埠以及赔款等条款。英法联军退出天津，准备来年进京换约。此外俄国还趁火打劫，于4月中旬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859年，新任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约翰率舰队抵大沽口外。他们不按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的路线，而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5月25日，英、法军舰突然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大沽炮台守军奋起反击，激战了一昼夜，击沉击伤英、法军舰10余艘，毙伤侵略军约600名，英国舰队司令贺布也受重伤，联军狼狈退出大沽口。

大沽战败，使英、法政府恼羞成怒。由额尔金和葛罗率领的1.8万英军和7 000法军卷土重来，气势汹汹地杀向中国。1860年，英法军队分别占领大连湾和烟台，封锁渤海湾，完成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部署，迫使清政府赔礼道歉，并在和约上签字。6月15日，英、法又集结舰船约200艘于北塘附近海面，顺利实施登陆，迅速切断了大沽与天津之间的主要交通线。7月5日，联军进攻大沽，僧格林沁率部退至北京东南通州一带，联军乘胜占领天津。

7月下旬，英、法联军继续向通州进军，清政府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求和。8月4

日，因联军向张家湾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导致谈判破裂。7日，清军3万余人在通州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等撤往北京城。第二天，惊慌失措的咸丰皇帝令其六弟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负责求和事宜，自己则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8月中下旬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在进行彻底破坏之后，于10月13日兵不血刃地从安定门开进了北京城。清政府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以“调停”有功为由，又强迫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取得了更大的利益。

三　收复新疆

19世纪70年代开始，列强除在沿海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浪潮外，还不断入侵中国的内陆边疆。

沙俄首先在中国西北边疆进行侵略活动。1872年，俄国借口安定边境秩序，强行占领中国的伊犁。此前，中亚浩罕国军阀阿古柏攻占中国新疆喀什噶尔（今喀什市）等地，建立哲德沙尔（意为七城）汗国，自立为汗。后来，阿古柏把南疆全部、北疆部分地区都纳入其控制之下。阿古柏政权的出现，引起了英、俄两国对新疆地区的觊觎，从而使新疆面临空前的危机。

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授以全权，经营新疆事宜。左宗棠在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集中约6.7万兵力，屯于肃州以西，制定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进行入疆平叛的各项准备。

1876年，左宗棠命先期入疆的张曜部屯驻哈密以保护粮道，由主力刘锦棠部先取北路。刘锦棠率湘军各部在乌鲁木齐以北的古牧地（今米泉）步、炮结合，大败阿古柏军，歼敌6 000余人，连克北疆重镇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又收复玛纳斯南城，歼敌数千。至此，除俄占伊犁地区外，北疆全部为清军收复，实现了入疆作战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北疆失败后，阿古柏以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为犄角构筑防线，以防清军越天山南下。达坂城居天山南麓，扼南疆门户，形势险要，阿古柏派其大总管率重兵防守，又以次子守托克逊、白彦虎等守吐鲁番，自己在喀喇沙尔（今焉耆）策应诸军。

1877年，刘锦堂率湘军突然逾岭南下，奇袭达坂城，清军炮火击中敌城中火药库，继而全歼守敌，俘其大总管。此后，刘锦堂会合自哈密出动的张曜部，一举攻克托克逊、吐鲁番，敌军损失2万余人。三城既得，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见大势已去，饮药自杀。南疆各族人民久受阿古柏反动政权的荼毒，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打击阿古柏军。

就在清军节节胜利之际，朝廷中一部分大臣却指责西征耗费过多，又担心英、俄暗中援助阿古柏，怕兵连祸结，认为不如在天山南北安置兵勇，划定疆界。如果按照这种意见，西征必然半途而废。对于这种论调，左宗棠据理反

驳，表示“地不可弃，兵不可停”，并向朝廷提出在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的长治久安之策。此后，清军按照既定计划，继续平叛行动，接连收复了喀喇沙尔、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与白彦虎率残部退入俄境。1878年，清军攻克和阗。至此，被阿古柏蹂躏13年的南疆地区，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左宗棠西征的胜利，为中国通过外交途径收复伊犁创造了有利条件。阿古柏势力被肃清后，俄军再赖在伊犁已经没有了借口，清政府通过与俄方的艰苦谈判，签订了《伊犁改订条约》。虽然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但终于收复了伊犁地区，整个新疆基本回到清朝版图之内。1884年，清政府接受左宗棠的建议，正式完成了新疆建省工作。

四　耻辱的胜利

伊犁条约签订两年之后，为保卫越南和中国的南疆，中国和法国侵略者之间又发生中、法战争。

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发现越南北部的红河可以直航中国的云南，于是派军侵入越北地区，并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当时，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的黑旗军帮助抵抗法国侵略者，黑旗军于1873年与1883年两次在河内近郊大败法军，分别击毙其头目安邺及法军司令李维业。法军在越南北部受阻，遂派兵南下，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

《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法国开始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中、法之间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1883年12月，法军在孤拔指挥下，向驻有清军和黑旗军的山西城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次年，法军攻占越南战略要地北宁，旋即全部占领了红河三角洲。清政府派主和派首领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谈判，签订天津《简明条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通商和撤军，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但这一条约受到中、法两国政府的反对。法军首先突袭谅山，反而被中国援越军击退。因为军事上占不到便宜，法驻北京公使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天内赔偿法军费8 000万法郎，这一无理要求当然被清政府所拒绝。

闰五月下旬，法国舰队强行驶进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清政府一味依赖外国的调停，既不阻止法舰驶入，又不积极备战，演出了交战双方船只同泊一港的闹剧，导致福建水师只能坐待敌舰来攻。7月3日，法舰发动突然袭击，用大炮和水雷轰击军港内的中国军舰。张佩纶等大臣临阵逃跑，福建海军仓促应战。结果，福建水师的11艘军舰被全部击沉，商船损失19艘，死难士兵700余人。次日，法舰又炮轰港内的福州造船厂，中国的福建水师和经营了20多年的福州造船厂就这样毁于一旦。

马尾海战打破了清廷的幻想。3天后，清廷发布宣战诏旨。陆路战场在越南北部分东西两线展开，东线广西巡抚潘鼎新一再退却。1885年初，法军占领镇南关，战火烧到

中国境内，广西震动。

正当法军准备进攻龙州时，老将冯子材受命指挥前敌诸军。冯子材受命后，团结诸军，在镇南关前修筑长墙作为防御工事，把法军阻扼于长墙之外。二月初八日，冯子材身先士卒，冲出关外，全军将士奋勇杀敌，毙伤敌军近千，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之后，冯子材又率军收复谅山及潘鼎新丢失的阵地，取得开战以来未曾有过的巨大胜利。西线的黑旗军、滇军也在越南军民配合下，大败法军，并乘胜收复十数州县。同时，法国海军进攻台湾和大陆沿海港口也未能得逞，法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在进攻浙江镇海时被守军击伤，不久死于澎湖。

镇南关、谅山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倒台。正当冯子材联络西线滇军和黑旗军，准备收复北宁、河内，把法国侵略军全部赶出越南北方的时候，清政府下达了停战撤军的谕旨，中法战争就此结束。

在中国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清政府却同法国公使在天津签订了不平等的《越南条款》，满足了法国在战前提出的侵略要求。法国的不胜而胜，中国的不败反败，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五　甲午海战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

义国家，扩张野心日益膨胀，并磨刀霍霍，把侵略的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

1894 年夏六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朝鲜政府之邀，清政府派兵平乱。日本政府得此信息，认为有机可乘，遂立即否认朝鲜为大清的属国，同时出兵 8 000 人自仁川登陆，直趋汉城，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寻衅闹事。起义军被镇压后，中国政府通知日本，建议两国同时撤军，但日本不仅不撤军，反而组建大本营，聚集优势兵力，攻进朝鲜王宫，成立傀儡政府，并迫令朝鲜“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

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中国朝野哗然，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一致主张对日宣战。当时率千余清军孤守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也急电李鸿章，认为“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清政府遂派总兵卫汝贵等赴朝援应，又从天津调军从海路增援牙山。

日本侦知以上情报后，派军舰埋伏在牙山口外，于 1894 年 7 月 25 日不宣而战地在朝鲜西岸的丰岛海域附近偷袭清舰，一举击沉清军运兵船高升号，并在海上射杀清军 800 余人。同日，日本陆军又偷袭驻守在牙山的清军，早经预谋的一场战争就这样打响了。

8 月 1 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宣战之后，清廷一面增调大军驰援平壤；一面严令北洋舰队向黄海出击，与日本海军决战。

陆战方面，卫汝贵、叶志超先后到达平壤，叶志超被任命为平壤各路清军主帅，但因叶志超在牙山之战中败于日军，并在战败后率先逃跑，所以清军各将领心怀不满，不服调度。结果当日军分四路向平壤发起猛烈攻势时，各路清军根本不能协同。虽然一些清军在战斗中非常英勇，如马玉昆率毅军守东门及大同江东岸，给予日军以重大杀伤；守北城玄武门的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所部迎击日军。但叶志超在得知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和玄武门失守的消息后，立即下令撤军逃走。这时，清军后路已被日军切断，叶志超突围时溃不成军。到8月下旬才率残部仓促渡鸭绿江退入国境，而日军则渡过鸭绿江紧追不舍，很快深入辽东半岛。

海战方面，李鸿章深知中日海军实力悬殊，因而避战之心愈切，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下令海军只许在威海卫、旅顺至鸭绿江口一线巡逻，不可越境御敌。但当时中日既已宣战，陆军又屡屡失败，要通过海道向朝鲜增兵，必须有舰艇护航，因而也必然与日本海军遭遇。1894 年 9 月 16 日，清廷调刘盛休部“铭军”4 000 人自大沽出发增援平壤，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自中途护送。日本舰队得报，遂集中其最精锐之舰艇 12 艘于鸭绿江口外之大东沟一带，计划待清舰返航时，予以邀击。17 日下午，北洋舰队返航至大东沟，与日军遭遇，一场惨烈的中日黄海血战，便正式爆发了。

当时北洋舰队的护航舰艇虽有 18 艘之多，但主力战舰

不过定远、镇远、致远、济速、靖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共10艘，且均为1888年前下水的旧式战船，舰上又未装备速射炮。相反，日本的12艘舰艇中，吉野、秋津洲、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赤城等7艘巡洋舰为1888年以后下水之新船，时速快于北洋舰队的船，且均配有速射炮。日军其余船只虽为老式舰艇，但武器装备已经进行过更新。战役打响后，清舰作夹缝雁行阵迎敌，旗舰定远居中。12时50分，定远首先开炮未中。日旗舰松岛和北洋旗舰定远互相猛击，松岛炮塔被击中，定远栈桥被击毁，舰队司令丁汝昌受伤，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指挥。日舰比睿、赤城被北洋舰队重创，逃离战斗序列。北洋舰队的扬威、超勇则失去战斗力，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奋勇抵抗，两舰官兵均壮烈死难。济远、广甲两舰贪生怕死，退出战斗。在此情况下，定远、镇远二姊妹舰力持危局，重创敌旗舰松岛。海战经过了5个多小时，日联合舰队先行败退，北洋舰队旋亦收队返港。

清舰损失虽较大，但北洋舰队还剩下26艘军舰，仍不失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近代海军舰队，可是李鸿章夸大败绩，下令北洋舰队躲在威海卫内，不许出战，结果日本轻易取得制海权，造成以后中国海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日军海陆两路夹攻威海卫，陆军渡江进攻辽东冲要和战略据点海城，连攻鞍山站、牛庄、营口、田庄台，占领了辽东、辽南地区。

与此同时，一部日军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清守军除徐邦道率部激战外，大连湾、旅顺的各守将相率潜逃，致使清政府经营15年，花费千万巨资建成的包括当时东亚最大船坞在内的旅顺军港及其全部军事设施一并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在旅顺实施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后，随即集中力量进攻威海卫，以图彻底消灭北洋海军。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第二个基地，共有最新式大炮约60门，陆军有16营约万人，港内还有北洋海军铁甲舰、巡洋舰等20余艘。由于李鸿章保存实力不许出击的命令，这些舰只都株守于港内。威海卫战役开始后，日军登陆部队在联合舰队护送下，在山东半岛成山角成功登陆，而日本陆军则利用夺取的岸炮轰击港内的中国军舰，联合舰队又从海上配合进攻，结果北洋海军陷入绝境，一些舰只先后被击沉。到了17日，镇远等大小船只10艘在船上外国雇员的胁迫下无耻地向日军投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等自杀。作为洋务派自强运动结晶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灰飞烟灭。清政府见大势已去，派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身份，在美国顾问科士达陪同下到达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进行求和谈判，订立了更为屈辱的《马关条约》。

在此以前，中国都是败于西方列强，甲午战争中，中国竟然在日本面前一溃千里。从这以后，世界上都把中国称作是“东亚病夫”。而日本经过甲午一战，不仅实现了其在东北亚扩张的野心，而且也断送了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的近代化事业。

六　横扫南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从此国门大开。《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使广州失去了作为独一无二的中国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不仅原来赖此为生的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丧失了生活来源，而且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又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的农业社会从此处于动荡之中。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已是风雨欲来，积聚起来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终于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由洪秀全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命运决定了他人生信仰的转折，在科场屡次碰壁之后，他接受了基督教，并创立了“上帝会”，要建立太平的天国社会。洪秀全关于建立理想社会的思想虽然有些粗糙，但毕竟让已经生活不下去的农民们有了生活下去的希望，尤其在广西地瘠民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复杂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更具强大的号召力。

1851 年，聚集在金田村的 2 万多拜上帝会会众，在洪秀全率领下，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

王、石达开为翼王，初步建立政权。1852 年，太平军进入湖南，确立了“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攻下湖北省城武昌，贫农、矿工、船夫、会党从者如云，一时声威大震，部队猛增到 50 万人。1853 年，太平军顺江东下，一举攻克南京，据为都城，改称天京。

太平天国起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清政府立即动员全国军政力量进行镇压。从广西尾随到南京郊外的向荣被委任为钦差大臣，驻扎孝陵卫一带，号称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军驻扎扬州附近，号称江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杨秀清等决定分兵北伐和西征。1853 年，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下，北伐军从浦口一带出发，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长驱直入，经深州直抵天津城下。清廷大为震动，急调僧格林沁强悍的蒙古骑兵予以围堵，北征军将士大部战死。

西征军的一支由赖汉英等率领溯江而上，连克安庆、汉口、汉阳以及南昌附近的许多州县。另一部由胡以晃率领进军皖北，攻占安徽临时省城庐州府（合肥），全歼守敌，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死。1854 年初，皖北战场上的胜利之师进入湖北，大破清军。在靖港，曾国藩率刚刚练成的湘军与太平军激战，几乎全军覆没。但不久曾国藩卷土重来，大败太平军。

西征军失利后，石达开奉命西援，曾国藩亲到九江督战，陈兵九江湖口间，差不多集中了湘军所有精兵悍将。

石达开见湘军求胜心切，采取坚壁固守、寻机歼敌的战术，抓住战机，堵死湖口，把湘军水师分割成两个部分，湘军水师优势顿失。接着，太平军以小艇驶入外江，围攻敌人大船，火箭喷筒连续施放，焚敌船40余只，湘军水师被迫退回九江城外大营。1855年初，太平军乘月黑夜暗，驾小舟突袭湘军水师，烧毁敌船百余只，擒获曾国藩坐船，湘军大败。这次大战扭转了太平军在西部战场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秦日纲、陈玉成等率部第三次攻克武昌。这样，天京以上三大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就全部处于太平天国的直接控制之下。

西征军反败为胜后，开始回头对付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以解除天京外围的威胁。1856年，秦日纲率陈玉成、李秀成等攻破江北大营，后与石达开会师一举摧毁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自缢身死。天京的肘腋之患得以解除，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

不久，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石达开率部出走，清军重建了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处境日趋恶化。1856年，湘军再度攻陷武昌，次年，又围困天京，1858年，九江沦陷。至此，天京上下游主要军事据点除安庆外，全部为清军占领，湘军水师也指向天京。此外，太平天国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所占有的州县，大部分也被迫放弃，太平天国由军事上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为扭转被动局面，洪秀全采取措施，重建领导核心。1859年，统帅部作出了再破江南大营、解除天京封锁的决

策，由李秀成负责组织实施。次年，李秀成运用围魏救赵战术，与李世贤部自皖南入浙江，一举攻克省城杭州，切断江南大营饷源，这就迫使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分兵援救。李秀成见江南大营已经分兵，立即回师天京。在陈玉成部配合下，歼灭官兵数万人，大破江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并乘胜东进，连克苏南、浙西许多州县，将其作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一块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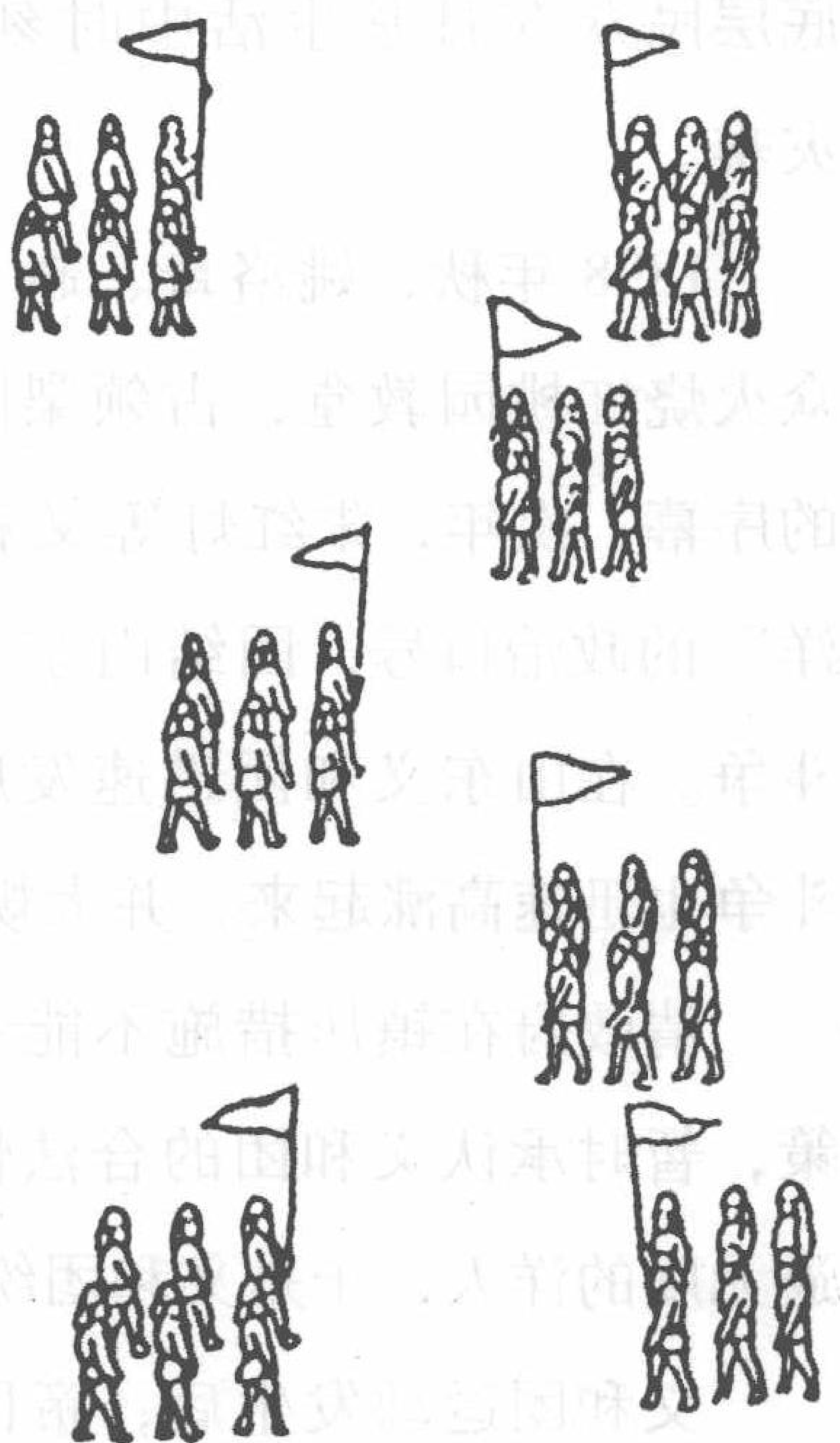
但在太平军集中主力攻破江南大营时，湘军却在皖北战场屡屡得逞，并将战略目标锁定军事重镇安庆。曾国藩认为，夺取安庆之役“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为此，曾国藩不顾江南大营失败及江浙各地失守的情况，坚持以攻夺安庆为军事上的第一选择，并把湘军主力摆在安庆至桐城间，以水师控扼长江，以陆师包围安庆。

太平军的统帅部这时在战略思想上却发生了分歧。陈玉成认识到长江上游的重要性，主张先救安庆；李秀成则主张取长江下游苏杭、上海地区，然后再发兵沿长江两岸进攻湖北。两位优秀将领在战略上的歧见，导致两军不能协同作战，预定合击武昌以解救安庆之围的计划也告失败。为解安庆之围，陈玉成于1861年率部弃鄂回皖，驻军于安庆城外集贤关，与湘军在安庆周围地区展开了激烈争夺战。9月，湘军曾国荃部轰破安庆城墙，安庆陷落。陈玉成兵败后遭湘军诱捕，被杀于河南延津。作为天京上游唯一屏障的安庆失守，使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处境更加恶化。此后，

整个江北根据地也接连丧失。

1862年，曾国藩指挥水陆师完成了对天京的围困，李秀成决定调集30万大军分三路救援天京：李秀成率主力进攻天京城外的敌军，中路由陈坤书等攻芜湖，截断敌军粮道；南路由杨辅清和黄文金等攻宁国，以牵制敌增援部队。湘军参战部队也有约七八万人。太平军猛攻雨花台曾国荃大营，几乎把湘军整个阵地冲垮。但中路军却为湘军水师所败，未能截断敌人粮道。太平军只得从战场上撤出。天京会战最终未能打破湘军包围，湘军对天京的围困却坚持下来了。

皖北根据地丧失后，江浙成为太平军和中外反动势力争夺的主战场。1862年，英法联军配合清军进攻宁波，太平军打死了法国舰队司令耿尼，又击毙了会同英军前来救援的常胜军统领华尔、法国新任宁波海军司令达尔第福、英军参将定龄等。但不久，太平军的慕王谭绍光被叛徒刺杀，苏州失陷，杭州也为左宗棠部湘军攻陷，接着常州也落入湘军之手。至此，太平天国的各个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7月19



太平军百鸟阵

日，曾国荃部湘军从地道轰塌天京城墙，天京沦陷。英勇斗争14年、驰骋南北10余省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终于被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绞杀了。

七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义和团本名义和拳，属白莲教的一支，是19世纪以来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本来与外国洋人无关。但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势力渗入山东，遍布山东的外国大小教堂会所多达千余处。外国教士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底层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感受到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灾难。

1898年秋，姚洛奇、赵三多在山东冠县集合义和拳信众火烧红桃园教堂，占领梨园屯，揭开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序幕。次年，朱红灯等义和拳领袖明确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团结山东义和拳，开展日渐浩大的反帝斗争。在山东义和团迅速发展的同时，直隶义和团的反抗斗争也迅速高涨起来，并大规模地向京津挺进。

清政府在镇压措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决定行招抚政策，暂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性，以便利用义和团来对付侵逼无度的洋人，于是义和团纷纷进入北京、天津。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帝国主义列强一再要挟清政府严加镇压，十一国驻京公使还以外交团名义照会清政府，要

求严禁民间结社练拳、惩处办团不力人员。大沽口外的各国海军，也做好了登陆准备。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政治上极端保守的后党刚刚镇压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慈禧太后误认为列强要用武力恢复光绪帝的政权，威胁自己的统治。加之列强不断增兵，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在惊恐之余，仇外心理极端膨胀。

1900 年 5 月，英、俄、法、德、日、美、意、奥八国联军 2 000 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从天津乘坐火车强行开往北京，沿途遭到义和团痛击，死伤 300 多人，被迫从杨村乘木船沿运河朝天津奔逃，后被俄军救出，逃回天津租界。进攻北京受阻后，联军转而依靠海军优势攻陷大沽炮台，使天津的门户洞开。就在大沽失守的当天，那拉氏接到了一份列强外交团要她交出政权的谎报，遂正式向列强宣战。清政府照会各国使馆，限其 24 小时离开北京，同时宣布诏抚义和团上谕，任命刚毅等统率京津义和团抵御列强侵略。

为了反抗联军的侵略，义和团协同清军一起与踞守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的八国联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虽然义和团与清军给联军以极大杀伤，但天津最终还是被联军占领。占领天津后，八国联军沿北运河两岸向北京开进。当时，驻守在京津沿线及北京附近的清军和“勤王”之师约 10 万人，分布在若干点上，实行消极防御。加之那拉氏不断发出求和、避战的指示，又不指定前敌统兵大员。结果，八国联军如入无人之境，轻易攻陷北京，那

拉氏挟光绪皇帝逃向西安。

联军攻陷北京后，在北京实行分区占领，并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和抢劫。为了胁迫清政府屈从，八国联军还四处攻城略地，扩大侵略。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率2万余德军经大沽到达北京后，还把联军统帅部设在中南海仪鸾殿。这时，到达中国的联军兵力达到10万，所到之处，给各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还在联军向北京进军途中，清廷即命两广总督李鸿章充任议和全权大臣。在逃亡途中，那拉氏又发布“剿拳”谕旨，通令官兵对义和团要斩尽杀绝，以此向帝国主义列强做出求和的表示，义和团运动就这样在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和清政府的欺骗、出卖下失败了。

列强在经过尔虞我诈的矛盾、斗争后，逐渐取得基本一致，逼迫清政府于1901年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

八 “中体西用”和“师夷之长技”

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刺激了封建统治者顽固不化的脑袋，他们恍然大悟，认为洋人比中国高明的不过是“船坚炮利”，于是出现了“中体西用”理论指导下的军事改革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就是主张大力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实现“军事现代化”，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从而既满足国防需求，又给奄奄一息的封建制度注入

强心剂。

1862年，清廷谕令各省督抚，“令中国员弁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务须得其密传，能利攻剿，以为自强之计。”这样，一个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核心的军事自强运动开始在中国出现，并成为人们常说的洋务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军事改革主要取得了下列几方面的成就：

第一，创建近代军事工业，购买和制造近代武器装备，将近代枪炮和舰船技术引入中国，使中国得以告别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而进入火器时代。

1861年冬，两江总督曾国藩率先兴办了的中国最早的军事工厂——安庆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建了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局，并同曾国藩合力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这些军事工厂主要的任务，就是为湘、淮军赶造军火。此后，闽、浙总督左宗棠又建立了专门制造轮船的福州船政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建立了天津机器局。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各类军事工厂已达24个。

江南制造局是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该局起初只是仿造英国的步枪、马枪等前膛枪，到了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仿造林明敦后膛枪，19世纪80年代后期又开始仿造德国的新毛瑟枪。在大炮制造方面，江南制造局1870年前专造开花子轻铜炮，其后开始仿造美

国的千斤重铜炮和40余磅的来福子熟大炮，到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能够成功仿造英国的阿姆斯特朗新式大炮和制造装40余磅炮弹的全钢快炮。

福州船政局厂址在福州城外马尾山后，除工厂外还有船政学堂一所，分法文班和英文班，培养轮船的监造和驾驶人才，甲午战争中的著名将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都是该学堂英文班的第一届毕业生。其造船速度和数量都是当时其他军事工厂所无法相比的。建厂之初，曾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分任正副监督，合同期满后，船政局遂将大部分外国技师辞退，改由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大大加快了技术进步。

湖北枪炮厂是张之洞创建的军事工厂，厂址在汉阳北龟山下，1890年动工兴建，主要制造小口径新式步枪，炮厂主要制造适合野战和山地作战的两种快炮。建厂之初，湖北枪炮厂每年只能生产40~50毫米口径新式快炮70尊左右，其生产新式步枪的能力也有限。到了1895年以后，该厂几经扩充，成为与江南制造局齐名的全国最大的军事工厂之一。

19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火器技术还停留在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舰船技术则停留在帆船时代。正是因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数十家近代兵工厂的相继设立，以及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与仿制，结果中国的火器技术和蒸汽舰船技术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连续实现技术

上的重大突破。到清代后期，中外火器技术的差距，已由原来的大约相差两个世纪，缩短到10年左右。在舰船制造方面，更是在动力、装甲防护、舰载火器等方面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

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使清军的装备状况在19世纪60年代后得以迅速改观。首先是李鸿章的淮军更换洋枪、洋炮，接着在湘军及其他各路勇营部队中也大量出现了洋枪、洋炮，再后来部分练军也淘汰了旧式的冷兵器。这样，作为清军主体的部队都已基本上实现了装备的火器化。在海军方面，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后着手建立的南北各路海军均以近代蒸汽舰船作为自己的装备，其规模和水平一度处于东亚的前列。

第二，外送内引，发展近代军事教育，培养近代军事人才。

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清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认识到培养近代军事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在支持洋务运动的内廷大臣和地方大员的共同努力下，福建船政学堂（1866）、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74）、天津水师学堂（1880）、北洋武备学堂（1885）等中国第一批军事学堂得以建立起来。据统计，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所建立的军事学堂一共有19所，其中海军学堂12所。在这一时期，清政府还先后派出数批约90人到西方国家进行军事留学，其中派到英、法两国学习航海、驾船技术和海军指挥的就有80人。这批经过近代军事学堂培训或国外留学的新式军事人才，

对晚清军队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北洋海军受益最为明显。

第三，适应新的装备情况，对陆军兵种制度进行了局部改革，并确立了新的近代海军军种制度。

陆军军制的局部改革首先发生在淮军中。1863 年初，李鸿章在淮军中组建了专门的炮兵营，辖炮兵 200 名，装备从国外进口的开花炮。这是中国近代炮兵制度的开端。1864 年以后，整个淮军共计编有 6 个炮兵营。左宗棠部湘军在出关收复新疆的作战时期，也组建了专门的炮兵部队。期间，淮军和湘军的步兵和骑兵也因完全使用近代火器，成为近代意义的步兵和骑兵。

1888 年，以《北洋海军章程》的颁布为标志，中国近代海军军种制度得以确立。这个章程主要仿效英国海军规章，兼采德国海军制度，当然也参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适当的改动。根据该章程所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编制制度，虽未能摆脱旧的绿营官制的形式，但已按舰船性能编组，分专业设官分职，因而与清朝旧有的水师编制有了根本的区别，能够有效地保障对整个舰队的操练和作战的指挥和管理。北洋海军还具有自己较为严密的官兵考核制度、水手招募制度、日常管理制度、训练检阅制度等。可以说，它代表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制度改革的最高成就。

第四，在改进装备并部分革新制度的基础上，清朝的陆、海军训练方式和战术也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变化，近代陆军战术开始在中国萌生，近代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中得

以确立。

淮军是最早开始近代陆军战术尝试与引进的中国陆军。19世纪60年代初，淮军参照法军战术，在与太平军作战时采用在开花炮队掩护下由洋枪队实施突击的新战法。至1871年，淮军刊发全军性操典《枪炮操法图说》，对步、骑、炮三个兵种的协同和具体战术做了规定。从总体上看，淮军的战术属于散兵线与纵队结合的战术，并开始注意到三个兵种的协同使用问题，处于近代陆军战术的初期阶段。

北洋海军的战术是在引进英国海军操典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组织编写的《船阵图说》一书集中体现了海军的新战术。从实际情况看，北洋海军的战术重视阵法，倾向于实用横阵或斜形阵以便舰首对敌。在攻击手段上，它既重视发挥火炮与鱼雷攻击力，又看重用舰首冲撞敌舰。在海军战术史上，这种战术处于由横阵战术向纵阵战术过渡的前期。

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军事领域以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为核心发生了多个方面的变革。当然，这一时期中国的军事改革还停留在学习西方科技的“师夷长技”这一层面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器物”改革的层面上。这就导致该时期的军事自强运动自始至终都明显地缺乏力度，缺乏活力。因此，经过洋务运动改造后的中国军队，对付国内使用冷兵器的盗匪时绰绰有余，而面对东西列强完全近代化的军队则仍然无能为力。

九　昙花一现的北洋舰队

早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就有建立海军的打算，但由于决心不大，10年间一直处于准备阶段。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邻国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成功迈向近代化，并从此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其矛头首指中国和朝鲜。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1879年，日本依靠武力正式吞并清朝的藩属琉球。1882年及1884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并吞朝鲜和侵略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来自东方邻国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引起了清朝朝野的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有更清醒的认识。加之台湾事变发生后淮军精锐唐定奎部6 000人赴台增援时，清政府因无船运兵而十分被动，李鸿章更加认识到自建海军御侮的重要性，于是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速筹建中国的新式海军。

当时，清政府已经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加之洋务运动已进行了10多年，国力迅速恢复，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于是由总理衙门出面奏请，以海关收入的40%，约400万两白银，作为建设新式海军的费用。

在筹建海军之初，清政府接受薛福成的建议，拟建北洋、南洋、闽粤三大舰队，分建合操。北洋舰队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监督与建设，以拱卫京师门户。南洋舰队则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统率，以防卫东南海岸及长江内外。闽、粤舰队由两广总督负责建设，以保卫东南沿海。1883 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添设海防股，加强统一管理，后正式设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䜣总理海军事务。

在筹建过程中，清政府并没有落实最初的设想。因为沈葆桢死后，有关海军的一切规划和经费使用大权落到了李鸿章手中，这大大便利了北洋舰队的扩充。到了 1888 年，部分海军专款又被慈禧太后挪用于修建颐和园。此外，各级官员视海军衙门为肥缺，竞相贪污挪用，导致新建海军经费短缺。结果，计划中的粤洋水师根本没有建立，只在广东和福建分别搞了两支规模很小的舰队——广东水师和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共有大小船只 19 艘，除 4 艘船只较大外，其余的都不能远涉重洋，整个舰队只能在近岸巡防，没有海上作战能力；福建水师共有各类舰船 20 艘，虽然舰船吨位较广东水师大，千吨以上占半数多，但多为木质，难以抵挡敌人的炮火，作战能力不强。南洋水师由两江总督掌管，共有大小船只 26 艘，载重 1 000 吨以上的有 3 艘，2 000 吨以上有 7 艘，是仅次于北洋水师的第二大舰队，但缺乏大型铁甲舰充任主力，仍不能自成一军在海上独立作战。所以，真正初具规模和具有一定海上作战能力的舰队就只有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共有各类舰船27艘，22艘购自外国。这些舰船中，大多是钢质和铁质船，1 000吨以上的4艘，2 000吨以上的5艘，7 000吨以上的大舰2艘。北洋水师还在大沽、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港口，以旅顺口和威海卫为两大基地，这都是其他舰队所无法比拟的。

从表面情况看，甲午战争前，大清帝国的这支海上武装，就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而言，居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但实际上，当时世界海军的发展趋势已由重视装甲转而追求速度，而北洋舰队因为资金缺乏，在1888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一直未能购进新式快速巡洋舰。而疯狂扩军备战的日本，恰恰在这段时间大量购进新式舰艇。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由英、德制造的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速射炮数十尊，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时速23海里）。此外，新建海军虽然在形式上初具规模，但在海军体制方面，李鸿章及总理衙门接受外国顾问的建议，训练方面学习英国，而指挥体制模仿德国，导致训练与实战的严重脱节。

为展示海上力量，清政府曾于1891年、1894年先后两次举行海军会操。第二次不仅规模大于第一次，而且还特别邀请了英、法、俄、日等国使臣，毫无保留地让他们参观了所有要塞、船坞、水师学堂及舰船设备，这也为北洋舰队在随即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彻底毁灭埋下了祸根。

十　从湘军、淮军和“防军”、“练军”再到新军——中国军队的近代化

清朝军队可分为兵、勇、丁三个层次，兵即八旗和绿营，是国家常备正规武装。勇即由政府出面招募的官勇，遇有战事临时招募，事毕遣散归籍，其数量、装备、地位均不如八旗和绿营。丁即散处城乡各地的团丁，属于不脱产的团练保甲组织，实际上是半兵半民的民兵。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依赖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八旗兵。入关之后，八旗兵趋于腐败，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成为作战主力，到鸦片战争时，绿营也不堪使用了。

嘉庆初年清朝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团练武装曾发挥过很大作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大江南北的10来个省战火不断，各地的土寇、盗匪也趁机蜂起。为了确保后方地区的安全，各省都先后办起了团练，训练本地的乡勇民兵，协助官兵维持本地的治安。一些官员与士绅也纷纷募练官勇与太平军对抗，清政府也对团练武装寄望甚厚，先后任命数十名在原籍的官员负责团练事宜。但大多数团练不堪征战，只有曾国藩所创办的湖南乡勇——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逐渐成为支撑清政府的主要武装力量。于是，以湘、淮军为代表的

勇营完全取代了八旗、绿营的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军事支柱。清王朝的军制也相应地发生了一场变革，勇营军制取代了八旗和绿营军制。

湘军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曾国藩独特的练兵方法。原来，太平天国起义给清朝绿营、八旗以沉重的打击，也给曾国藩以极大的震动，迫使他思考清朝的军队建设问题。他认为，八旗、绿营根本无法承担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任务；绿营兵训练全废，纪律败坏，怯于公斗；团练武装更无法对抗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太平军，办理不当还可能起火上浇油的作用，激起农民更广泛的反抗。因此，必须招募朴实、健壮的山区农民，编练成军，才能独力担当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任务。其具体做法是：

一是在官兵成分上实行“以书生领山农”。也就是改变绿营官兵来源方面的行伍制和世兵制。曾国藩对八旗、绿营腐化的原因看得非常清楚，在创建湘军伊始就把“忠义血性”作为治军、练兵和选将的最高准则。所谓“忠义”，就是无条件地效忠大清王朝，仇视农民起义军；所谓“血性”，就是指培养军队刚强、正直的气质。为此，曾国藩任用一批耿介的儒生充当军队的骨干，同时招募“朴实少心窍”的山乡农民作为部队的基本成员，尤其是特别注重地域原则和私谊。湘军士兵只在湖南招募，主要来源于长沙、宝庆二府，尤以湘乡县最多，军官则多为师生、故旧、亲友、族属。于是，湘军在创建之初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将领儒雅，上马可冲锋、下马可讲学；其士卒朴实、犷悍

而壮健。

二是为了彻底扫除绿营积习，在招募程序和编制方面讲究“节制之术”。曾国藩认为“勇以亲手招募者为佳”，强调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使他们成为所在单位的绝对权威，进行层层选募的工作，如由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招募士卒，一级募选一级，不得越级选拔。这种原则与湘军的营、哨、队等编制单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克服绿营兵平时分散驻防，战时零星抽调，“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的弊端。不过，这也埋下了湘军中对内专制跋扈、对外力谋独立的风气。

三是在官兵粮饷待遇方面实行优待政策，以此凝聚人心。曾国藩认为，无论是将弁还是一般士卒，他们受募入营打仗，一个最基本的动机就是为了利。因而，官兵的粮饷待遇必须优厚，否则军官就会设法克扣士卒，士卒则会漫无纪律，而且壮者不愿受招募，已入营者也将纷纷逃离。所以，在曾国藩的湘军中，官兵的饷金达到绿营的数倍。

淮军是从湘军衍生出来的一支勇营武装，不仅营制与湘军大同小异，军营风气也一脉相承，故而有人把淮军看作是湘军的一个分支。

湘军、淮军和各地勇营，毕竟不属于国家编制内的武装，即不是国家的正规军。因此，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政府深恐这些武装掌握在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手中，造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开始裁减遣

散湘军、淮军和各地勇营。另一方面，清政府又担心在八旗、绿营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若把湘、淮军和勇营一下子裁光，势必造成大量士卒失业，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而且，一旦再发生战争，国家也缺乏有战斗力的军队。经过反复权衡，清政府最后决定，挑选勇营中的精壮者，分遣北京周围的一些地区如遵化、易州、河间、古北口、宣化等地驻防，而各省险要处仍以勇营留屯，称为防军。防军之外，清政府又下令仿照湘军制度对直隶地区的绿营进行改造，并由湘军将领对各地绿营进行编练，称为练军。于是，防军与练军完全取代绿营而成为清朝的主要武装力量，而伴随这一改革的，则是“兵为将有”局面的形成。

但无论湘军、淮军还是防军与练军，基本上仍然是封建传统武装，而不是近代化的军队。他们在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或叛乱势力时尚有一定的优势，但在西方和日本的近代军队面前则不堪一击。1895 年的甲午惨败就宣告了清政府军队改革的彻底失败。战争中，不仅清朝的海军北洋水师一败涂地，而且陆军精锐湘军、淮军、练勇（练军、防军）也遇敌即败，败即逃走，一路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清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醒悟。他们认识到若想整军经武，挽救国势，仅仅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以湘军制度编练勇营的办法也不过是修修补补的治标不治本。换言之，在原有军队的基础上根本无法建立起一支完全与八旗、绿营恶习绝缘的新型军队。于是，他们大胆地将西方军事制

度和战法通通纳入到“用”的范围之中，认为这一切都可以加以仿效，可以在中国普遍推行。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他将军事制度也划到“西用”的范围之内，主张也积极加以变革。具体说来就是：（1）仿效西方建立常备军与续备军、后备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学习日本和西方设立军事领率机构，统一全国军权，改变清朝兵部“只司册籍”，而军机处又内外文武大政无所不统的局面。（2）废除落后的武举制度，大量创设军事学堂，实行系统的军事教育，用近代军事知识来改造清军，逐步实行“非武备学堂出身者不得为将弁”的制度。（3）改革清朝以募兵制为主体的兵役制度，最好采用西方近代的征兵制；若一时实行起来有困难，也要实行“征募制”，招收有一定文化的士农工商子弟，从而达到改良军队士兵成分，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的。其后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军事改革，企图建立一支更能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武装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张之洞的建议为蓝本来操作的。

在这种理论准备下，清朝最高统治者也痛感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不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局夏日而穿冬衣也”，认识到仿用西法、创建新军的必要性。新军编练之初，先在天津附近马厂（后移小站）练兵5 000进行试点，一切操练章程及火器等项，均照西法办理，被命名为定武军。

1895年12月，袁世凯在离天津70里的小站负责训练北洋新军，百日之内就使小站之兵大有起色。袁世凯出身

官宦世家，他的叔祖、叔父都是淮军将领，父亲也是当地地主武装的领袖。1882 年，袁世凯随军入朝镇压“壬午兵变”，并帮助朝鲜王室编练“新建亲军营”1 000 余人，受到朝鲜国王的称赞。甲午战争爆发后，他目睹淮军腐败无能、节节败退的状况，开始详细考察外国军队的特点，分析清军失败的原因，一再上书给朝中重臣，提出采用西法练兵的主张，陈述改革清朝军事制度的设想。他的诸多举动与甲午战争后朝野要求改革军队的热潮相契合，并由此声誉鹊起，被视为编练新军的最佳人选。他接管小站新军之后，雷厉风行，迅速对全军的编制、饷章、募兵、训练方法和后勤体制做了重大改革。在编制上，在定武军基础上扩编为7 000 人，定名为新建陆军。彻底仿效德国陆军，一分军（即师）下辖两翼，每翼下辖数营。同时还设有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兵种，形成了“步队为主，炮队辅之，马队巡护，工程队供杂役”的多兵种合成作战单位。在指挥体制方面，在总部内设有参谋、执法、稽查、督操等多个作训职能机构。在募兵方面，既保留了湘淮军“人必土著”的原则，又吸收了欧洲的某些做法。对于军官的任用，他特别注意招徕和重用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官兵的薪饷也比绿营优厚得多。在教育训练方面，袁世凯在继承湘、淮旧规的同时，在军事训练上则完全按照德国陆军操典，由德国军官负责实施，并经常组织演练，合练诸兵种协同作战方法，进行野战对抗演习等。经过整顿，小站之兵焕然一新，颇得主持督办军务的荣禄的赏识，袁世凯也因此在

仕途上步步高升。与新建陆军同时崛起的南洋自强军，先后由张之洞、刘坤一主持编练，也是按照德国操典，并由德国军官具体训练，在编制上与新建陆军非常接近。新建陆军和自强军这两支新军完全按照西方军制编组而成，不仅武器装备先进，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也较为完善，具有独立遂行战斗任务的能力，很快成为清军的佼佼者。

编练新军虽然试验成功，但保守的清廷并不打算在全国进行全面的军制改革。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才被迫实行“新政”。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整个武装力量体制进行改革。具体办法是：（1）仿西方、日本体制，裁汰原有的各勇营，将国家武装力量分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三种，达到平时养兵少，战时有兵的目的。（2）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吸收西方征兵制的一些做法，实行“征募制”。（3）摒弃以往前、后、左、右、中的“五五”编制，采用符合当时军事技术发展和作战需要的步、骑、炮、工、辎重多兵种合成编制。（4）为了提高军官素质和适应近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工作日益繁重的需要，严格规定新军军官应当首先从武备学堂学生或带过新军的官弁中选用。对军官退休的年龄也做出了规定。（5）为了适应新军编制，提高军官的社会地位，改变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设立了三等九级军衔。

上述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在各省引起极大反响，一个空前的练兵热潮在全国兴起。仅在北京、天津、直隶地区，

就先后编练成陆军第1至6镇，每镇辖21营，总兵力达八九万人。至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总共编成新军14个镇，18个协及一些零散部队。

然而，令清朝统治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本来是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而创建的新军，竟然会调转枪口，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由于新军吸纳了大批具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中下层军官多出自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军事学堂毕业生、留学生，所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新军首先成为革命的力量。清王朝打算用一支具有浓郁资产阶级色彩的军队来维护封建政权，实属南辕北辙。

十一　中国近代作战样式的演变

历史进入近代（1840～1911），中国遇到了全方位的国防危机甚至是亡国亡种的威胁。面对“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完全陌生的敌人，面对全新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中国不得不在军事领域进行变革，从而走上了艰难的军事近代化道路。

（一）陆战作战样式的变化

明朝中期，随着火器技术的发展，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条件下的战术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戚继光创造的步兵分队战术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就是适应火器技术

发展而设计的小而疏散的新式战斗队形。其中鸳鸯阵类似于今天的班纵队战术，以 12 人编成的队作为最基本的战斗单位，阵的最前面是 2 名牌手，分别手持长牌和藤牌，保护全队；之后是 2 名狼筅手（保护牌手）；狼筅手后面是分列两排的 4 名长枪手（既有进攻杀敌的任务又有保护牌、筅手的责任）；阵的最后面则是 2 名短兵手，分持镗钯（充当护卫枪手）。此外，1 名队长在队伍最前方，还有 1 名士兵充任伙夫。这样，12 人就构成一个既便于进攻又互为支援的最小的战斗单元。一头两翼一尾阵则是把参战部队分成 4 个部分，前者为头，是正兵，担负进攻任务。头的两翼部队为奇兵，保护头的两个侧翼不受敌人袭击。尾是策应部队，实际上是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头和两翼。这种阵法类似于今天营团规模的作战部署，属两个梯队的战术，可以实现三个方向用兵，这在当时的世界上属于最先进的战术，与鸦片战争时西方军队所惯用的线形战术和纵队战术比，也并不落后。

但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迎来的却是战术观念发展的顿挫。对明人已经创新的战术，清军既未继承，更谈不上发展。清军入关前，以弓马骑射见长，习惯在无炮火掩护下遂行宽大正面冲锋的野战。清军入关后，仍然迷信自己的八旗、绿营战术，墨守祖制陈规。比如，历史上，火炮出现后，作为掩护力量很快运用于野战，但清军无视这一趋势，而是主要将火炮用于攻城。至于步兵作战，也不以发挥火力为主，而是先以马队作高速冲锋，继之以步兵的

“连环枪法”，即将部队中使用火器的步兵，分作若干部分，轮番攻击，为手持冷兵器的步兵或骑兵冲击决战创造条件。而且，当时清军装备的火枪，基本上是前装滑膛式鸟枪，装填的是黑火药，装填时间长，发射速度慢，难以发挥火器的威力。但因为这样的装备和战术在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军时占有优势，加之清军长时间里没遇到更强的对手，所以延续了下来。

到鸦片战争时，清军不仅装备落后，而且战术呆板、低劣，只知正面设防，不知纵深机动，因而根本不是英军的对手。面对装备精良、注重发扬火力、擅长侧翼包抄的西方侵略者，清军只会以挥舞刀矛的骑兵集团进行宽大正面的冲锋，或以装备弓箭、刀矛、鸟枪的步兵以“连环进步法”死拼硬挡，即重火器在前，轻火器随后，冷兵器殿后。交战中，距离敌人较远时用火炮漫无目的地轰击以威慑敌人，待敌稍近时施放抬枪，再近时施放鸟枪，如果这“三板斧”用尽而仍不能退敌，则由手持冷兵器的士卒与敌肉搏。这种队形密集的呆板战法，自然只能成为敌人的活靶子，以至于在侵略者面前一败再败。

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惨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改革清军战术的问题，如林福祥就认为，英军善于抄后路，所以清军应针对英军的优长改进陆战战术，即除了进行正面抗击之外，还应有奇兵防止敌军抄自己的后路；也有人提出，对装备优于自己的敌人，清军可以人自为战，靠拢英军，然后再用大部队内外交逼而围歼英军。这些新的战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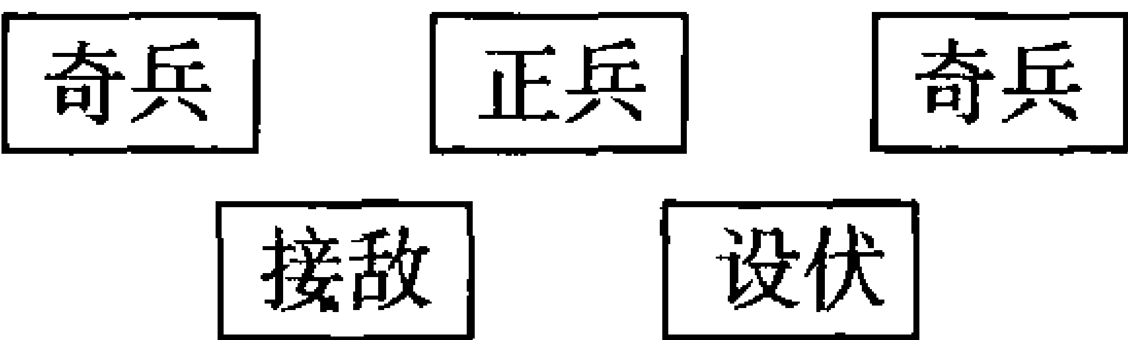
思想虽然开始时并不被接受，但残酷的战争实践和屡战屡败的现实，使清军不得不慢慢改进自己的战术。

19 世纪 50 年代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和对国外火器的引进，使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的清军在战术上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创新时期，其标志就是湘军作战方式的出现。曾国藩主张“以书生统三农”，并仿照明人戚继光的做法，对清军的方阵战术进行改革，从而将传统的冷兵器、火器并用并以冷兵器为主的战法，发展到顶峰。其具体战术创新表现在：

在攻守城战术方面。攻城战斗一般采取袭击、强攻和长围 3 种方法。其中袭击和长围的办法古已有之，强攻方法则是在火器威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对西方近代攻城战术的积极引进。湘、淮军强攻城池时，往往将战斗行动分为 4 个阶段：开辟通道、找准和打开突破口、冲锋队巷战、追击。在这一过程中，火器的作用得到充分的重视。其具体战法有二：一是装备洋枪、洋炮的淮军采用的“炮轰步冲法”，即先以火炮猛烈轰击城池，炸开缺口，完成突破、破障等任务，然后，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乘机冲入城内。二是湘军经常采用的“穴地爆破法”，先由以矿工为主体的工兵在对方城墙附近开挖巷道，掘进至城墙下，埋填炸药，在城墙上炸开缺口，然后步兵以较大的伤亡攻城。在城垒防御战术方面，此一时期的清军也不再单纯依赖城墙防御，而开始重视纵深防御，构筑城池时注意以木材和土混合筑城，预留炮台，外布壕沟和各种防御工事，从而依托坚固和纵

深的防御设施坚守城池，避免过大的伤亡。

在野战战术方面，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清军也在缓慢地进步，并开始注重野战中攻防的转换。野战进攻时，部队往往分为警戒队、本队、辎重队、后卫队在战场上以纵队开进。因为湘、淮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单位，步兵1营（500人）5哨，10路纵队为1哨，构成一个战斗群；骑兵1营（319人）5哨，1哨5棚。所以部队接敌时，通常以营为单位排成两列横队，每营分5个部分（5哨），前3部分为前排，后2部分一接敌，一设伏，形似倒写的“二”字，实际上是两个梯队的横队队形。



这种两个横队的队形集中体现的是清军求稳的战术思想。为了求稳，以湘军为代表的清军尽量不冒险，避免攻坚战，力求将攻坚作战化为城垒防御战，而在城垒防御中，往往据垒自守，不轻易出击。如曾国藩就规定，湘军在部队开进时，每天行军不能超过40公里，且半日行军，半日筑营，所谓“结死寨，打呆仗”（胡林翼语）。在遂行野战时，主要采取侧击、包抄的战术。战斗打响后，不是先发起进攻，而是等着敌人先来进攻，等敌人士气弱下来时，再用奇兵实施包抄、夹击。或者等自己的正兵退到第二梯队之后，而敌人冲上来时，由伏兵趁机冲上去，以消耗敌之有生力量。

因此，清军的战术虽有改进，但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只是传统作战样式内部的一个变化。个中原因在于，冷热两种兵难以混编，战斗队形难以疏开。同时火器质量差也限制了部队的攻防能力。因为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的枪炮仍然是前装枪炮，射程短，杀伤力不大，所以不能离开刀、矛而独立遂行作战任务。

19世纪60～70年代，清军开始了第二次战术变革。这一时期，洋务运动兴起，清朝统治者真正认识到西方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立场出发，引进了大批洋枪、洋炮，并开创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仿制了一些新式武器。军队陆续装备了后装步枪，火炮数量也大量增加，从而引起战术的更新。如李鸿章的淮军就全部装备了新式枪炮，并从装备大量洋枪、洋炮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弓箭、刀矛、抬鸟枪旧法，断不足以制洋人”，主张学习西方的战术。尤其是随着八旗和绿营的彻底腐朽，军队组织体制编制也随之变化，清政府开始建设防军和练军，战术也随之改革。

这次战术革新的重点，是开始重视发扬火力。其具体表现：一是作战队形由原先的密集型向疏散型方向发展，拉大士兵间距，减少层次，改变射击姿势，增加火力密度。步兵野战时，先以哨（32～64人不等）为单位列成前后两列相重叠的横队（行距两步），这种横队为其他一切战斗队形的基础，无论冲锋、相持还是后退都如此。战斗开始后，先由枪炮以密集火力进行压制射击，待敌人阵地出现混乱

时，再发起冲锋。二是重视炮兵的作用。此前，炮兵在清军中并无单独编制，这一时期，清军中的炮兵不再与步兵混编而成为独立兵种，炮兵以营（500 人）为单位作战，有时集中几个营炮兵，一个营 6 门火炮，协助步兵拦阻敌人的进攻。从梯队上，淮军兵力部署经常分三个梯队，如每营有 10 个哨，先以 3 哨为前敌（第一梯队），组成散兵线，另以 3 哨为接应（第二梯队），成紧密横队，另以 4 哨为把尾，成第三梯队，即预备队兼设伏。三是实行三个梯队交替掩护的战术。1871 年，丁汝昌和李鸿章编著的《陆军操典》就规定，在作战中实行横队队形，第一梯队之后必须有第二梯队接应，并要建立第三梯队，即保持强大的预备队。此外，《陆军操典》还规定每梯队相隔百步，后两个梯队都要在敌人枪炮有效射程之外，从而避免伤亡。《陆军操典》的以上规定，反映了清军战术革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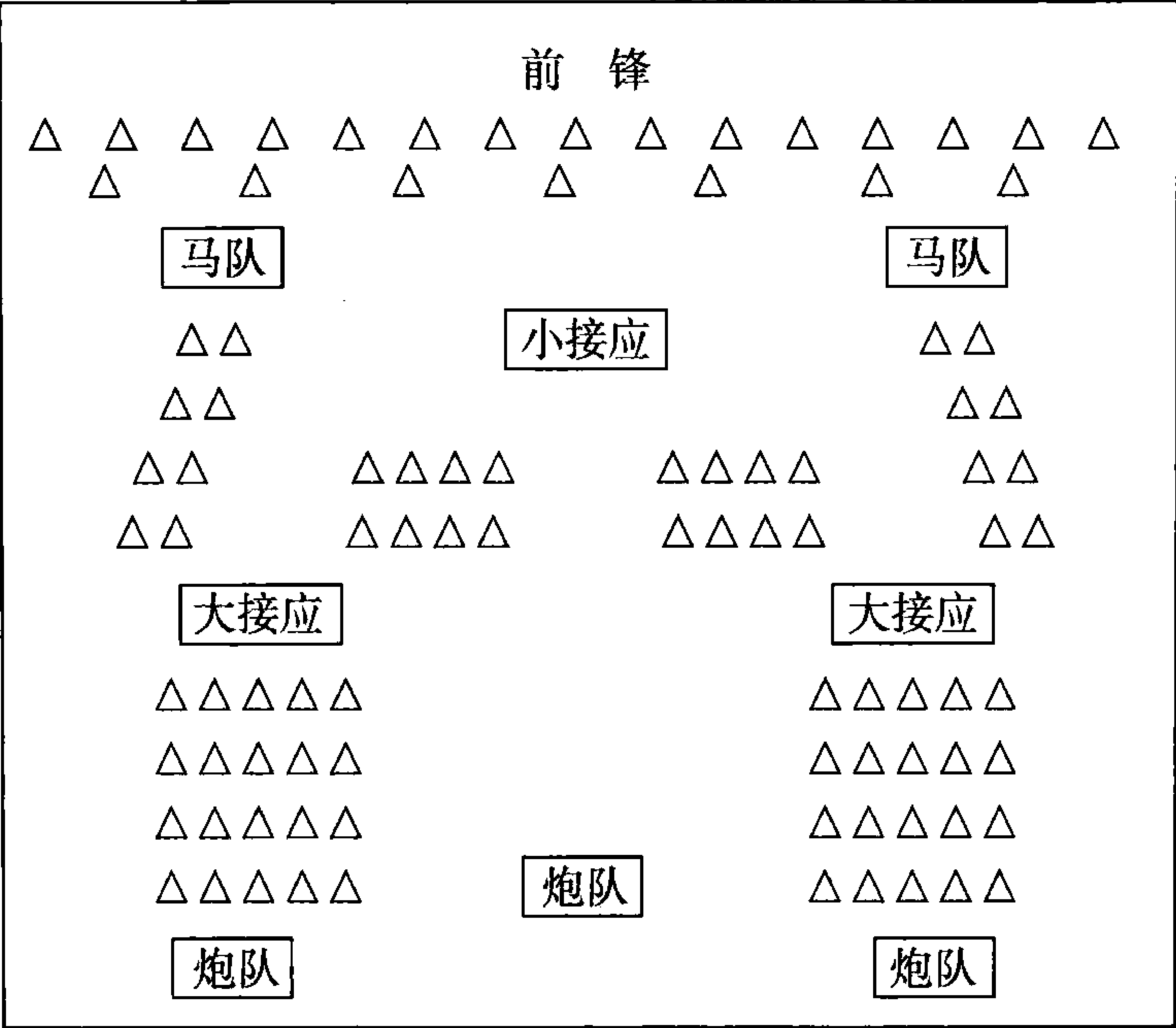
但这一时期的战术变革仍存在弊端，主要表现在新旧混杂，发展不平衡，中央没有战术训练的统一计划，结果各省一哄而上，加之各省武器装备相差很大，不配套，所以战时难以互相支援。尤其是 19 世纪后半期，西方陆军战术正进入大发展时期，随着武器装备迅速更新，线式（横队）战术开始演化为散兵与纵队相结合的战术，再发展为散兵线战术。但清朝的防军与联军最先进的战术仍是散兵与纵队相结合的战术，根本上仍是横队战术，只部分解决了火力成为主要杀伤手段下减少士兵伤亡问题，战斗队伍两翼缺乏保护，不便于机动，结果仍然不是西方的对手，

以致在中法战争中表现欠佳。

甲午战争后，清军战术进入第三次变革时期。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清军开始全面模仿德国和日本。当时人们认为日本强军的一切举措源于德国，所以尤以德国为效法的对象。袁世凯小站练兵所练的新军和南方的自强军，其操典以及教练、装备都源自德国。这一时期，清军完全采用西方的近代战术，摒弃了湘军、淮军稳扎稳打固垒的战法，而以发扬强大的火力为主。1902 年，清军又由学习德国改为学习日本。当时的观念是：德国终是“西夷”，其战术不适应于中国，如德国军人左肩携枪，就与中国人的习惯不相适应。而日本是中国近邻，已经实现了军事近代化，所以清军普遍改聘日本教练，翻译日本军事教科书，并有不少人到日本留学军事。近代许多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如黄兴、蒋百里等，都曾留学日本的军校。

反映在具体的战术上，新军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支近代化军队，编有步、骑、炮等不同兵种，并注意发挥其整体作战效能。表现在部队部署上，梯次队形更为普遍，按照前锋（两侧有马队保护两翼，防敌包抄）、小接应、大接应、中炮队（炮兵置于大队接应之后，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军火大队的次序排列；表现在战斗队形上，散兵线成为主流；在战术运用方面，更加重视攻防手段的转换和运用，夜战、遭遇战以及夜袭战术得到广泛运用；重视后勤工作，辎重队在作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充分认识；战术原则更加灵活，更加重视发扬火力，能够实施以步兵为中

心的诸兵种协同，防御时能够实施纵深防御，先用炮兵进行拦阻射击，次以地雷轰炸和排枪射击击退敌人，从而实现了步、骑、炮兵的战术协同。



军火大队

新军的这种战术在抵抗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当然训练最好的袁世凯部武卫右军被调去镇压义和团未参战，与八国联军作战的主力是聂士成部武卫前军，他们在北仓阻击战和西沽武库争夺战、天津租界战斗中，都表现较强的战术意识。

（二）中国近代海防战略和海战战术

近代以前，中国虽有漫长的海疆，但一直是一个以农

立国的大陆国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本身缺乏向海外拓展的经济动因，加之国防的主要方向在西北和北方，所以长期奉行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历史进入近代，西方殖民强国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并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作为保护海上贸易和扩张的工具，但明、清政府面对西方殖民者加速殖民扩张的严峻形势，仍然不能对海疆经营予以足够的重视，甚至还实行愚昧的海禁政策，在海防方面沿用陆防的办法，万里海疆门户洞开，海防空虚，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灾难命运。

1. 海防观念的变革与海防与塞防之争

随着西方列强咄咄逼人地入侵，处于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夹击之下的中国，受到来自海洋和陆地的双重威胁。由于海防观念落后和缺乏正确的海防战略，中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境地。抗击西方列强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传统的国防体制和国防战略已走向全面崩溃，而失败的惨痛也不断唤醒人们的海防意识，迫使清政府检讨既有的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关注万里海疆无防的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发现中国遇到了全新的敌人，如曾担任过林则徐幕僚的魏源就认为，来自海上的入侵者——“外夷”，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蛮夷，他们不仅武器装备占优，而且从事的是“亡我中华”的殖民侵略活动，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海防问题。而要加强海防，首要的就是“师夷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可惜的是，清朝统治者受传统的陆防观念

约束，将海防理解为单纯的海岸防御，只重视对西方火炮的引进，而对“军舰”、“养兵、练兵之法”了无兴趣。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清朝统治者进一步觉醒，认识到“坚船利炮”在海防中的重要性，于是掀起洋务运动，在购买、引进洋枪、洋炮的同时，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并把筹建新式海军提上议事日程，大量购买舰船，创建了北洋舰队。

19 世纪 70 ~ 80 年代，中国又遭遇到全面的边疆危机。陆地边疆方面，英、俄两国为争霸西亚，不断将侵略势力伸向中国新疆，支持一个中亚伊斯兰罕国的军官阿古柏率军队入侵中国新疆地区，成立了伪“哲德沙尔国”。1871 年，俄国又出兵强占中国新疆重镇伊犁，而且志在吞并整个新疆，西北国防压力陡增。海疆方面，东方的日本于 1874 年借口台湾“生番”杀害琉球的日本人案，出兵进攻台湾，东南沿海告急。

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防危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兴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国防战略大讨论——这就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此次围绕国防战略重点问题展开的争论及清政府的战略选择，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数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的国防和军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争论过程中，以朝廷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员认为，来自海上的侵略是中国国防的主要威胁："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

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在边海防危机同时加剧而政府财政又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应以海防为战略重点，停止在西北边疆的军事行动，放弃新疆。将国防重心由西北转向东南沿海，从而集中物力、财力筹办海防，确保东南海疆安全。其理由是：“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而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地方大员则认为，沙皇俄国虎踞中国北方，侵略野心最大，其继侵占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后又出兵中国新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只要能够扼制住沙俄在西北边疆的侵略势头，则“各国必不致挑衅于东面”。所以他们主张以西北陆疆防御为主，全力加强西部塞防，及早收复新疆。第三种意见则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他认为，面对边海防同时出现的危机，应该海防、塞防并重，在西部和东南沿海同时加强防御。在具体策略上，应该优先并尽快解决新疆问题，稳定国家的西北屏障，保卫蒙古，有效拱卫京师，进而作为海防的有效支撑。

左宗棠的意见得到了朝廷中实权派人物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清政府在权衡利弊后，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决心在将塞防作为国防战略重心的同时，加强海防建设，既抵抗来自陆上强国沙俄的侵略，又防御来自海洋强国日本等国的侵略。

1875年，清政府发出“六百里加急”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西征平叛。清军于次年攻克乌鲁木齐，收复新疆北部。1877年，阿古柏兵败自杀，清军于次年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1884年，清政府又完成了对于巩固西北边防和开发新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疆设省的工作，正式设立新疆行省，以湘军大将刘锦棠为新疆巡抚。在用兵新疆的同时，清政府于1875年也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沈葆桢为南洋大臣，分别督办北洋海军和南洋海军，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步伐。进入19世纪80年代，鉴于西北边疆得到巩固，清政府遂改变塞防、海防并重的战略，将国防战略重心转移到东南沿海方向。1879年，日本吞并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使清政府更加感到来自海上的安全压力，海防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上升到最重要的战略地位。清政府于是加大了海防的投入，其主要标志就是加强北洋海军的建设，大量购买国外先进的军舰，并在旅顺和威海建设新型军港。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又以朝廷谕旨的形式明确将海防作为中国国防战略的重点。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为加强海防，正式设立台湾行省，并于同日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海军领导机构——海军事务衙门。

2. 从海岸防堵到海口重点设防

中国一开始与入侵的西方近代海军接触时，奉行的是海口防堵的战略。这一战略的要点有二：其一，强调“陆战谋胜”。因为凭主观臆想认为西方侵略者擅长海上作战而

弱于陆战，所以将海防的成功寄托于陆战，主张在进行海岸防堵之余，与侵略者在陆上决战，利用山岭的复杂地形击败侵略者；其二，在兵力部署上实行分兵把口而非重点设防。在以上战略思想指导下，清军对付西方殖民侵略者的办法，无非是在海岸、港口的前沿要塞设置固定的炮台，装备前装火炮，设置拦江木排和铁链。而且，当时的炮台全是露天的，多为圆形的、半圆形，炮台的侧后也缺乏掩护，两岸的炮火难以形成交叉火力，对海上的敌舰难以构成威胁。同时，炮台固定又无炮架，不能俯仰和进行左右调整作第二次射击，所以来自敌人军舰上的炮火可以遍及炮台，而且炮台也常为敌军抄后路攻取。正是海防战略和战术的落后，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以区区数艘军舰和数千人之众，横行霸道，一路从南海经东海、黄海，入渤海湾，直逼天津，短时间内就先后攻下虎门、定海、镇海、宁波、吴淞等海防要塞，陈兵京师的门户天津，耀武扬威。可以说是自由出入中国海口，如入无人之境，并能够溯江（珠江、长江）而上，突入内河，而清军海口防堵战略下逐次拦堵根本起不到拦截作用。

针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缺乏海上防御能力的现实状况，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以守为战”、“久持困敌”、“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新战略方针，主张放弃整个海岸线，改为专防内河，将敌舰诱入内河，使其失去机动性而予以痛歼。按照林则徐、魏源等人的设想，以上只是根据清军装备和战术落后的实际而采

用的不得已之策，长久之计则应该建立“船炮水军”，“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尤其应在福建、广东等地建立新式海军，“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进行海上防御。但清政府却舍弃后者而将他们提出的权宜之计作为既定的、长久的海防战略，固守海岸防御的陈旧观念，对海军在海防中的战略作用一直未有充分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海防危机的深入，海防的重要性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清政府开始筹建新式海军。丁日昌提出了沿海择要改筑西式炮台加强海岸防御，创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组成外洋海军，分区设防，三洋呼应，共守海疆等主张。1888 年，李鸿章筹建的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清政府拥有了强大的远洋海军。伴随着新式海军的创建，清政府制订了新的海防战略，即海口重点设防战略。这一战略的重点，在于建立若干坚固的海口要塞防御区，配合新式大型铁甲舰为主力战舰的“外海水师”，抵御来自海上的进攻。

在海口重点设防战略的指导下，清政府于 19 世纪 70 ~ 80 年代掀起了海防建设的高潮。其具体表现是，一是加强要塞炮台的建设。一方面，清政府从国外大量购买新式开花大炮，这种大炮较之旧式前装滑膛炮在射程、摧毁能力和射速方面大大提高，可以在敌舰未逼近炮台时予以迎头痛击，如装备的克虏伯大炮的射程就远于当时外国军舰上的舰首炮和舷侧炮。另一方面，重视炮台的选址和配置。在设计炮台时注重多角度射击和互为掩护；加强炮台的防

护，炮台顶上用木材或厚钢板加以防护，内部用沙袋做成隔离堆，火药库也开始修在地下，通过曲折的地道运往炮台。炮台的后路也建立了掩护设施，埋伏一定数量的部队，以防敌人上岸的小股部队偷袭，还知道造假炮台以分散敌军舰的注意力。此外，还用水雷、沉船沉在主航道上，阻止敌舰上溯。在中法战争中，这种新型的海防措施就对法军形成了有效抵抗。二是加强海军建设，掀起了购买军舰的高潮，花费重金购买了威力巨大的铁甲舰。首先成军的北洋舰队一度成为亚洲第一大舰队。

海口重点设防战略虽然抛弃了以陆防代替海防的陈旧观念，但这一海防战略仍然属于专守本土、消极防御的守势战略。反映在要塞、炮台的构筑上，虽然中法战争后清军在建设旅顺、威海卫基地时学习德国最新的海防要塞构筑技术，建筑了相互分隔的地下火药库，炮台上合理配备了可以升降的火炮、高射机关炮，减少了射击的死角，形成了交叉火力，还专门建造了防守要塞炮台后路的陆上炮台，并在海口布设多重水雷和障碍物防守，但仍然未能将炮台造成环形结构，难以实行环形防御，只有正面临海，而且各炮台之间间隔过小，缺乏合理配系。反映在对海军战略地位的认识和海军力量的使用上，虽然晚清海军的建设者和领导者都极力主张加强海军军备，但是对于海军的战略运用却仍然十分保守，认为海军只有防御本土的作用，主要作用不过在沿海游弋威慑、阻止敌军靠近本土，或在海岸的外围配合陆地防御形成防御纵深。这就将海军的地

位禁锢在配合陆军作战的层次。

总之，海口重点设防战略的重点只是为了增强要塞防御的稳定性，仍然属于专守防御的消极防御战略，从根本上缺乏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敌进行海上决战的思想。正是在此战略的指导下，清军的海防建设和海军力量的使用被埋下了致命的祸根。继中法战争福建海军全军覆没后，北洋海军在具有相当实力的情况下，因既不适应当时新的作战样式，又对日本的远程登陆作战战法缺乏认识，以致先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最后旅顺、威海两大海军要塞也在日本海、陆两军的夹击下相继陷落，北洋海军最终彻底覆灭。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古代军事
作者＝孙建民著
页数＝２６８
ＳＳ号＝１２７２３４８２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１０